

編輯說明

为了配合当前在全国範圍內逐步开展着的以階級斗争、階級教育为中心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們編选、出版了这本家史集。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作品，大都在最近國內的一些报刊上发表过，也有未曾发表的。它們都在不同的角度上反映和揭示了过去的階級压迫和階級斗争的真理，說明了各行各业和各民族的劳动者的生活道路都有两段——一段是黃連鋪成的，一段是蜂蜜写成的。

不忘昔日苦，方知今日甜。沒有體驗过階級压迫的生活、沒有参加过階級斗争的新的一代，对于过去那种交織着血泪和斗争的时代了解得不多，或是了解得还不够真切；对于今天革命已取得重大胜利而階級斗争还在繼續，而且还将貫穿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也同样了解得不多或不够真切。我們希望，集子在这些方面能对讀者們起一些作用。

不能忘記过去，不能忘記階級斗争。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們永远保持警惕，使我們能克服、抵制和防止資本主

义思想的影响和侵蚀，并懂得为什么要更加热爱今天和未来，增强我们投身在新的战斗中的决心和信心，从而更加努力和勤奋地为建设我们繁荣、富强的伟大社会主义祖国而斗争！

编选、出版这类作品，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件新的工作，缺点在所难免，我们热切地期待着各地读者和作者的指正。

作家出版社编辑部

1963年11月

目 录

- 含泪關关东……………王宗昌 (1)
- 王生家史……………張 朴 (12)
- 多少血泪多少恨……………聞 方 (66)
- 南阳湖上一家人……………張云升 (78)
- 路……………陈 浪 朱礼生 (90)
- 我被卖过七次……………范惠珍 (101)
-
- 我真有千言万語要向毛主席傾吐……………蔡金龙 (109)
- 沒有名字的燒盐工人……………李 累 之 光 (118)
- 表的故事……………陈国霖 (159)
- 永远不能忘記的历史……………禹德水 (165)
- 紡織女工話今昔……………王緒生 (176)
- 我的学徒生活……………应德全 (189)
-
- 在一場民族糾紛的圈套下……………刘廷貴 (194)
- 他沒有等到这一天……………李 乔 (202)
- 永远跟着党……………克 坡 (213)

老貧農的話.....	覺 非 (220)
春風吹拂換人間.....	華 羅 庚 (232)
一個鄉村教師的遭遇.....	葉 泮 芹 (238)
苦難的回忆.....	李 筠 秋 (245)
科學工作者的苦和甜.....	黃 耀 曾 (252)
舊恨.....	承 志 (259)

含泪闖关东

——吉林省撫松县东崗公社社員王宗昌家史

我家住在撫松县东崗人民公社。可是，我并不是在这里出生的。在万恶的旧社会里，我家經歷了三十多年流离失所的生活，最后才在这里定居下来。

我的老家是山东省莒县相邸村。关于很远以前的事，我記不清楚了，听我娘說，只知道我的祖父辛勤劳动了一輩子，沒有給我父亲（王秀祖）留下一壟地。我父亲还是起早貪黑地耕种着从地主那里租来的几亩薄地。遇上好年景，秋后剩下的粮食，合糠掺菜才能吃上十个月。因此年年都要向地主籩粮借貸。

有一年，山东莒县春旱夏涝，粮食顆粒无收。地主老財們看我家年年欠粮欠債，誰也再不肯借給点粮食。逼得我爹出外作短工，我娘左手抱着我两岁的姐姐，右手領着我五岁的姐姐，四处要飯。穷人家都是一样的缺吃少穿，她只有到地主老財家去討点殘粥剩飯。吝嗇的地主老財，連整張煎餅都不肯給，他們把一張張煎餅切成碎块，要等討飯的人哀求半天才出来扔給一块。以后，連煎餅渣渣也不給了，他們一見我娘迈过門坎，就連声吆喝：

“快走吧！沒东西給你們啦！”

靠要来的飯怎么能养家活口？不到一年，我那多病的祖母就死去了。連口棺材也买不起，我爹就用家里仅有的一領炕席，把奶奶卷起来，发丧出去。我爹是个烈性汉子，他一回到家里，就对我娘說：“这里沒咱穷人的活路了，凭你五尺高的汉子怎么拚命，也混不出吃穿！”他越說越气，憤怒地把鍋拔下摔个粉碎，說：“今天挑灶，闖关东去！”

七吊老錢闖关东

闖关东，也得有点路費呀！可是，那时我們东凑西凑，只有能买十个燒餅的七吊老錢，够什么用？家中值錢的东西，一件都沒有；若到地主老財那里去借，等于自投罗网。因为，欠債又欠粮，尙未偿还，一說要走，他必送官究办。我爹一跺脚，把我的两个姐姐装在筐里，一头一个挑了起来說：“七吊老錢，也闖关东！”就这样，他領着一家人离开了老家——山东省莒县相邸村，本着一綫希望，到关外去找一条生路。那时正是一九一二年的春天。

因为沒錢，不能坐車。我那小脚的娘，好象是离家越远希望就越大似的，每天都忍痛走上五六十里路。

因为沒錢，不能进飯鋪。我那剛强的爹，也不得不跟我娘一块儿向人討要，請人家可怜可怜孩子，施舍点吃的。

因为沒錢，店棧都不准登門。到晚上，我爹和我娘攬着我两个姐姐，不是睡在店棧門口，就是宿在荒山破庙。

有时，为了赶路，错过了村庄，他们就露宿在路旁、河边、桥下、山涧子里。……风吹雨淋，从来没有睡过一宿好觉。

他们就这样，忍饥挨饿，沿途乞讨，一步一步地走了整整一年，才走到山海关。

出关之后，我爹逢人就问：“穷人到哪个地方能过得下去？”问来问去，很多人都说奉天（沈阳）一带不错。可是，没想到刚走近奉天城郊就惹了一肚子气。那天，我的两个姐姐饿的直哭，爹和娘决定不再赶路，想给他们讨点吃的。他们来到一个财主的大院。可是，刚迈进门槛，迎面就站出一个管事的骂道：“出去！东家大门，是你们臭叫花子进的！”我娘说：“俺是逃荒的，你可怜可怜孩子，一天多没吃饭了。”那家伙说：“不行，东家吩咐过了，不能让你们进来。”我娘继续求他说：“你行行好吧……”这时上房门开了，走出一个挺着肚子的大胖子，指着管事的说：“少废话，把狗放出去！”只听管事的呼喊一声，突然窜出两条大黑狗，张牙舞爪的扑过来。吓的娘和姐姐大声惊叫，我爹急忙护着她们跑出门外，可是他自己的两条裤腿却已经被撕破，鲜血流了出来。我爹咬牙切齿地说：“这里财主太恶了，放狗伤人。走，去告他一状！”一位过路的赵老伯走过来劝道：“爷们，忍着吧。这儿没有说理的地方，没钱你告不倒他。”我娘也说：“别惹人家啦，走吧！”可是往哪儿走呢？已经快走出半个中国了，也没见着个能落脚的地方。好心的赵老伯把我们领到家吃了一顿饱饭，并告诉我爹说：“通化那儿地多人少，日子好混，你们就到那

儿去試試吧。”爹和娘謝过他，就奔通化去了。

越 逃 越 荒

一九一五年的春天，我家到了通化孤磳子村，正好是离开山东老家三年整。这三年，我爹領着一家大小遭了多少罪，受了多少难，真是一言难尽。爹和娘商量一下，都不想再走了，就在孤磳子村落了脚，租了姓孙的地主的地。当时讲妥，秋后打下粮食，两家对半分。头一年赶上好年景，加上精耕細作，打下粮食除了交租，剛够一年吃的。可是第二年，地主把地租定死了，不管年景好坏，收多收少，一律按第一年交租的数量收租子。我爹明知道答应不得，可孤磳子村都是姓孙的地，不种他的又种誰的呢？好歹干吧！結果是一年不如一年：天不是旱，就是涝，年年都是交了租子就沒了吃的。沒法儿，我爹只得把地退了。

一九一九年春，我家搬到通化小龙爪沟屯。在这里，我家又租了刘和亮的两垧山地，年租六石。头三年还对付能过活，到了第四年，剛鏟完头遍地，就下了一場冰雹，紧接着又遭了一場大風，秋后歉收。狠心的地主怕我們交不上租，在打場时，就派人守着把剛打下的粮食拉走了。爹一看，这里也活不下去，又把家搬到月牙泡村，租种一家姓王的地主的地。过了三年，生活照样混不下去，就又在 一九二六年的冬天，离开通化，逃到了撫松县。

我家来到撫松县的刁窝碓子村借宿时，被一个外号叫姜聾子的地主知道了，他三番五次的找我爹，劝我們住下来，給他种地。他答应租子一定收的低，还借給咱粮食吃。第二天又領我爹去看了地，他花言巧語地說：“这可是三垧好地，土质肥，保險长好庄稼；我只收你八石地租。”当时大雪盖地，沒法看土质，也沒有实际丈量，我爹就信以为实的答应下来。等到冰雪融化以后，去看看，全是沙崗子地。爹忙去找姜聾子，誰知这家伙眼睛一立楞，耍賴說：“当初讲的就是这块地，想变卦呀！”我爹說：“不降租子这地俺就不种了！”他奸笑着說：“不种？沒那么方便，不种也得拿租子！要不咱們就进城打官司！”我爹当时一核計：沒錢打官司，上哪儿贏去；再說，不种他的地，到別处也不容易。于是，就忍气吞声的种上了。泥一把，汗一把的弄到秋后，只收了七石粮食，还不够交租子。当时村里一些穷哥們見事不公，就推选出一位老农民崔兆德出面求情，恳求姜聾子减减租子。可是他一边抽着大烟一边說：“春天讲妥，两相情願的，要不他能种嗎？”崔兆德說：“年景不好，你就可怜可怜他这逃荒人吧。”姜聾子眼珠一翻說：“你給添上点，他就交上租子了！”崔兆德說：“我也不寬裕。”他說：“我手头也紧啊，正需錢买大烟呢！”好說歹說，由崔兆德担保，两年后才还清了这笔冤枉賬！

到关外落戶以后这十几年中，我家吃尽了苦头。我爹渐渐地明白过来：自个儿沒地，走到哪，也得受欺侮。打这，他打定主意：要用自己的双手在荒山野岭上給自个儿

开出一块地来。

第二年冬天，我三叔王秀成也因生活所迫，由山东老家逃到我们这儿来了。为了躲开地主老财，我爹和他商量之后，决意到老林子里开荒。我家就迁移到距三道庙岭村四里路远的前膛子山林里，全家动手盖了两间地埕子，住下来。因为没钱买鞋，又没有东西自己作，我爹和三叔俩人，冬天就用点破布包包脚，在冰天雪地的大林子里放树，春天就光着脚刨树根，打弄土。流血流汗地开出了一垧多地，全家人都非常高兴——到底有了自己的地了！没料想春天下种时，有一天突然来了三个骑马的人，身上都带着枪。他们从马背上一跳下来，就横眉瞪眼的指着我爹问：“你们问过谁，竟敢在这随便开荒？”我爹说：“这个沟坡子没主。”一个长着长胡子、穿着缎子马褂的胖子奸笑着说：“没主？这是什么？”说着拿出一张纸来递给我爹。我爹虽说一个大字不识，可是看看那上面一方豆腐块大小的血印，也就明白了。这时，一个家伙上前来说：“全三道庙岭的山林土地都包给我们张掌柜的了，谁人不知？”我爹见势问道：“地已经开出来，可怎么办好？”大胡子哈哈大笑，说：“我张平之向来仗义疏财，公平处事。既然你们已经把生荒开成熟地，就自管种好了，七年之内我不要你一粒粮食一文钱，你看如何？”我爹不知这里边的鬼把戏，以为这个张掌柜当真是心慈面软，便向他再三道谢。

自古以来，就找不出一个地主不喝穷人的血的，怎么独有他张平之与人两样？后来弄明白了：这个地区由于

地勢高，氣溫低，新開墾的土地發涼，頭幾年莊稼長不上來，第五、六年土質才變暖，第七年才能發揮地力。儘管這樣，爹和三叔並沒有灰心，他們精耕細作，很快地改變了土質，第四年就獲得了好收成。因為不交租子，咱家頭一年糧食夠吃了。

誰知，第五年開春，張大胡子的外櫃來找我爹說：“張掌櫃的生意不好，外賬又多，從今年開始四六收租子。”三叔說：“當初講妥七年后交租，現在不能變。”那個外櫃將臉一沉說：“空口無憑，拿字據來！”我爹一算，四六租子太重，懇求他：“租子重，減一減吧。”他不耐煩的說：“掌櫃的吩咐，不干就收地！”就這樣，張大胡子憑着那張“隔山照”，沒費吹灰之力就把爹和三叔一滴血、一滴汗費了四年功夫開出來的三垧多地奪了過去，賣給了另一個地主，賺了一筆好錢！

正是種地的時候，地沒了！沒有辦法，我們又搬到東崗村高麗堡子屯。全家動手又在大林子邊上蓋起了兩間地塋子，住下了。可是，這裡的山林土地也都是歸幾戶大地主所有，他們手里也都有象張大胡子那樣的“隔山照”。找不到沒“主”的地方，爹和三叔便在大地主尹禿子尹啟山的林子里開墾了三垧多地。我那年十四歲，就給尹禿子放牛，當半拉子。

我的三叔王秀成，剛家破人亡來到關外時，還是身強力壯的紅臉大漢。可是，經過這幾年的勞累，身子一天比一天衰弱。終於積勞成疾，起不來炕了。為了給他治病，

我爹向財主房伍先抬了五十元印子錢（利息一加一），當年秋天沒有還上，就欠上一百元。第二年秋又沒還上，利滾利，變為二百元了。狠心的財主見我們第三年秋也還不上債，就硬把我娘喂養的一口二百多斤重的大肥豬趕走了；這還不算，又將我家收穫的所有谷草（四千多斤）全部拉走，算是頂上了債。這件事，給我正在生病的三叔打擊很重，這年臘月，病就更加重了。那時山溝里沒有一個治病先生，也買不着藥。人們有病不是拔罐就是扎針放大寒（將血管里的血放出一些）；實在嚴重了，才把病人送到縣城，因為去一趟縣城非常不容易（須穿過一百多里路的老林子）。三叔說啥也不讓找人把他抬到縣城醫治，他說：“再欠下債，就是好了也掙不出利息錢。”就這樣，沒過幾天，我那沒兒沒女的三叔，年僅四十歲就離開了人間。爹和娘忍着極大的悲痛，將他埋葬在長白山下深山老林里。

俗話說，禍不單行。三叔死了不久，轉過年我五歲的小妹妹也得急病死了。全家人的眼淚還未擦乾，第三天，十歲的弟弟王宗祥在林子里放豬時又昏倒了。等抱回家來，他兩眼發直，光吐黃水。爹和娘覺得救人要緊，想再借點印子錢，明天好把他送到縣城去。誰知當天晚上，他喊着“爹呀，娘啊，救救我吧……別讓我放豬、挨打……”喊着喊着，就閉上眼睛，斷氣了……

不到兩個月，窮和病奪去了我家三口人的生命。

一災剛過，一禍又來：日本鬼子打來了。從此，更大的災難臨頭了。萬惡的日本強盜，為了割斷山區人民同

抗日联軍的联系，施行了并屯政策。

一天下晌，日本守备队来到屯子里，不容分說，就把我家房子給点着了，全家人冒着濃烟烈火，好容易才搶出一点东西。万万沒有想到，就在这天晚上，又来了一股如狼似虎的土匪，乘火打劫，我們的淚还没干呀，他們又搶走了我家仅有的一点点粮食和破烂衣裳。真是家破人亡，走投无路。无可奈何，只得在一九三四年冬天，搬到县城。

經過这一連串的打击，我爹就成天愁眉苦臉，茶不思，飯不想。他盘算着再离开撫松逃向別处，可是走南闖北三十多年已經使他明白过来，农民逃到什么地方，也不会得到一寸土地；天下老鴉一般黑，天下的地主老財都是一样的吸血鬼！我爹王秀祖一回想起他五十多年的經歷，一回想起死去的亲人，就忍不住要伤心落泪。沒过半年，他就一病不起了。我清清楚楚記得，他病危那天上午，我去离咱家不到一里路远的福兴大药房請先生的情景：我哀告半天，一个姓張的先生，跟我走出大門站住了，他左右瞧瞧，对我說：“你走吧，我有要紧事，等会再去。”說完轉身进屋，坐在那里喝着茶水，和別人談天說地。我又求他：“先生，走吧。”他却不耐煩的說：“着什么急，再过一个钟头吧！”柜台旁边的一个人偷偷地告訴我：“快雇辆馬車来，他就去了。”天哪！原来是沒有馬車接，他就不去。那陣我还不太懂事，一气之下，心想：你不去，我还不用你呢！可是等我回家一看我爹心疼的滿炕翻滾的痛苦样子，沒法儿，还得再跑回福兴大药房找那个先

生去。“俺家就在大南門外，离这很近，”我恳求着对他說，“你快去救救俺爹吧。”我苦苦哀告了好一陣，才把他請家去了。他給我爹看了看脉，說：“打一針，还有救。可是，得先交十元錢。”我娘說：“俺也沒有十元錢哪。”他一听說沒錢，就立刻鎖上药包說：“沒錢可不能打針！”我在一边忙說：“你給打針吧，俺就去借。”可是他拿起药包，沉着臉說：“沒錢找我看什么病！”說着就走了。过了还不到一个时辰，我爹就捂着肚子死去了。可怜他五十九年的一生里，豁出筋骨，卖命干活，沒有过一天温飽的日子，到死沒有賺得一块葬身之地。

从此，我就靠打柴換錢，养活老母亲。在八年的風雨不悞的打柴生活中，由于时飽时饥，我得了严重的胃病。体力不行，靠打柴不能維持生活了，我又不得不在一九四二年春天，搬到东崗村，在地主陶元德的西小山开垦土地。我帶着病，吃不飽穿不暖，拚命干了一冬又一春，开出了二亩三亩地，可是我又因此得了支气管喘息病。没办法，我娘又挎筐提棍挨門乞討，不久就也得了病，一到冬春就咳嗽个沒了。我娘时常叨念：“这苦日子多啗能熬出头来呀？”

苦尽甜来

、好容易又过了三年贫困生活。到了一九四五年的秋天，穷人的苦日子总算熬出了头：晴天一声霹雷响，领导穷人翻身的救星共产党来了。以后，村上成立了农民会，

我当上了民兵，拿起枪杆子，斗倒了地主。我在西小山亲手开的地也还了家。我和娘到地里去埋完木桩子，也不知是喜欢还是悲痛，娘俩哭了起来。土改的第二年，村农会帮助我盖了三间新房子。一九四七年，我三十一岁才成了家。

在党的教导和培养下，我在一九五〇年春，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人民公社一成立，生产队因为我身体多病，不让我干重活，社员们选我当了仓库保管员。我总是想办法多干些能干的活，多做些劳动日，因此，我家的生活越来越好。我娘常对我说：“在早那日子象地狱一样，诉不完的苦。如今这生活象天堂一般，说不尽的甜！”

如今，我已有了四个孩子。大小子今年高小就毕业，闺女在念三年级，小三也进学门了。这一代人，是在幸福生活中长大的。他们再也不会象我们过去那样为苦日子操心，再也不会拿起小鞭子给地主放猪放牛，再也不用挎篮提棍挨门讨饭。每逢我看到孩子们蹦蹦跳跳、欢欢乐乐的时候，我就想起了过去；一想起过去，就使我更爱今天的新社会，干劲也更大了。我心里想：一定好好干，把咱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好，让子孙代代过好日子。

赵文臣执笔

中共抚松县委三史编写小组整理

王生家史

——《建明公社紀事》家史之一

張 朴

旧社会，有錢的地主立家譜，为的是“光宗耀祖”。新社会，我們要为受苦的穷人写家譜。穷苦人的家譜分两段，一段是黃連鋪成的路，一段是蜂蜜写成的书。

昨 天

——昨天是黑夜漫漫

在河北省遵化县建明公社，誰都知道王生要了二十四年飯，他是二十三戶“穷棒子”的苦头头。王生怎么样苦？有人說：他的苦处象山澗的流水，弯弯曲曲說不到头。王生怎么样穷？有人說：他穷得象荒山河滩的一块石，全身光溜溜，啥也沒有。在旧社会，人們說穷是王生的命，苦是王生的身，穷苦纏着王生家四代人。

三 条 活 命

王生的祖父叫王玉，是个受苦的庄稼人。所生三男一女，王生的父亲王凤山排行第二。全家十口人过生活，日子虽然困苦，倒也过得去。到了光緒二十一年，剛交头伏，天下起連阴雨，一連四十七天沒开晴。山洪暴发了，庄稼冲跑了，河滩里的大水翻着白花，村里的茅屋漏的漏倒的倒。受苦的穷人藏沒处藏，躲无处躲，做工没人雇，討飯没人給。王玉老汉家十口人病倒了七口。旧話說：“穷人生病閻王討債”，糊口尚且不行，哪有錢来治病。就这样，七个病人一个接一个地死去。热热闹闹的一家人，一場天災家破人亡，只剩下王玉老汉和两个儿子三条活命。

父子仨忍饥挨餓，熬过了殘冬，盼来了春天。山坡上露出了野草，树枝上钻出了綠芽。王玉老汉决心要重整家園。父子們打短工、做零活，白天上山割草，夜晚在村拾粪。沒黑天沒白日地苦扒苦曳。

这一天，本村地主王家老掌柜的，看見王玉老汉家的粪堆，心眼里乐了。他慢悠悠走进王玉老汉家，这看看，那瞧瞧，对王玉老汉說：

“王玉呀，你們家这么多的粪肥，不想租点地种嗎？”

土是庄稼人的根，地是庄稼人的命，王玉老汉早就有租地的念头，只是担心家里太穷，没人租給。今几个老掌

柜一說租地，他心里通地一跳，可又一轉念說：

“想是想呀，可誰又租給咱？”

“那好說呀，”老掌柜嘿嘿地笑着，“亲不亲老乡亲。”說着他的眼圍着王玉老汉的院子东張張西看看。“我租給你一点吧。”

“真的，老掌柜？”王玉老汉赶紧問。

“我什么时候說过玩笑話！可就是……”老掌柜更仔細打量着院里的东西，“你拿什么作抵押呢？”

王玉老汉一下子泄了气，他垂下头，蹲在院子里，說：“是呀，要錢沒錢，要东西沒东西，还是租不起呀！”

老掌柜嘿嘿一笑，两眼盯着王玉老汉的三間茅屋，說：“咱們乡里乡亲，好說話。用你这三間房子作抵押吧！”

王玉老汉突然抬起头来，两眼直呆呆地看着茅屋，說不出一句話来。

老掌柜說：“这也是咱們这一带的老規章，租地总得押点东西。其实，你不願意也就算啦，房子是你的，地是我的，两不相干。”他看着那堆粪肥点着头說：“可惜这堆好东西！”一面說，迈开方步子向門外走去。

王玉老汉突然站起身來說：“地，我租下了！”

只因为租下了地主的地，三条活命又葬送了两条。王玉老汉过日子的心胜，决定让两个儿子在家經營租来的土地，自己給地主去当长工。

这一年，秋庄稼快熟的时候，地主怕穷人偷庄稼，让

王玉老汉睡在地里看守。这一带常常闹土匪，王玉老汉总是战战兢兢的。这一天，天刚摸黑，王玉老汉在窝铺里升起一堆柴火，烧他那当晚饭吃的两个窝头，这时山头上忽然响起枪来，有人喊道：“土匪来了！”王玉老汉钻出窝铺撒腿就跑。跑了一程，忽然想起自己的被子还在窝铺里。一条被子对于穷人来说，可非同小可。他拚着性命又奔回窝铺，这时柴火已经把窝铺烧着，他心里一急，一头扎进窝铺，窝铺倒塌了，把王玉老汉压在下面。他抱着被子，挣扎着钻出来，就昏迷过去。直到第二天下午，东家不见他回来取饭，打发人一看，原来他被火烧得躺在地里，才派人把他送回家去。

王玉老汉回到家里，昏昏迷迷躺了几个月，他舍不得叫儿子拿一个钱为他治伤。临死的时候，他还对儿子们说：“地是根，没有地……就会死在……财主……手里……”话没说完就咽了最后一口气。

这一年王生已经八岁。爷爷王玉死后，日子更加困难。这一年赶上夏旱，热风吹得天象个干锅一样，几十天没下一个雨点。租种地主家的沙滩地，正好种的打瓜，瓜秧被太阳晒焦了，王生父亲的脸色也象是晒焦了似的。他不怕辛苦，又赶种上了晚豆子。幸好赶上了一场小雨，豆子出来了；可是到了阴历八月初，又下了一场早霜，豆子被打死了。辛辛苦苦的一年劳动落了一场空。王生父亲正焦虑一家人的生活，地主又来收租。地里颗粒未收，哪

有粮食交租。就这样，地主收了地，又把王生家的四间茅屋（后来又接了一间）顶了租子。王生父亲一气之下，得了气结病，卧床二年就死去了。

两个苦命人

王生的父亲死后，家里的全部财产，除了发送父亲，一无所剩。当父亲入土之后，母亲哭着说：

“孩子们，你妈没有能耐，再也养活不起你们了，你们各自逃命去吧。”

全家抱头痛哭，难舍难离。

王生给地主扛活挣一点钱，帮助母亲养活两个弟弟。这一年王生整二十岁，个子虽然不高，长得却象个铁打的汉子，再加上他为人忠厚，少言寡语，干活牢靠，不怕受苦，周围的人都很喜欢他。有些人常和他开玩笑说：

“王生，二十岁的大人了，该成家立业娶媳妇了。”

王生有时笑笑，有时就回答一句：“谁肯把闺女往火坑里送。”

天下真有这样奇巧的事，正当人们这样开玩笑的时候，有一个姓樊的“花子”，愿意把闺女送给王生作媳妇。人们笑着说：“这可真是门当户对。”是呀，除了王生这样的人，谁又愿意讨要饭吃的闺女作媳妇呢。

常言说：不爱金，不爱银，穷爱穷心内亲。樊家的闺女

女是个有心人，一定要亲眼看看王生。王生剃了剃头，洗了洗脚，走进一座破庙里去相亲。樊家的姑娘一见王生，看了看头，瞅了瞅脚，把头一低，打心眼里喜欢上他。可是王生头不敢抬，眼不敢看，活象个泥胎站在那里。樊家的姑娘心里想：

“你说句话呀！只要你说句话，我就跟着你走，就是天边海缘我也不怕，只要是离开这人骂狗咬的日子。”

王生心里想：

“只要你不嫌我穷，我保险对你好，就是把我这身力气使尽了，也让你受不了屈。”

姑娘心里想：

“怎么他不说话？莫非是个哑巴？”

王生心里想：

“一切都由你决定，你说中就成，你说不中咱就走。”

姑娘实在憋不住了，心内着急，可一个姑娘家又不好问什么，只好说：“你老站着干啥？坐下吧。”

王生说：“庄稼人站惯啦，不累。”

就这样一句话，这门亲事就定了。

王生要结婚了。有钱人结婚有酒席，有鼓乐，有洞房。王生结婚连个住处也找不到。难道说新婚夫妇还象花子似的去住破庙？樊家的姑娘坚决反对，她说：“我住破庙住了十几年，从嘎啦一声住到这么大，结婚出门子——人家都说这是人生大事，就不能换个地方吗？”说

着滾下泪来。王生想来想去，忽然想起西鋪西头有个大車店，王生夫妇就在这个大車店里入了洞房。

按王生当时的說法是，人不該死总有救。过了些日子，东鋪的地主要找个看院場的，院場里有一間破茅屋，茅屋的草頂实在是太破烂了，地主答应只要院場看得好，轉年給換一个新草頂。王生夫妇就搬进这间破茅屋。誰知道，这间破茅屋就成了王生全家悲惨生活的开端，就成了二十四年討要生活、一件一件血泪史的“見证人”。

王生夫妇尽心尽力地替地主看院場，出力卖命地为地主干活，可是換屋頂的事地主再也不提起。一年、二年过去了，王生夫妇生下第一个孩子，头頂上还是那堆破烂草。王生夫妇又生下第二个孩子，那正是阴历五月間，刮着急風下着暴雨，屋頂漏着水，有的地方眼看着往下塌，王生用树枝棍子頂住架住，可是風越刮越大，雨越下越急，閃电雷雨震得茅屋直搖晃。忽然，有一块屋頂塌下来，風雨一下子扑进茅屋，王生的大儿子哭叫着，王生急忙抱着茅草去堵窟窿，雨水、泥土、烂草順着王生的头頂滾下来，烂草泥水糊住了他的眼睛，……

一場暴風雨躲过了，第二天，王生的眼睛肿起来。他以为鬧一两天就会过去，誰知道越鬧越厉害。想治治沒有錢，地主却催着上工，孩子老婆又需要人伺候，王生心里火燒火燎地着急。眼睛越肿越厉害，直鬧了一个多月，才漸漸地消下肿来。王生睜开眼睛一看，啊！天地怎么变了

样？到处是一片昏暗，看不見南山，看不見树木；只听见鳥叫，看不見鳥飞；河里的流水嘩嘩响，看不見河水往哪边流。他伸手揉了揉眼，用力把眼睛睜大，可是什麼也看不見。“难道？难道……”他不敢想下去，一屁股坐在地上，閉起眼睛，只觉得天旋地轉，一切心事都涌上心头：上有老母，兄弟年幼，下有老婆，孩子更小，都需要他养活。他不能瞎！他不相信自己会瞎，站起身来，磕磕絆絆地奔到河滩，摸到小河旁，他捧起水来洗呀洗呀，直洗得眼睛发酸，睜开眼睛一看，眼前还是一片昏暗。山在哪？树在哪？村在哪？河在哪？他分辨不清楚。王生一下倒在河里。从此，这个铁打金不换的汉子，再也看不見这个世界了。

王生瞎了眼睛，全家哭得象泪人儿。母亲可怜儿子，就拉起棍子，带着两个兄弟沿村討要起来。这五十多岁的老人，怎么經得起这跋山涉水，东村跑西庄奔，人罵狗咬，饥一顿飽一顿的日子；整天价唉声叹气，泪水洗面。有人見她可怜，就劝說她：“趁着不算太老，往前走一步吧，也救救两个孩子的命。”起初，王生母亲听了这话只是搖搖頭，当作耳旁風。后来日子长了，眼看着儿子的眼睛沒有指望，再不願意給儿子添更多的煩惱，年紀又一天比一天老了，討要也一天比一天难啦，就起了嫁人的念头；可是一想起另归別姓，心里就象刀攪。这一天，王生的母亲奔跑一天，沒要到一点东西，小儿子哭着叫着喊餓，王生

媽心一橫，就把王生叫到面前說：

“孩子，不是媽心狠，是媽的命不好。世界上千條道，萬條道，哪條道媽也走不通。別怨恨媽，媽知道對不起你爸，對不起你們，可老天要媽這樣作，媽又有啥辦法？將來死在九泉，你能在爸面前替媽說句話，證實一下媽的心，就算媽沒有白養活你一場。媽……要……”

王生媽再也說不下去。

王生跪在媽面前哭着說：

“只要媽不走，兒子就討着要着也要讓媽吃飽……。”

媽低下頭，再也沒有說什麼。

活，活不成！死，死不得！

媽媽改嫁，媳婦生病，孩子要吃，家里無糧。幾根繩把王生的心絞得象條麻花。無奈何只有自己拉起棍子去討要。可是一想，自己乍瞎失明，路不平，腳無根，山有多高？水有多深？庄在哪方？門在何處？如何要法？左思右想，愁思千萬，無路可走。忽然兒子跑來說：“爸，我領你去打水。”這句話提醒了王生，要是讓兒子坐在自己肩上，他的眼我的腿，不是可以出去討要嗎？兒子聽說和爸出門，高興得跳起來；王生卻不覺落下淚來，心想：“小孩家，怎知道這樣出門的難處！”父子倆拉着棍子走出庄來。碰到高崗，兒子就喊上坡，碰到坑洼石頭，兒子就喊繞路。就

这样，走村串庄，东西要的倒是不少，直到日平西，儿子要回家，王生也惦记家里的病人，就肩起儿子奔家走来。一天奔波，儿子劳累了，坐在父亲肩上直打瞌睡。王生不见儿子说话，以为是路好。可是觉得脚下坑坑坷坷不平，刚想问儿子，脚下一空，父子俩顺着陡坡栽下去。儿子大声地哭叫，王生双手和膝盖盖流着血，父子俩抱在一起痛哭起来。王生心里想：“天呀，你叫人怎么活下去！人到了这一步，不如死了好。”可是孩子一面哭一面喊：

“爸爸回家，想妈妈。”

王生心如刀绞，只好爬起来拉着孩子奔了家。

儿子再也不愿意跟王生出门讨要，一家人只好饿肚肠。

这一天，天下着小雪，到了中午一家四口还水米没沾牙。大人还可忍耐，孩子却不停地哭叫。正在这个时候，要饭的老徐珍摇摇晃晃地走进门来。老徐珍也是靠讨要过活的，这几天卧病在床，今天实在忍受不住饥饿，才勉强爬起来。他问明了王生家为什么哭叫，叹口气，摇摇头说：

“唉！一样的命呀。好，我也正想出门要口吃，我领着你，你扶着我，一块去吧！”

雪已经把山路盖住，北风卷着雪丝在山坳里尖叫旋转，山路溼滑，行人稀少，在灰蒙蒙白茫茫的山路上，只走着一老一瞎两个要饭的。

常言說，下雪要飯最不是时候，有的人家关門閉戶，圍爐取暖；就是不关門閉戶的，任你再喊再叫，他也不肯冒着風寒給你送出一點東西來。老徐珍領着王生奔走了一天，只要到几口冷湯，几把猪食。肚內无食，身上寒冷，北風越刮，大雪越下。眼看着天气漸漸地灰暗下来，老徐珍搖搖頭說：

“看来，今几个这根腸子又得閑起来。好，这近处有个破庙，我領你去过夜。”

两个人走进破庙，觉得比外面暖和多了。老徐珍哈哈手，把庙門关上，怕風吹开，搬过供桌来頂上門，两个人背靠着供桌坐下，誰也不說話。过了一会，老徐珍因为由冷乍暖，突然咳嗽起来，王生赶紧給他捶背。一陣咳嗽过后，两个人又默默地坐起来。忽然王生叹了口气，心想：老婆孩子不知这一天是怎么过去的？老徐珍好象看見王生心事似的，就对他說：

“睡吧，別瞎想啦，老天給咱穷人安排的就是这样的命。”

飢餓燒腸，千思万慮，加上身上越来越冷——才进来时那点溫暖也不知道跑到哪去了。怎么能睡得着！老徐珍又咳嗽起来，王生不断地为他捶着。老徐珍喘过一口气來說：

“既然睡不着，咱爷儿俩說一会話吧。”

“中！”王生急忙答应着。可是心里想，有什么話好

說呢？

老徐珍說：

“我小时常听奶奶說，南山有个仙人会种葫芦，葫芦种在最高的山頂上，每天日头出来第一个照見它，葫芦要长一百零九天，要用一百零九眼泉水来澆它，少一眼也不行。仙人养着一对金鴿子，每天夜間，下山含水澆葫芦。澆到一百零九天上，不要等日头出来，就要把葫芦摘下来，这个葫芦就成了宝葫芦，要什么只要一拍它，就来什么……”

“大爷，你說这个干什么？”王生奇怪地問。

“孩子，你不知道，”老徐珍停了一下說，“今个白天咱們路过燒餅鋪的时候，你可沒能看見那油炸的麻花，我已經三十年沒吃过那玩艺了，要是有个宝葫芦，能要个麻花来吃吃，我就是死了，也心滿意足了。”

王生心里一陣难过，赶紧說：

“大爷，明天咱想法去买一个麻花。你干什么老說死呢？”

“不，孩子，我是吃不上麻花了！”說着又是一陣剧烈的咳嗽，王生赶紧替他捶背。老徐珍繼續說：“听說死了比活着好混，不用吃东西。不过还得穿衣服，还得要有錢，听說三十六道鬼門关，关关給錢才能过得去……”

奔跑了一天，王生不知跌了多少跟斗，已經够劳累的了，虽然身上寒冷，可还是漸漸睡去了。等他醒来，天已

經亮了。他觉得身上有个东西，一摸是老徐珍的破棉袄。再摸摸徐珍，他直挺挺地躺在地上，渾身冰凉，早已經死了多时啦。王生哭着从村里喊了人来。村里人問明了徐珍家里没人，就对王生說：“你走吧，我們把他埋掉。”王生一定要等着埋了再走，村里人怕他再死在这里，两个人架着把他送出村去。

王生一路走着，徐珍的影子老在他眼前晃，徐珍的話老在他耳旁响，好象这些話句句是在說他，将来他老了就是徐珍这样下场。想到这里不觉渾身打了一个冷战，直觉得天轉地旋，心內一陣酸痛。他忘了朝哪个方向走，也忘了走的是什么样的路，磕磕絆絆，高一步低一脚，忽然脚下一滑，整个身子直栽下去，咚的一声，被水噙了一口。他急忙抓撓着爬起身来，用手摸了摸，有溜腰深的水，周圍是圓的磚墙，他这才明白是掉在井里。他大声喊着：“救命呀！有人掉到井里啦！”喊了几声不見有人来。他慢慢地靠在井边上想：“喊人干啥呢？这不是死的好机会嗎，把头一扎，人不知鬼不觉地就完了。”他剛要把头扎下去，忽然想起老婆孩子：“我死了，他們怎么办呢？誰来照管他們？他們怎么活下去？不能死，为了孩子，說什么也不能死！”他抬起头，大声喊着：“救命呀！救命呀，有人掉到井里啦！”他一面喊，一面圍着井帮轉，用手摸索着，想找到一点什么东西攀登上去。可是井帮上长滿鮮苔，非常光滑，一点办法也想不出来。

他喊得筋疲力尽了，就站下来休息。水浸湿了他全身的衣裳，阵阵冷风由井口吹来，冻得他瑟瑟打战。他心里想：“完啦，看来今天是非死在井里不行了！”这样一想反倒安心起来。觉得这样死了倒对得起孩子们，他自己叨叨念念地说：

“孩子们，孩他妈，别怨我，不是我心狠，抛下你们不管，是我命该如此。以后你们怎么活下去，全靠你们自己啦，一百斤的担子，你们自己去担吧！”说到这里，泪珠刷刷地滚下来。

正在这个时候，传来了脚步声，咚地一声，两只竹筒顿在井台上，王生急忙喊：

“救命吧，有人掉到水里啦！”

“你是什么人？”是一个年轻人的声音。

“要饭吃的！”

“要饭吃的没长眼，为什么单往井里掉？”

“我是瞎子，看不见。”

“瞎要饭的，你把整个井都弄脏了，还叫人教你！”说着担起竹筒走了。

王生急忙喊：“行行好，救救命吧！”

可是脚步声越来越远，已经听不见了。

王生一阵心酸，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过了一会，又来了几个人，他们系下一只筐，把王生拉上去。一到上边，北风一吹，王生浑身的衣服马上冻得

硬梆梆，象铁板一样，冻得他得得打战。这时候那个年轻人站在旁边大声对王生喊道：

“你个臭要饭的，把整个井都弄脏了，你不给掏井你走不了！”

一个老汉对年轻人说：

“也不能怪他，他是个瞎子，愿意自个儿掉在井里？”

“你们都是一类货！臭要饭的。”

老汉急忙把王生扶到自己家里，一进家门，老汉啐了一口，骂道：

“有钱的崽子，说话也不怕缺德！”

老汉生上一盆火，让王生烤着衣裳，又问他吃了饭没有，王生说：

“不吃啦，哪还有心火！”

老汉给王生端来一碗高粱米饭，浇了一点热水，让他吃。王生吃了一点饭，觉得身上暖和一点，衣裳也烤干了，就趴在地上给老汉磕了个头，说：

“你老人家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老汉急忙拉着他说：

“别说这话，我也要过饭，唉！这要饭——受罪、挨骂，一句话，比死了强点。别说了，你赶紧回家吧。”

老汉把王生送到村外，指给他路，王生又再三谢过老汉，就顺着山路走下去。

离开猪狗生活，过着牛马日子

一九三五年，大汉奸殷汝耕把冀东二十二个县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随着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日本人的军帽、皮鞋和刺刀也来到遵化县一带。人们到处传说着，八路军中有个叫老包的（当时冀东军区的副司令员包森同志），带着一支神兵，到处打击日本鬼子和伪治安军，吓得鬼子和治安军修起岗楼，蹲在窝里准备挨打。

四十里铺也来了八路军，收了地主王维平的枪，王维平全家老小收拾东西夹着尾巴，跑到遵化城里去了。

这一天，王生出门讨饭，被伪治安军捉住，硬说他是八路军的探子，把他打得死去活来。王生浑身血糊淋淋地闖进家门，一头扎在炕上。老婆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只说了一句话：

“不打走鬼子汉奸，连饭也要不成了。”

王生在家养伤，老婆带着孩子出门讨要，在闾屯村小儿子又被地主家的狗咬伤，娘儿俩哭哭啼啼转回村来。村里人们看着他们娘儿俩可怜，就纷纷地议论起来：

“看，这媳妇年轻的多可怜！”

“是呀，跟着瞎子要饭吃，还不如自己走个主呢。”

这时候有个叫王兴的走过来，对王生媳妇说：

“这样兵荒马乱的年头，怎么能要着东西，还不如找

地方侍候侍候人，混碗飽飯吃。”

王生媳婦嘆口氣，說：

“哪有那樣地方，就是有，人家也不願要咱這要飯吃的。”

“遵化城里有，就怕你不去。”

“能帶孩子嗎？”王生媳婦是離不開孩子的，再說，帶出孩子，就帶去一張嘴。

王興想了想說：

“帶一個孩子，白吃飯，不掙錢。你回家跟王生商量商量。”

晚上，王生媳婦把這話一說，王生想了想，嘆口氣說：“你們娘兒倆逃活命去吧！”

王生媳婦來到遵化城里，王興把她領到一家。進門一看，原來是四十里鋪地主王維平家。王維平自從離開四十里鋪跑到城里，就投靠了日本人，當了漢奸區團長。王維平的媽得了屎癆（慢性腸胃炎），全家人誰也不願意走近她一步，在城里雇人侍候，人家一聽說是這種病，沒人願干，這才把王生媳婦找了來。

王生媳婦一看是地主王維平家，從心眼里不高興，可是事已至此，只好硬著頭皮答應下來。

王維平的母親是個尖嘴猴腮的老婆子，因為長期拉肚，臉色發青，兩腮深陷，腦袋活象個落干了的瓢葫蘆。她整天象豬似的哼哼，怨天恨地，不住聲地罵著人。不住氣

地拉着屎，說拉就拉，一时盆子拿不到，不管被上炕上，一拉就是一大片。可是她吃起飯来，还能頂个小伙子。王生媳妇每天要为她刷五六次被褥、六七次炕席。因为王維平家买水吃，不准用家里的水，刷被褥得跑到城外护城河边去。刷炕席只給一点点水，却要刷得非常干淨，不准留下一点味。每次刷完，老婆子都哼哼着象狗一样，把鼻子伸到炕席上嗅起来，要有一点味，就抓起拐棍，不管脊背脑袋一頓乱打，祖宗三代地一頓臭罵。王生媳妇过的就是这种日子。

王生媳妇每一次到城外护城河边刷洗被褥的时候，眼望着家乡的山巒，总会滾下泪来，心想：“躲开了猪狗的日子，过上了牛馬的生活！”

母子俩每天吃的不是糠子面就是豆腐渣；偶尔吃一次玉米面窝窝，还有限制，母亲两个，孩子一个。就这样王維平的老婆还常常罵街：“吃，吃，吃！象猪一样，就是知道吃！吃起来沒完。”

大人挨餓尚可忍耐，孩子可怎么受得了。小儿子整天圍着母亲哭着喊餓。媽媽只好把东西給了儿子吃，自己餓着。

有一天，王維平的儿子拿着一个白饅头在院里玩，王生的儿子吃着手指头，不停眼地看。王維平的儿子見王生的儿子站在旁边，便撇撇嘴，掰下一块饅头，喂了他家的小狗，然后又掰下一块饅头，丢在地上，对王生的儿子說：

“你来学狗爬，就让你吃了那块馒头。”

王生的儿子狠狠瞪了王維平的儿子一眼，罵了声“你个狗娘养的”，上去抓起馒头，投在他的脸上。

王維平的儿子哭着叫着告状去了，說王生的儿子打了他。

这一下可闖了大禍，王維平的老婆闖出屋来，千花子、万穷鬼地罵着，硬把王生媳妇叫出来，逼着她打自己的孩子。

王生媳妇被逼不过，就举起手来，輕輕打了儿子两下。这一下可惹火了王維平的老婆，她轉身走进屋去，提出王維平的馬鞭子，沒头沒脑地抽打王生媳妇。抽得她自己沒勁了，才把鞭子拋在王生媳妇面前說：

“我看着你，你給我打这个小臭要飯的！”

王生媳妇无奈，拾起鞭子，一看儿子——儿子两眼射着哀求的光，手象提着千斤的石头。

“打！打！”王維平老婆逼迫着，吼叫着。

王生媳妇把眼一闔，举鞭向儿子抽去，每抽一鞭，比抽在自己心上还痛，儿子每哭一声，就象錐子扎她的心……

沒娘管的孩子

母子俩离开家，王生心里难过得不行，可一想他們能

吃上飽飯，也就心平氣和下來。

這幾天王生的傷勢漸漸地好起來，就帶着大兒子出門討要。他們走一庄過一村，天到晌午的時候，來到小寨。時令已是中伏，天氣炎熱。王生直覺得頭暈腦脹，老想嘔吐。就对兒子說：

“我們在樹蔭里歇歇腳，睡一會，等涼快一點了再進村討要吧。”

王生躺在樹下，不一會就睡着了。

等他一覺醒來，用手一摸，不見了兒子，叫了兩聲，也沒有回答；正在納悶，一班孩子領着個六十來歲的老奶子，氣汹汹地走過來。說：

“你們要飯吃的怎么也禍害人？我家剛做好的一鍋黍米粥，你的孩子把一個黎雞窩給捅在鍋里，叫我們那些受苦的回來喝西北風？”

王生趕緊賠禮道歉，說一定好好管教他，抓住他要狠狠地揍他一頓。

本來老奶子氣頭很大，見王生瞎目失眼的，帶着孩子討要，也怪可憐，又一個勁地向她說好話，氣也就消下去了。她嘆口氣說：

“你知道這鍋粥的米，來的多麼不容易呀！”

王生央求走了老奶子，就到处找兒子，東喊一聲，西叫一句。其實兒子就在旁邊一棵樹上，他听父親說，要狠狠地揍他，不敢下來。

日头平西了，听不见儿子回答一声，王生心里有些焦急，他想也许是他自己跑回家去了。摸到家一找，没有儿子。这下他可急了，围着村到处喊起来。

这时太阳早已经下了山，鸟儿入了林，家家都吃过了晚饭，有的在院里乘凉，有的已经入睡。村庄山谷静悄悄地传荡着王生喊儿子的回声：

“大……有……子……”

不知是因为夜静，还是因为他声音的哀伤，使人听了非常凄凉。老人们磕磕烟袋说：

“没娘管的孩子，多可怜！”

黎明的时候，西铺的武委会主任杜奎同志出差回来，走在村边上，看见一个树窟窿里有个人影一晃，他怕是坏人或敌人的密探，就举起枪来，对准树窟窿喊道：

“什么人，赶紧出来，不出来开枪了！”

一个小脑袋探出来晃晃说：

“是我。”

杜奎一看是大有子，就问：

“你怎么在这儿？”

大有子眨眨眼，不敢说实话。杜奎说：

“走，回家吧。”

王生一见儿子，一块石头落了地，他从心眼里感谢杜奎。把杜奎送出门去，待转回屋来，儿子又不在了。他心想：“这次走不远，过一会他自己就会回来。”可是，一天，

两天过去了，儿子踪影皆无。他吃不下坐不稳，围着村到处找着。后来，听村里传说，有人在鸡鸣村看见大有子放猪。他就赶紧奔到了鸡鸣村。

鸡鸣村有个叫贾广发的，是个比较富裕的户。这天傍晚在村边树下看见躺着一个小要饭的，面黄肌瘦怪可怜的。贾广发问他是什么村的，为什么不回家？小要饭的说怕爸打。贾广发说：

“你给我家放猪吧，让你吃得饱饱的，比要饭强。你愿意吗？”

小要饭的跳起来说：

“愿意。”

这就是大有子。

王生看见儿子很好，心想：放猪比要饭强，反正能吃饱。就高高兴兴地回了家。

过了一些时候，一天中午贾广发慌里慌张地走进门来，见了王生，为难地说：

“大有子出了事。”

王生象晴天霹雷，赶紧问：

“出了什么事？”

“摔坏了。”

“怎么摔的？”

“他去放猪，”贾广发摘下草帽一面搨着一面说，“我们村的治安军正在修岗楼，被狗日的馱子撞下出去，头和

腿都摔破啦。”

王生一听不知如何是好，在屋里轉了两个圈，抄起要飯棍子，拉着賈广发說：

“走，我去看看。”

儿子的头和腿都摔伤了，血糊淋淋地躺在炕上，昏迷不醒。王生用手摸着儿子，連声地叫着，他睜了一下眼，馬上又闔上了。急得王生沒抓沒撓的，扎撒着两只手連連地說：

“怎么办？这怎么和他媽交代，他媽要看見孩子摔成这个样，要心疼死了。”

这句话提醒了賈广发，他叹口气說：

“王生大哥，咱是有啥說啥，孩子摔成这个样，我看还是把他媽叫来好，万一要有个好歹哩。”

王生說：

“我馬上去叫，”說着他摸起要飯吃的棍子向門外走去。賈广发从后面赶来塞給他两个餅子。

王生来到遵化城里王維平家，把孩子摔伤的事和老婆一說，老婆馬上落下泪来。两个人去和王維平老婆請假。王維平老婆手夹着烟卷，眼望着窗戶，听完他們的話，又吸了一口烟，慢慢地吐着說：

“你走了，誰侍候老太太？”

王生是个老实人，遇事沒主見沒办法，只会心里着急。王生媳妇和他可不一样，是个能說会道、办事利落

的人。她一听王維平老婆的話，气得臉都白了：

“太太，叫你这一說，我們孩子的命还不如老太太的屎要紧呢唄？”

王維平老婆一听王生媳妇話里有刺，气得把眼一瞪，把烟头往地上一丢，說：

“一个臭要飯的，死一口子两口子的算得了什么！”

“是呀，”王生媳妇气得嘴唇打着顫。“穷人的命，路上土，任人踏来任人踩，誰叫他們穷呢？可太太你也有孩子、也有老人呀！……”

“什么？……”王維平老婆气得說不上話来。

王生怕老婆說出更难听的話来，就赶紧拉着她，向王維平老婆哀求說：

“太太，你行行好吧，就算你积了阴德，孩子好了一定来謝你。”

“来謝我！”王維平老婆用鼻子哼了一声，“我还不見呢。一句話，你不能走，吃了我們家的飯，就是我們家的人，叫走，你走；不叫走，你老老实实地給呆着。”

王生老婆气得眼前直冒金花，轉臉对王生說：

“好，你带着这个孩子回家吧，孩子死了，是他的命。你回家要好好地照看着这个孩子，千万别……一定要叫他长大成人……”說着掉下泪来，“他們既然不让我的孩子活，我也要在这儿死給他們个样儿看看！”

正在这个时候，王維平走进門来，王生媳妇的話他听

了一清二楚，他怕鬧出事來惹麻煩，就趕緊說：

“既然孩子病啦，就回去看看吧。咱們鄉里鄉親的，有話還不好說。”

王生趕緊轉過身來說：

“謝謝王先生，謝謝王先生。”

王維平一面脫着衣服一面說：

“謝什麼，咱們一村一土的。”他脫下衣服，點着一支煙繼續說：“王生呀，現在我是困難呀，等我鬧好了，虧待不了你們。讓你媳婦回家看看，就叫她很快地回來。”

“好吧，王先生，只要孩子好了，就叫她回來。”

王生媳婦一句話沒說，轉身走出屋去。

當他倆領着孩子出門的時候，上房傳出王維平老婆的聲音：

“你叫那窮婆子走了，你自己去侍候你媽！”

王生攜着孩子，老婆領着王生，一路跌跌撞撞地來到鷄鳴村，鷄已經叫了。王生媳婦闖進門去一看，孩子已經好多啦，也睜眼啦，也說話啦，雖然她落下淚來，可是心眼里安穩多啦。

賈廣發給王生夫婦做了飯吃，天已經明了。王生媳婦說：

“還是讓孩子回家養傷去吧，我再也不回遵化啦，在家守着孩子。”

賈廣發也怕再出事，就趕緊說：

“好呀，亲媽守着比誰也强。家里困难，在我这携斗粮食去。唉！我家的日子也是困难，在这人死鬼活的年月，有什么办法，要不他撞了咱的孩子，甬說你們，我也和他拉倒不了。这个，你不找他，他还想找你呢。唉，熬着吧。”

死，也要死在一起

一斗粮四个人吃，能吃几天。王生只好出門去討要。

这一天，天摸黑了王生还没有回来。王生媳妇心里焦急，孩子們不住連声地喊餓。王生媳妇只好到本村去要点。她走进屈福亭的家里（屈福亭是本村地主賊六子的狗腿子，过去凭着地主的势力，想尽办法欺侮老百姓），屈福亭的媳妇見她領着孩子进来，就赶紧說：

“咱們本村本土的这是干什么，来，快坐下。”她把王生的儿子領过来，上下仔細地打量着說：“这孩子多精神，看餓得这样子。”說着由籃子里拿出一个餅子，塞給孩子說：“吃吧。”

她让王生媳妇坐在板凳上，說：

“唉，这个年头可真不好混呀！”說着她用眼瞟着王生媳妇。

“唉，誰家也比我家强。”王生媳妇低下头。

屈福亭媳妇眼珠轉了三轉說：

“我說大有媽，現在的年月是自己的道自己走呀，你不能太死心眼了，放着鮮菜不挑，光溜着道边走。”

“唉，我可有什么办法！”王生媳妇叹口气說，“守着一个瞎子，两个不懂事的孩子。”

屈福亭媳妇眨了眨吃饽饽的孩子說：

“咱們乡里乡亲，我說句不系外的話，这样下去大人受罪是小事，要把孩子糟蹋了。就說你們老大吧，要真摔个腿断胳膊折，你們能要着吃养他一輩子嗎？”

“是呀，那可有什么办法呢？”王生媳妇觉得这話說的也对。

“办法是有呀，就看你走不走。”屈福亭媳妇紧接着話茬說，“要我說……算了吧，这話說出来叫你伤心，还是不說好。”屈福亭老婆故意把話头停住。

“你說吧，我不伤心。”王生媳妇平时也常为这些事伤心，今个有个人說說，心里也敞亮敞亮。

“要我說……咱們亲近我才說这話，要系外的我才不管呢。”

“你說吧，我不怪。”王生媳妇急于要听她的話。

屈福亭老婆故意把声音放低：

“叫我說，你們把二小子出給人，让他逃条活命，你們的日子也緩緩肩。”

王生老婆吃惊地瞪着两眼，說不出一句話。

“要是不对你的心思，就当我沒說。”屈福亭老婆用眼

蹊蹊王生媳妇，见她没怪罪的意思，又补充说：“你想想，这世界上卖儿出女的多着呢，想不开是个难受事，想开了是条活路。你想他将来长大了，还能忘了你们是他的生身爹娘？还能亏待了你们？这又是一个靠山！”

王生媳妇虽然心里难过，可生活逼得她无路可走，觉得这话也有点道理。就抬起头来说：

“这事我自己也拿不了主意，等他爸爸回来，我们商量商量再说。你的好意我领情。”

屈福亭老婆见有活口话，满脸喷笑地说：

“这个事你可得拿定了主意，他们瞎的瞎小的小，全靠你养活他们呢，你不救他们谁救他们！”

王生媳妇告辞了。屈福亭老婆满心高兴，觉得今儿个这个事真凑巧，正想找她，自己送上门来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屈福亭有个朋友想买个孩子，出的价钱不小，屈福亭夫妇就把这笔买卖揽过来。那个朋友来过几次，曾看见过王生的二小子，说象这样的就行。

王生回来，媳妇把出孩子的事和他一说。王生听媳妇的口舌并不反对，就叹口气说：

“我瞎目失眼的，全家就靠你养活，孩子也是你拉把大的，你如果愿意，我不拦挡。”

王生虽然这么说，心眼里可非常难受，晚饭他一口也没有吃。王生媳妇也象失魂掉魄似的唉声叹气。有心不卖，怕养活不成孩子；有心卖了，这心头肉真难割呀！

第二天屈福亭老婆来催她，王生媳妇說：

“我們还没商量好，商量好了去找你吧。”

其实有什么可商量的呢！王生倒在炕上唉声叹气，他明明是不同意，可不願意說出来。自己又拿不定主意，可真难呀！王生媳妇趴在炕上痛哭起来。哭着哭着，她忽然想起大嫂子——王荣家的，去和她商量商量，也許大嫂子会給拿个主意。

王荣家的把王生媳妇让在炕上，王生媳妇未曾說就先落下泪来。她把卖孩子的事先后后說了一遍，最后說：

“大嫂，你替妹妹拿个主意，这也是咱王家的骨血。”

王荣家的想了想，說：

“家貧、路窄、日子不好过，这是真的。可儿到底是儿，他是娘身上的一块肉，怀胎十个月不容易，一把屎一把尿，費了多少心血才拉扯这么大。为了一时的方便，就把他卖了。文书一写，更名改姓，任人家罵，任人家打呀，到那个时候，你心疼你难过，你有多少眼泪流不完呀，你就是抬个銀山去也換不回来啦！……嬌子，你还是死了这个心吧，咱王家再窮、再苦，也不能把亲骨肉往火坑里送呀。”

王生媳妇一面听着一面嗚嗚咽咽地哭起来，等王荣家的把話說完，她一头扎在王荣家的怀里說：

“嫂子，是我一时糊塗，你算是救了你侄子的命；就是

死，我們也要死在一起！”

屈福亭老婆的買賣沒做成，就咬牙切齒地在街上大喊大叫地說：“王生這家窮鬼，不依好，放着活路不走，再要飯誰也別給他，餓死這窩窮鬼！”

今 天

——今天是陽光普照

王生沒有餓死，他不會餓死。要按他自己的話說，就是人不該死總有救。不過，過去是從這一個火坑中被救出，又走進另一個火坑；今天，是永遠地跳出火坑，是受苦人自己救自己，是受苦人組織起隊伍，在共產黨、毛主席的率領下，打下了天下，徹底地翻了身。

春 雷 第 一 聲

隨着解放戰爭的勝利，解放區響起了第一聲春雷——土地改革開始了，千年的封建制度要消滅，受苦人的窮根要拔掉。遵化縣四十里鋪也象其他解放區的村莊一樣，敲起春雷般的大鼓。這鼓聲召喚着人們，鼓舞着人們，受苦的人站起來，向地主階級進行鬥爭，奪回祖祖輩輩的勞動果實。

王生这个被旧世界压倒的人，在鼓声中抬起了头，挺起了胸，站在自己的阶级队伍里振臂高呼：“打倒封建地主！”王生的眼睛是瞎的，可是他的心突然亮起来，他好象看见，受苦人的黑夜过去了，东方升起一轮红日。

在全村诉苦大会上，人们要王生诉苦，可是他站在台上却说不出一句话来。他的苦处太多了，是语言所表达不出来的，他只有痛哭流涕，人们就跟着痛哭；他只有热泪双流，人们就跟着他流泪。王生的眼泪，不完全是悲痛的眼泪，是悲痛和欢乐混合起来的，是告别昨天迎接今天的眼泪。就在这种眼泪和欢笑声中，他家分得了七亩八分土地和一些家具。家具他并不怎么喜欢，可是土地，当日宣布这七亩八分土地属于王生的时候，他止不住热泪盈眶，滚滚流下。土地呀土地，爷爷不是为你而死的吗？爸爸不是为你而亡的吗？全家人不是因为你才流离失所、东奔西跑地讨要吗？今天你到底回来了！

王生有了土地，就计划着生产。一想起生产，他又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自己到底种上了自己的地；难过的是：自己是个瞎子，孩子又小，光靠老婆一个女人家，能把地种好吗？

这一天，王生和老婆来到自己地里。老婆看看这么一大片地，又没有牲口又没有农具，怎么个种法呢？就又悲又喜禁不住落下泪来。王生说：

“哭什么，有了妈妈还怕生不出孩子来！毛主席既然

把地分給我們，我們就是用手刨，也要把它種上，就是用眼澆，也要讓苗長起來。”

王生就是抱着這樣的決心種上了第一年的土地。苗兒出來了，長得還不錯，他樂得闔不上嘴。可是到七月間，蔣介石匪軍由長城退下來，路過四十里鋪的時候，把他的苗子割去喂了馬。王生媳婦為這大哭了一場。

第二年種地就更加困難了。一方面天旱，再加上缺勞力少肥料，這一年王生的七畝八分地並沒有打多少糧食，日子還是不好過。這個時候王生才明白，光有土地，沒有勞力肥料，還是打不出糧食來呀！加上這年秋後，村里出賣土地的很多，他心裡慌慌的想：“這還了家的土地，真個的就保不住了？”

這一天，村里有個叫張讓的到王生家來串門，說了幾句閑話之後，就對王生說：

“聽說了嗎？咱村好多人出地啦，你有意思嗎？白馬峪有人想要你的地，出的價錢可不少呀。”

王生一聽，頭頂轰地一下，就象天塌下來一樣。他驀地站起來說：

“我的地是毛主席分給的，是窮人翻身的地，是打倒地主的站腳地，是窮人的心，是窮人的命，他就是給我萬兩黃金我也不賣，想買我的地是瞎了心，瞎了眼！告訴他們吧，讓他們黑天白日想着去吧！”

王生躺在炕上，心裡比燒上一把火還煩躁，左思右

想,觉得过去的日子又在眼前晃哩。正在这时,王国藩走进門来,見王生愁眉不展,就問:

“二叔,有什么发愁事? 眉头上結着疙瘩?”

王生叹口气說:

“唉,甭提啦,国藩呀,有人想买我的地。”

王国藩說:

“是呀,听說了嗎? 咱村出地的可不少呀。”

“听說啦,这得請上級想个办法呀。”王生着急地說。

王国藩嘿嘿笑起来。

“上級早想出办法来了。”

“什么办法?”

“互助合作,組織互助組。”

“什么是互助組?”

“就是大家在一块干活,你少农具,我缺牲口,互相帮助,就能克服困难多打粮食。”

王生高兴地喊:

“那太好了!”

“好,你願意参加嗎?”王国藩問。

“那还用問,只要是共产党、毛主席提出来的办法,我都干!”

“問还是要問,”国藩笑哈哈地說。“因为这互助是自願的!”

“我举双手自願。”

从此王生参加了互助组。

参加了二年互助组，粮食比过去打得多了，可是还不够生活。王生每年除了领取国家的救济粮救济款和寒衣之外，有时还不得不拿起他的讨饭棍子和破铁筒，到远的地方去要一些。

最后一次讨要

到了一九五二年，村里出卖土地的更多了。互助组虽然好，可是抗不住天灾人祸。

这一天王生由外面回来，王国藩和杜奎正在家里等着他。王生一进门，王国藩就说：

“我们组织农业社，你参加不参加？”

“这农业社是干什么？”王生问。

“农业社就是把土地归在一起，牲口车辆是大伙的，大伙在一块种地，打了粮食地一半劳一半。”

王生想了想说：

“这农业社能叫大伙不卖地吗？”

杜奎一听哈哈大笑说：

“哥呀，农业社这个药正是治卖地这个病的，不信你吃付看看，保险你这辈子再也卖不了地。”

王国藩也笑着说：

“不但保你这辈子，它能保子孙万代。”

王生說：

“要是能保不賣地，就是跟着农业社要飯吃，我也走在前头。”

逗的王国藩和杜奎又笑起来。国藩說：“这农业社是引导大家走向幸福，再不受穷的道路，怎么能要飯吃呢？”

王生也笑了。

“我是打比方，表表我这心。”

就在这一年，王生参加了全国聞名的“穷棒子社”。

晚上，“穷棒子社”在王荣家开全体社員大会，大家討論了土地、牲口和农具問題。計算来計算去，二十三家只有三条馱腿，最后大家討論明年种地的籽种，有人說：

“咱們办起了农业社，国家还不貸給咱們籽种呀！”

王国藩說：

“咱不向国家伸手。我打个比方，咱办社好比一家子过日子，日子刚一过就向人借錢，那样的日子能过好嗎？”

又有人說：

“可咱們这二十三家是全庄最穷的，大家拿不出种子来呀。”

杜奎說：

“头年大家是怎么种的地，籽种是哪来的？”

大家嚷嚷着說：

“那还不是亲戚家要点，朋友家借点，湊合着种上啦。”

有人說：

“有的还是討要来的呢！”

王国藩說：

“对，我們就是討要，也要把籽种弄来。要沒有这种精神我看社办不好。有人不是罵我們是穷棒子嗎？我們就是要让他看看这点穷棒子勁。”

王生心里想：“着，要按这样办社，这样过日子，社还能办不好？明天我就去要种子。”

第二天王生起来，換了一身干淨一点的衣服，拿起要飯棍子，提起铁筒，对媳妇說：

“我去替咱社要种子去啦！”

王生媳妇笑着說：

“哪有要籽种的？”

王生說：

“看，要来千家粮，种咱社里的地，这是个吉庆事儿。旧社会那嬌生的孩子，不是要穿百家衣，长命百岁嗎？咱社里种上千家粮，幸福万年！”

說的王生媳妇也笑了。

王生今天出門討要，和以往二十几年的討要心情完全不一样。过去是饥寒交迫，如赴法場；今天象是赶庙会，走亲戚，总觉得象有点喜庆事在等他。他在山坡上不知不觉地哼哼起“皮影”来。

傍晚，王生回到村里，他要来了不少的籽种，其中最多的是瓜子。那年建明社种了不少的瓜，每逢社員吃瓜

的时候，都说：“这还是王生要来的瓜子呢。”说着大家哈哈大笑个不止，此是后话。

吃过晚饭，王生拿着要来的籽种，找到王国藩和杜奎，他把籽种往地上一放说：

“这是我要来的籽种，交给你们。”

王国藩和杜奎一看各种籽种都有，就哈哈地笑起来，笑得王生不知道咋回事，就问：

“怎么，太少呀？”

杜奎说：

“我的哥哟，你真去要籽种去啦？”

“你们不是说就是要籽种，也要把咱社里的地种上吗？”

“那是我们办社的精神，不向国家伸手的决心，不是真让你去要籽种。你可好，给你个棒锤，你就当‘针’认。”

国藩也说：

“你入了社，就是社里的人啦，出门讨要走陡坡过山梁，要出个差错，咱社里要担心，外人也笑话咱。”

王生说：

“看，我要了半天籽种，倒受起批评来了。”说完他哈哈大笑起来，又接着说，“国藩，杜奎，你俩知道，我要了二十多年饭，以为我还没要够吗？可是为了咱的社，你叫我干什么，我都干。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次讨要，是我此生此世最后的一次讨要了。”

討籽种这件事,直到現在,在建明社还傳为笑談。

第一年丰收

春天到了,社里开始种地,这可愁坏了王生。自己瞎目失眠,能干什么活呢?王生已經二十多年沒正式干过庄稼活了,在互助組的时候,組里的人都不要他換工,一方面是可怜他,再一方面怕他把苗子糟蹋了。現在入了社,还不是和在互助組里一样?

街上人喊牛叫,下地的人們象赶庙会,好象是故意向王生示威似的。他在屋子里唉声叹气,愁眉不展,象是丢了魂一样,坐下站起来,站起来又坐下。正在这个时候,杜奎走进門来:

“二哥哟,社里給你分配活啦。”

王生驀地一下站起来,結結巴巴地說:“給……給我分……分配了活啦?”他好象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又接着問,“我……我能干什么呢?”

杜奎說:

“別問啦,到地方你就知道啦。”說着把他拉起就走。他們来到一个羊圈的旁边,杜奎交給他一把铁鍬說:

“这是一把铁鍬,这是除出来的羊粪,”他拿着王生手中的鍬拍拍,“这是筐,”他让王生用手搖搖,“你把粪装在筐里,我們就往山上担。”

王生本来就是干庄稼出身，装粪这活又算不了什么，虽然他眼睛瞎，他的耳朵和感觉是灵敏的，他装得非常好，就是有一点半点撒在地上，他都听得见，等筐挑走了以后，他再用锨撥拉回来。

一筐筐的粪挑走了，只剩下王生一个人。他双手拉着铁锨，心里想：“我到底又能干活啦，我到底又回到大家的生活当中啦，大家干活我也干活，大家说笑我也说笑，这有多好，多叫人高兴！人们不是常说幸福吗，还有什么比这更幸福的呢？”

王生激动地流下泪来。

送粪的人们回来了，他们担来上圈的垫脚，倒在羊圈旁边。王生又为他们装上。人们又挑着走了。王生刚想坐下来休息一下，他忽然想起来，我要是把垫脚撒在圈里，不省得他们再垫吗？他攥着羊圈门，走进圈去，用脚摸着量量羊圈多宽多长，就站在羊圈外面撒起垫脚来，他撒得非常均匀。

王生的活路越来越宽，他不但能装粪上圈，还能出圈、锄草，不过这些都是家里的活，他总想干干地里的活。这一天，他找到国藩和杜奎说：

“二位主任，你们看地里的活这么多，大伙都忙不过来，能分给我一点吗？”

国藩向杜奎挤挤眼，意思是说：你看这没眼的人干劲都这么大。就对王生说：

“地里的活杜奎是总管，让他给你分配吧。”

杜奎想了想說：

“对，咱们正在耕地，咱们那‘三条驴腿’拉耩，还需要一个傍耩的。你要駕耩，让驴拉套，这不省下一个傍耩的嗎，你看行不行？”

王生駕着耩，凭他的感觉和精心走得非常直，如果后面一喊停，他馬上把套一拉，驴馬上就站住；这样他們配合的非常好，拿耩把的說：“比有人傍耩还好呢。”王生听了非常高兴，他觉得自己象是飞出籠的鳥，能随便地在广阔的天空中飞翔了。

晚上回到家里，王生拿过扫帚来扫扫院子，整理整理柴火，这些活做得非常利落快当，好象他的眼睛根本不瞎似的。王生媳妇有点奇怪地說：

“这老头子怎么啦，真象是越活越年輕啦。”

不錯，王生的青春正在恢复着。

經過一年的苦战，建明社得到了大丰收，平均每亩产量一百二十八斤。全村轰动了。这是四十里鋪的坡地从来没有过的最高产量，全社所有的人都象晚鳥鬧林似的議論着，異口同声地說：“这农业社就是比互助組优越！”

这一年王生全家做了二千八百多工分，共分現款八十多元，分粮三千二百斤。各种各样的粮食都有，破茅屋里盛不下，就堆在院子里，王生象喝醉了酒似的，守着粮

食坐着。晚飯做熟了，老婆叫他吃飯，他說：

“不知为什么，我不想吃。”

王生老婆也笑着說：

“我也是吃不下去。过去要飯吃的时候，一天价肚子餓；現在有了粮食，倒吃不下去了。”

月亮升起来，孩子們都睡了，王生还是舍不得离开。过一会，他抓起碎石般的白馬牙玉米，从这个手里倒在那个手里；过一会，又抓起大粒黄豆，从这个手里倒在那个手里。他总是喜欢不够，总舍不得离开它們，心里想：

“过去全家的粮食就盛在要飯吃的破铁筒里，破铁筒就是全家的仓库。全家人的生活，要看铁筒。铁筒滿着，全家一天的日子好过；铁筒不滿，一家就要餓肚子。如今社里的地，从南山到庄西，从北河滩到庄东，面积是这么大，收的粮食是这么多，光我一家就分了几千斤，要用那个破铁筒来量，那得量多少筒。过去唯一能保护全家的是那条要飯吃的棍子，那条棍也不过能擋一擋地主家的狗。如今保护全家的，是公社，是全国，是社会主义！”想到这里，他微笑着滾下眼泪，眼泪落在白馬牙玉米上，映着月亮，閃发着光亮。他又想到过去常听見人們說：受苦人的眼泪是苦的，享福人的眼泪是甜的。他趴下尝了尝自己的眼泪，笑着說：

“我的眼泪是甜的，我渾身上下都是甜的，我全家，我們公社都是甜的。”

重見光明

近来王生的眼睛总是发着光亮。人們都这样說，王生自己也这样感觉。

这是为什么？是因为日子好过啦？还是因为生活痛快啦？恐怕这两样都有。有的时候，突然一下王生觉得眼睛亮起来，眼前的人影、树木，社的牛馬、羊群、車輛，都在他眼前晃动起来；然而，就是那末一下，馬上又模糊起来。他心里想：“这大概是自己太想看看社里的东西了吧！脑袋里想出来的，不是真的看見的。”

这天清早，他起身时天还不甚亮，他要到南山去办一点事。走到山坡上天渐渐亮起来，他无心地抬起头来，啊！在他眼前出現了綠油油的庄稼，河滩的楊树閃着白光，弯弯曲曲流水的小河……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举起双手揉了揉，庄稼、树林、小河仍然显現在眼前。他睜大了眼睛，可勁的看着，可是这些东西越来越模糊，最后完全消失了。

王生回到家里，把这情况对老婆一說，老婆劝他說：

“你到医院去看看吧，万一要能治好呢？”

王生一笑說：

“治什么，都快五十岁的人啦。”

“看你这个人，”他媳妇有点不滿意地說，“你平常不

是常說，我們的日子還長着呢，我們越活越年輕，怎么今幾個倒賣起老米啦？”

王生搖搖頭說：

“我不是賣老，我總覺得是我的心看見了，不是我的眼看見了。治也治不好，何必費那個事。”

“有棗沒棗打一杆子，治得好治不好去試試。馬上去，和社里說說去。”

在老婆的督促下，王生找到國藩，把治眼的事一說，國藩說：

“前兩天我們在社委會上也議論了一下這個事，準備放你的假，让你去治眼，醫藥費由咱們社擔負。去，讓佟啟先給你開個介紹信，到區衛生院去檢查一下。”

王生來到鷄鳴村區衛生院，把介紹信交給張院長。張院長一看是建明社的王生，知道他在舊社會受了不少的苦，就特別關心仔細地為他檢查了眼睛。檢查過後，張院長說：

“你这眼睛要動手術，需要住院。”

王生一聽要動手術，心里想：“眼睛怎么能動手術呢，弄不好會瞎得更厲害。再說，社里的活正多，過一陣再說吧。”于是就對張院長說：“我回去商量商量，要是治我就再來。”

王生走的時候，張院長再三囑咐他，不能再耽誤，一定要很快地回來。

可是王生一去再沒有回来。

又过了一些时候，卫生院搬到四十里鋪；張院长專門到他家去动員他治眼睛。王生只是笑笑，既不說治，也不拒絕。他媳妇和張院长也熟，就打趣地說：

“你这治病的先生，都找上門拉买卖来了。我們治病沒錢呀！”

張院长笑着說：

“国藩主任早說啦，社里包起来，不用你們拿錢。”

王生媳妇也笑了。又說：

“你三趟两遭动員我們治眼，你能保好嗎？”

“你看，”張院长說，“我們都找上門来了，还不想治好嗎？”說的大家都笑起来。張院长又說：“这次治眼，你不用住院，把你送回家来，我每天来給你換药。”

王国藩和杜奎也几次劝說王生，就在大家督促之下，他的眼睛动了手术。他躺在家里，張院长每天到家里来給他換药。一个星期过去了，張院长取下他眼上的紗布，让他試一試，看看能不能看見东西。王生睜开眼睛一看，眼前一片明亮。人、房屋、窗外远处的山峰，都清清楚楚显現在眼前。可是他不相信这是真的，用手揉揉眼再看，这些东西越来越清楚，再也沒有消失。他感动地抓住張院长的手說：

“旧社会让好人变成瞎子，新社会让瞎子又长出眼睛来。”

一次現身說法的宣傳

一九五五年秋末。地淨場光，王生媳婦要帶着二兒子到薩河橋去看王生的三弟。

清早起來，娘兒倆換上了新衣服，穿上了新鞋襪，收拾得渾身新鮮，上下光亮，真象個走親戚的客人。他們又提着一個籃子，籃子里裝上點心、白饅頭，就動身了。

薩河橋在迂西縣內，離四十里鋪四十五里。娘兒倆走過幾條河灘，爬過幾道山梁，來到一個三岔路口的地方，正不知道走哪條路對，那邊走過來一個賣泥娃娃的。王生媳婦問：

“借光問一聲，上薩河橋走哪條道對呀？”

賣泥人的一看這娘兒倆穿得這麼新鮮，就說：

“你們上薩河橋呀！同路，搭伴走吧。”

三個人一路走，就拉起話來。王生媳婦問：

“你是哪莊的？”

賣泥人的說：“我是迂西縣人。”

“你們村成立農業社了嗎？”

“成是成立了，我還沒參加。”賣泥人的怕問，自己先說了。他接着問：“你們是哪莊上的人？”

“我們是遵化縣四十里鋪的。”

“四十里鋪的？”賣泥人的重新打量一下娘兒倆，“你

們庄的农业社出名呀，你們的主任王國藩，不是还进过北京，見過毛主席嗎？是真的吧？”

“是真的。”王生媳婦笑着回答。

“好，正好。”賣泥人的換一下肩說，“我正想問你一件事，你們村有個叫王生的吧？”

王生媳婦笑了，心里說：“你算問着了。”就馬上回答：“是有個叫王生的。”

“聽說他要了二十多年飯，家里苦得不行，還是個瞎子。入了农业社第一年就分了几千斤糧食。這是真呀是假呀？”

“是真的，第一年分三千二百斤，第二年分了三千七百斤。”

“我不信，农业社再好，一個瞎要飯的，一年就能分几千斤糧食，那除非是作夢，要不就是吹牛說大話。”

“是真的，不是吹大話……”王生的兒子想和賣泥人的爭辯，媽媽向他擺擺手，兒子还有点不高兴。王生媳婦說：

“這一說你不信，是吧？”

“我不信。”賣泥人的搖着头，“几千斤糧食，那得多大一堆，得多少布袋盛？要叫我一個人吃，得吃好几年。”賣泥人的羨慕地搖着头。

“怎么样才能叫你信了呢？”王生媳婦問。

“除非我亲眼看見。本來我想到四十里鋪去看看，因为道远，最近身子骨也不結实，就沒去了。”

王生媳妇笑了笑說：

“叫你亲眼看見也不难，咱可要賭点东西。”

“你說賭什么吧？”

“不用賭别的，你要看見了，就把你这泥人給我們两个，我們拿回家去給孩子玩。”

“那还不容易，大的小的你随便挑。”

“一言为定。”王生媳妇低头笑了笑，用手擰了擰衣服上的尘土說：“那么先請你看看我們娘儿俩这个穿着打扮，还有我們走亲戚拿的这些东西，”王生媳妇說着，掀开籃子上的毛巾，让他看看点心和白饅头。“我們家象个什么主呀？”

卖泥人的不解其意，更仔細地打量着他們娘儿俩。王生的儿子抿着嘴不敢笑出来，站直身子让他看着。卖泥人的說：

“你們家呀，最少也得种它个二三十亩地，养着一头牛，也許还有个小毛驴子，十几只羊。”

“要按成份俺象个什么农？”王生媳妇問。

卖泥人的想了想，說：

“中农吧，新社会中农比过去也高啦。”

“不再高点嗎？”

“高不了啦！”

王生媳妇噗哧一笑說：

“现在就让你亲眼看看吧，我就是王生的媳妇，这就

是王生的儿子。”

卖泥人的惊得站住脚步，上上下下地看着娘儿俩。忽然噗哧一声笑了。

“你真能逗呀，这样的事还能开玩笑！”

王生媳妇郑重地说：

“开玩笑有愿作人家媳妇当人家儿子的吗？”

卖泥人的一想，也是呀，就问：

“你们真的和王生是一家子？”

王生的儿子骄傲地说：

“真的是一家子，王生是我爸爸。”

卖泥人的顺手把挑子放下说：

“好，我信了！我认输了！你们挑泥人吧。”

王生媳妇说：

“那只是说说笑话，哪能真要你的泥人。”

卖泥人的拣了两个最大的泥人放在地上，挑起挑子就走。王生媳妇赶紧说：

“我们不要你的泥人，赶快挑着卖去吧。”

卖泥人的回过头来说：“我不卖泥人啦，回村参加农业社去，泥人算我送给建明社啦。”

新房旧屋

四十里铺分东西二铺，中间相隔一条道。这条道，南

去上长峪山谷，北来下河滩树林，是东西二铺的中心。全村有什么集会、娱乐、庆祝的事，都在这里集合。这里常常停放着社里的拖拉机、胶轮车，或其它的新式农具。东西二铺的社员们，每天上山收拾果树，下地拾掇庄稼，都从这里走过。去建明公社参观的人，也必须经过这里。

就在这样一个显要地方的东北角上，有一间破茅屋。那真是破得不象样子——屋顶的茅草，好多年以前就发了朽，有的地方凹下去，有的地方凸出来，茅草变成酱黑色，活象多年的陈马粪，如果走近了，还会嗅到一股朽酸的霉味。再看那墙壁，简直象乱石堆，有些地方还有点墙壁样，有些地方窟窟窿窿的，用乱石堆堵着。整个茅屋活象个干瘪的狗尿台，上面溅着稀泥。这样的茅屋不用说人住，连猪狗都不让进去，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这就是伴随着王生全家要了二十多年饭的那间破茅屋。

就在这间破茅屋的西北面，也不过相隔十步远，盖起了五间宽大的石头新房。这房真是又坚固又漂亮，青石垒的根基，白石作的墙壁，白灰灌浆，青灰抹缝，石头的楞角对得非常巧妙，构成了自然的花纹；远远看去就象古代的图案。屋顶是石灰抹的，三年五载也别担心会漏。就连屋顶的烟囱，也是亭楼式的，烟不是从上面冒，而是向四面出。再看看那焦黄的窗户，已经上过两遍油，闪闪发亮，衬得窗上的玻璃都分外清亮。屋里面的墙壁是白灰亮过的，镜明雪白，尤其是太阳照在窗上，屋内显得又豁

亮又寬敞。這就是王生參加農業社四年後蓋的新石房。

那間破茅屋和新石房並排地站在那裡，顯得它那麼縮氣，那麼難看，石房是那麼高大，那麼雄偉有氣魄。對比之下是那麼不相稱。路過這裡的人，都會這樣想：在這樣漂亮的房子旁邊，為什麼非留着這樣一間又破爛又陳舊的東西呢？拆了它，壘上一道新牆，再種點瓜菜，不是更好看更合適嗎？對，這新房舊屋的主人——王生也是這麼想的。

新房蓋好的那一天，王生讓老婆做了頓肉餃子，外加二兩燒酒。吃完餃子，王生驀地跳下炕去，伸手抄起一把鐵鎬，對老婆和兩個兒子說：

“走，拆那間傷心的破茅屋去！”

茅屋沒拆了。為什麼？咱們話分兩頭說。

近來王國藩看到一些現象，使他很傷腦筋。比如，有些青年人過上了好日子，卻不知道好日子是怎麼來的。一年，全村有二十幾對結婚的，這是很大的喜事，可是這些年輕人結婚後，不說好好鬧生產，讓地里出產更多的糧食，卻都擺起闊氣，講究起穿戴來。今天這一對請假趕集，明天那一對請假進城。下地晚，收工早，隊長教育他們好好幹活，他們卻說：“忙什麼，有吃有穿，銀行里存着錢，少做點沒啥。”就連戴存這個受苦的孤兒，也穿起買的千層底鞋上山幹活計。這些事總是在王國藩腦子里轉游。

那天，開了個支委會，決定對這些年輕人進行一次新

旧生活对比的社会主义教育，請区委选一些教材。区委来信說：“光书本上的教材还不够，最好是活的真人真事，西鋪这样的教材是不少的。”

王国藩和杜奎一个个地盘算着，看看哪个最合适。这个时候正赶上王生的新房剛盖好，王国藩看看石房，再看看破茅屋，灵机一动，手拍大腿，心想：“这不就是最現成最好的教材嗎？这不就是新旧生活最好的对比嗎？”

說来也巧，就在这个工夫，王生夫妇带着两个儿子，拿着鍬鎬走来。王国藩一看，赶紧迎过去問：“你們干什么？”

王生說：“拆了这个伤心的东西！跟着它受了一辈子罪。”說着叭嚓就是一鎬。

王国藩上前抓住鎬把說：

“这間茅屋可不能拆！”

“为什么？新房盖成了，出来进去的看着它，就想起过去，想起过去就伤心，不如拆了心淨，把过去的苦日子忘它个一干二淨！”

王国藩笑了，說：

“嗨，就是为了你說的这个，才不能拆它。”

王生眨眨眼，不明白王国藩話里的意思。

王国藩看看那間破茅屋，說：

“咱們上了几岁年紀的人，吃过旧社会的苦，尝过苦日子的味，知道过去是怎么回事，才懂得今天的好日子来

的不容易。那些年輕人，吃水不知道井怎么挖。不知道过去就不懂得現在，忘了过去就是忘了根，忘了本。天长日久，沒根沒本，就象山上的树，風一刮雨一打就倒下了。这间破茅屋就是过去，这五间新石房就是現在，让他们看看茅屋，讲讲过去，想想現在，这样他们就会知道今天的好日子是怎么来的。你說这间破茅屋拆得嗎？”

王生听了这一番話，感动得把鎬一扔，說：

“好，叫你这一說，不只年輕人，我們上了岁数的人也不應該忘了过去。我把它留着，出門看看它，进屋想想它，閑着沒事說說它，让子孙万代記住它，知道我們的日子是由什么道上走过来的。”

說得王国藩笑了，王生夫妇和儿子也笑起来。

过了几天，上海电影制片厂来拍建明社的記錄影片，正好拍到王生夫妇过去討飯这一段生活。拍电影这是个新鮮事，全村男女老少，尤其是年輕的小伙子、姑娘和媳妇都来看熱鬧。王生家的院子里鬧鬧嚷嚷，風雨不透。这时候王生夫妇穿着过去討飯的衣服，拿着破铁筒和棍子（这些东西是特为保存下来的），走出屋来。大家一看，挺新鮮，都哈哈大笑起来。这时拍摄工作还没有准备停当，王国藩看看是个机会，就把王生夫妇叫到破茅屋跟前，指着破茅屋問一个小伙子：

“笑半天，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嗎？”

小伙子撇嘴一笑，說：

“誰不知道，这是王生叔过去要飯时的房子。”

王国藩又問：“他們是怎么要的飯，为什么要飯？跟这間破茅屋有什么关系？他又是怎么瞎的？”

小伙子被問住了，直楞着两眼答不上来。

其他年輕的小伙子和姑娘們也直了眼，他們心想：“是呀，过去只知道王生叔他們要飯吃住这間茅屋，王生叔他們是怎么要的飯，又是怎么瞎的眼？跟这間破茅屋有什么关系？象也听老人讲过，当时沒仔細听，日子长了，模模糊糊地也記不清了。”

有些才过門的新媳妇，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心急地問：

“是怎么回事，主任，你給讲讲吧。”

“还是让他自己讲吧！”王国藩指着王生說。

王生就把他們夫妇如何結婚，如何瞎了眼，怎么样討飯，从头至尾讲了一遍。

有些人听呆了，年輕人的臉上表现出憤怒。

这时王生臉上两行热泪，刷刷地滾下来。他是为过去的苦日子伤心呢？还是为今天的幸福生活所感动呢？恐怕两者都有吧。

就这一天起，新旧生活对比的社会主义教育开始了，課堂上讲，实生活里看，王生的“新房旧屋”就成了有力的活教材。

直到現在，全西鋪的人每逢走过这間破茅屋的时候，

总是看它两眼，想想过去的苦日子。他们把这间破茅屋，当成新旧生活的标志，每逢看见它，就想起今天的好日子来之不易，无形中身上增添了新力量，不管干什么活，劲头都好像用不完。

尾 声

《王生家史》写到这里应该结束了，也许有人要问：王生家现在的生活怎么样？我可以简短告诉大家：一步比一步好。因为他们正沿着人民公社这条康庄大道，一步一步走向幸福，走向人类的希望——共产主义。但是，王生深切地知道，幸福的取得是多么不容易，需要付出多少痛苦、眼泪、斗争和劳动呀！王生全家现在常说这样一句话：“要不是共产党，我们哪有今天。”这句话听起来很平常，然而出于王生之口，这其中包含着多浓厚的感情和切身体会呀！新社会旧社会，一字之差，生死之别。有谁比王生全家体会更深刻呢？

王生不会讲理论，但对新旧社会的深刻体会，使他的话总是能让人信服、尊敬。他常说：“过去的日子是过去了，可给我们留下的痛苦要永远记在心上，永远不能忘本。”

多少血泪多少恨

——黑龙江省庆安县久胜公社林场大队

党支部书记路凤桐的家史

路 方

春节的团聚

今年春节，路凤桐哥三个又团聚了。

路凤桐住在久胜乡的王诚屯。他两个兄弟住的屯子并不很远，一眼就可望见；但是农活很忙，哥三个要碰在一起，谈谈心，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久久盼望的春节来了，去年的收成又很好，两个兄弟便到王诚屯，给大哥路凤桐拜年来了。

路凤桐自然满心欢喜，虽然他害肺病已有七八年，去年还吐血，一见亲兄弟到来，就急忙张罗包饺子。他住在新盖的两间新房里，玻璃窗透亮，白雪闪闪，照得屋里分外亮堂。两位兄弟在炕上坐定，就摆上炕桌，烫了酒来。

这样欢欢喜喜地过一个年，在解放以前是不能想象的。苦难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生活过得象火炭般红，这兴旺之气，不仅路凤桐心中高兴，那两位早已成家的兄

弟，心中也是热乎乎的。

喝着酒，談着心，二三十年前的往事都来到嘴边。多少欢乐，多少愁苦，就象乱线似地交織起来。

突然，路凤桐說道：“二兄弟沒有活到今天！”

坐在他身边的两个兄弟，都放下酒杯，象触了电似地一下呆了。只有阳光照着炕桌上热气騰騰的菜碗，屋里忽然显得这样寂靜。

他們都在想，想二兄弟。

岁月象呼兰河的流水，滾滾而去。多少年过去了，多少事情忘怀了，多少人的面影記不清了。但二兄弟，他的面貌，他的声音，他走动的样子，他在气絕之前的呻吟，是那么清晰地留在心上，浮在眼前呵！二兄弟，二兄弟！他早就走了，含着眼泪，染着一身鮮血，死了。再也不会看見二兄弟了。

路凤桐按着炕桌，哭了。地主的皮鞭也沒引来过他的眼泪，而今天，他那么伤心地哭了。

两个兄弟望着大哥，想劝慰大哥的話还没有說出口，眼泪已象断线的珠子一样，一个劲地流着、流着。他們靠在大哥身上，他們抱住大哥，痛哭起来。

二兄弟早就死了。哥三个的幸福生活，他看不见；哥三个凄切的哭声，他听不见。他是含恨而死，他是受屈而死，他是被折磨而死的呵！

二兄弟之死

东北解放前三年，路凤桐二十七岁，他的二兄弟才十四岁，小小的年纪也跟他的大哥一样，从小就跟人扛活了。力气小，半拉子活也顶不住，谁个财主愿意雇这样的小孩呢？那年春节，路凤桐一家八口，老的老，小的小，一粒米也没有，揭不开锅盖，路凤桐便与他的二兄弟，拉着一个小爬犁，顶着呼啦啦的雪风，从这个屯子到那个屯子，讨饭去了。

积雪遍野，家家闭门，哥俩个在这一家的门前站一会，又到那一家的门前站一会，路凤桐不敢叫，二兄弟也张不开嘴。冻了一天，只好空着两手回家了。

家里，有六个人等着吃呀！

娘说：“讨饭，就得大声叫！”他们听娘的话，用额头贴着冰凉的门缝，叫着，喊着，等待着，哀求着。

他们拉着小爬犁，快把冰雪拉化了，春天快来了。

二兄弟终于得到一个机会，给富农王玉家放牲口了。

全家人都高兴，爷爷、奶奶，腿残废了的爹，身体衰弱的娘，都高兴。但高兴的日子是那么短！那一天，春雪飘飘，冷风逼人，二兄弟赶牲口出门晚了，就犯了东家的律条。

“你太早了！”东家冷酷地說着。

年幼的二兄弟还没有来得及細想，东家便从他手中夺去了放牧的鞭子，紧接着便是劈头盖臉的一頓抽打。打了那么久，打的那么重，牛群都惊惶地躲开了。二兄弟先是用手护着头；后来，他被东家踢倒在雪地上；鞭子打断了，用鞭杆打着，不停地打着，雨点似地打着。二兄弟的血，流在雪地上，又被雪花盖住了。荒涼的曠野刮着刺骨的寒風，流蕩着凄慘的呼叫。那是一个如此黑暗的日子呵！誰来救救这可怜的孩子呢？

二兄弟被打坏了，二兄弟被吓坏了，东家也打累了。二兄弟爬起来，一臉一身都是鮮血。父母不在他的身边，兄弟不在他的身边。要哭，沒处哭；要訴，沒处訴！他帶着一身伤痛，逃跑了。当他从王誠屯子跑到刘家燒鍋屯子，他便倒下，昏迷不醒了。

路风桐的爷爷知道他的孙子昏死在刘家燒鍋屯子时，天已經很晚了。老人把孙子背回家，放在土炕上，亲人圍在被毒打的孩子面前，亲人的泪滴在被毒打的孩子身上，亲人的喊声响在被毒打的孩子身边，二兄弟是看不見，也听不見了。

这垂危的伤势請誰来医治呢？沒有一个錢，医不了的！这仇，这冤屈，向哪儿去告呢？沒有一个錢，告不了的！二兄弟！你能看看亲人的眼泪也好！連这点在无告中的安慰也落了空呵！过了两天，二兄弟便死了。

二兄弟死了，穷人的苦难并没有完。

又是一个春节

二兄弟死后，路风桐的四兄弟又去给一个姓张的地主扛活。四兄弟年纪小，不能下大田，还是放牲口。每天要把三十来头马和牛，赶到大甸子去。

真是行船偏遇打头风，屋漏又逢连夜雨。四兄弟在甸子上竟丢失了地主的四头牛！

四头牛！象塌了天，路风桐全家都吓昏了。

地主说：路家儿弟兄要扛四年活，来顶牛钱。

这年是白干了。

春节来了，地主回到街上过热闹年节去了。地主临行时，吩咐他的管事：“路家的欠债还不清，不准借粮！”

狠毒的地主，要饿死路风桐全家。

没有地方可去，没有路可走。除夕，路风桐在屯子里走了半天，明明知道是刀山火海，也只得向地主家走去。他去求地主的管事了。

管事推得一干二净，开口说：“东家不准借粮！”闭口说：“东家不准借粮！”

路风桐想往回走，往回走没有路。家里早就没有吃的了。

千求，万求，地主家勉强答应了一一从年初一开始，

鋤三天草，給一斗黃米。

大年初一的早晨，漫天的風雪，路風桐穿着妻子出嫁時的那件又小又破的紫花的薄棉袄，用條破麻袋片遮着下身，去給地主鋤草。

馬棚外的積雪有二尺深，鋤刀把涼得粘手，他坐在鋤刀邊，哆嗦着，一把一把地鋤着草。不到一袋煙功夫，手脚都凍的沒有知覺了，大腿凍的象刀子扎似的。他只好起來跳一陣，跑一陣，再坐着干活。就是這樣，地主家也看不順眼了。

“怕冷就回家吧！”

路風桐只好聽着，只好坐着，哪怕凍的腿上都起血泡了。

多么艱難的一天過去了，多么長的一天過去了。晚上，回到家里，娘看見兒子凍成了這樣，媳婦看見自己的親人凍成了這樣，悄悄地把流到嘴邊的眼淚咽了下去。

第二天過去了，第三天過去了。

當第三天的晚上，路風桐回到家時，他的雙手完全失去了知覺，僵硬了，象石頭雕成的一樣。當娘看見兒子這雙僵硬發白的手時，老人忍不住驚叫起來。老人看見，只要一敲，指頭就會象冰柱似地掉下來。

庄稼人的手是命根子呵！去年，一場斑疹傷寒，全家人都被傳染，老老小小躺在一鋪炕上，沒有吃，沒有喝，更不用說請醫生、吃藥了。沒有幾天，爷爷死了。又過几

天，爹也死了。母亲把唯一的一件破棉袄脱给爹，光着膀子躺在炕上……路凤桐就成了全家的依靠。而他的那双手呵，竟被冻成冰棍一样！

被惊吓得浑身颤抖的母亲，端来一盆凉水，把路凤桐的没有一点知觉的双手，浸在凉水中。母亲喃喃地为儿子祝禱：“能把冰缓出来，就得救了！”

路凤桐的灰白色的手，浸在冰凉的水中，渐渐，手指周围结上一层薄冰了。渐渐，手背手掌都结上一层薄冰了。渐渐，薄薄的冰变厚了。路凤桐的手终于从冰壳中退出来了，终于活动了。母亲摸着那双得救的手，才放声地哭了。

第二天，路凤桐去到地主家，拿着口袋去装一斗黄米。谁能想到，地主家是骗他的。地主的管事告诉他：“东家说的，牛钱不够扣，黄米不给了！”

黄米不给了！路凤桐差点送掉一双手！他白干了。在地主家欢欢喜喜过春节的日子里，他白干了；在冰天雪地的日子里，他光着手脚，用麻袋片裹着下身，替地主白干了。他差点气疯了！

有多少苦水在路凤桐的心中呵，能流成河，流成海！

年年苦年年愁

路凤桐是一九一八年在王诚屯出生的。他的父亲是

从小就给人扛活的，父亲二十来岁时，给地主拉粮食，被铁车把一条腿压断了。父亲过早地失去了劳动力，九岁的路凤桐便给地主扛活了。

他的童年是在地主残酷的剥削中度过的。

他开始是放猪。他从未离开过家。母亲疼爱他，但留不住他。艰难的生活使幼小的路凤桐成天跟猪群作伴，当他把猪群赶到野地时，他多少次放声地哭过。哭了，脸上的眼泪又被风吹干了。

他从十岁起，就放大牲口了，放马、放牛，给富农放过，给地主放过。

冬天在路凤桐的童年里，是最无情，最凶狠的了。穷困得连饭也吃不上，哪有钱买鞋，买袜呢？那些冬天的早晨，冰雪遍野，北风卷起雪花，象烟似地旋转着，牛马的身上都挂满白霜；就是在这样严寒的时刻，路凤桐赶着牲口，向白茫茫的甸子去了。他赤着脚，浑身发抖。唯一的期待，就是牛马能拉一泡屎或撒一泡尿。当牛马拉屎了，他就赶忙站在屎堆中，这样来暖和一下他冻得血红的双脚；当牛马撒尿了，他就立即站在尿中，来暖和一下冻得象针扎一样的双脚。

路凤桐十八岁那年，才算一个整的劳动力，给地主赶车了。

姓路的地主是以贪婪闻名的。他见路凤桐在冬天还穿着单衣，有时披一条麻袋片子，怕他冻病了影响给他干

活，便把一件馬皮的上衣給了他。馬皮上衣自然比麻袋片子擋風。沒有几天，地主又怕那件破旧的馬皮上衣被路凤桐穿坏了，要收回，不給他穿了。路凤桐是人穷志不穷，他把那件馬皮上衣扔給了地主。他說：“单衣我一样过冬！”

从此，每当他赶車的时候，他就不能坐車了，只能跟着車跑。赶一天車，就跑一天；赶半天車，就跑半天。有时，車走得慢，他得欢跑，跑的老远，又跑回来——用跑来对付严寒。

他除了赶車，还挑过沙子。一天到晚地挑，肩头压了一个坑，那层又厚又粗的茧皮，紅头火柴在上面一划就着了。

这样劳累，这样受穷，还是不能改变一家人的景况。从姓王的地主家，走到姓路的地主家；又从姓路的地主家，走到姓張的地主家。这些地主都象大石碾子一样压搾他，象狼一样吃他。他的童年在受冷受餓中过去了。他的青年时代也在苦挣苦斗中过去了。三代人八口之家，有的被富农打死了，有的在地主的盘剝之下，穷死了，病死了。最后只剩下哥三个了。

地主豺狼心

难忘的是路凤桐十八岁那年。

他长大成人了，不是干半拉子活了，他心里曾暗暗欢喜过：从此能为家里多挣几个了。跟他同辈的年轻人，也曾羡慕过他腰圆膀宽，力气过人。

那年秋末，他为姓路的地主赶车，拉豆秸。

他把豆秸捆在车上，赶着牲口往屯里去。地主看见了，叫住了他。

“我的饭不是白吃的！”

路凤桐没有白吃地主的饭！哪一天不是起早贪黑地象牛马一样干活呢？

地主凶恶地指着车上，豆秸没有压紧，太松了。

路凤桐从小就沒有穿过鞋子，要把乱七八糟的豆秸压紧，非得爬到车上，用脚使劲去踩。他爬到车上了，踩着，又踩着。再把豆秸抱上去，再踩着，踩着。豆秸上的刺，就象千万支小针，密密麻麻地扎在他的脚上。这样，他一次又一次地赶着车，每走一步都象走在刀尖上。

晚上，他回到家里，他的脚已疼的不能挨地了。

早晨，母亲看见他的双脚，因扎满了豆秸上的小刺而变成黑色了，肿的就象发面一样了。

有什么办法把那数不清的小刺拔出来呢？没有。已经是早晨了，还得去套车，还得去拉豆秸，还得让那数不清的小刺继续扎进脚里去，还得继续在干裂的土地上忍着疼走着，跑着。

一个工都不能歇的。歇几天，一年辛苦就给地主白

干了。

就是鋼筋铁骨也經不住这样的摧殘！

路凤桐的身体很快就累垮了。

他的心象一座要爆裂的火山，心中压着千仇百恨。

他二十七岁那年，解放了。土改时，他家划为一类，是全屯最穷的一家。

那天，他們哥三个去到地主家，指着姓張的鼻子問：“我們哥三个来还你牛来啦！要活牛？要死牛？”

那天，他們哥三个去到富农家里，指着姓王的鼻子問：“要你偿我二兄弟的命！”

仇恨的火山爆炸了。

一九五〇年他入了党……

一九五三年他带头成立了九戶人家的初級合作社……

結 尾

今年春节，路凤桐哥三个在这难得的聚会中，都哭了。

苦难的日子永远不会回来了，地主阶级是被推翻了，但那些深深的苦难，是永远不能忘的；在土改时的訴苦会上，路凤桐說过这些話，而这天，他又向他的两个兄弟說了。

路凤桐說：“沒有共产党，我一家人就沒了。”

路凤桐說：“公社党委要我休息，我不能休息。有一分热，要发一分光！”

他最心疼的一个小閨女来到他身边，嚷嚷着：“今年給我买一双新鞋。”路凤桐把小閨女抱在炕上，輕輕地問她：“你知道我小时候穿的什么鞋么？”

阳光照在小閨女紅艳艳的小臉上，她摟着經歷过无数辛苦的她的爹了。

1963年8月6日

南 阳 湖 上 一 家 人

——吉林省蛟河煤矿七井老工人潘建章家史

張 云 升

一提起旧社会，老工人潘建章便抑制不住内心的痛苦和愤恨，一时热泪盈眶，那张饱经风霜的脸顿时阴沉下来。他长叹了一口气，向我们一句句述说了一家人苦难的往事。

一

潘建章(原本姓徐，乳名福子)，原籍在山东省微山县的枣栗庄。福子爹徐奎仁领着一家三口人，靠着仅有的二亩薄田，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

枣栗庄位于南阳湖畔，庄子中间有一条运粮河，贯通南北，两岸四十余户人家，只有姓杨的地主家是青砖瓦房，他残酷地剥削着这一带的庄户人。南阳湖十年九涝，时常泛滥成灾，不知夺去过多少穷苦人的生命。福子就生在这天灾人祸、苦难重重的南阳湖边。

一九二七年，福子刚刚三岁，秋天，连绵大雨下了四

十五天，南阳湖水暴漲，泛濫成災。一天夜里，霹靂閃電，風雨交加，湖水和運糧河水匯成一股滾滾巨流，向庄里涌來。福子爹徐全仁在大水浸泡的破房子里手忙腳亂地收拾僅有的一點衣物，二十一歲的母親把啼哭喊叫的福子放在一個大筐籠里，準備涉水逃命。這時，嘩啦一聲，房蓋塌了下來，只聽見父親“哎喲”地叫了一聲，福子娘不顧一切地在泥水里推着筐籠向丈夫消失的方向扑去。可是，漆黑的暴風雨夜，只見一道道閃電，一聲聲巨雷，却看不到丈夫的影子……。

天亮了，烏云仍然密布在天空。母子二人昏昏沉沉地被沖到岸上，栗栗庄已經被大水淹沒了，只有庄里頂高的大樹的樹梢在水面上搖晃着，白浪滔滔的水面上漂流着門板、房木、尸體……，到處是一片淒慘的景象。

二

福子爹踪影皆無，又無親可奔，無友可投，福子娘若痴若呆，緊緊抱着福子放聲痛哭起來，真是叫天不應，叫地不靈。福子娘想，無論如何我也要找着福子爹。於是抱起孩子，拖着疲倦的身體，邊哭邊喊着丈夫的名字，在南阳湖邊轉來轉去，尋找一個月也沒有消息。聽說逃難的人都往北方去了，母子二人便餐風宿露，沿門乞討，也隨着逃難的人群，茫然地向北奔去。

天气渐渐冷起来了，福子光着下身冻得直打冷战，媽媽的单衣服也磨得大窟窿小眼子的遮不上身子，又冷又餓，福子娘瞅了瞅眼前的处境，不觉默然泪下，用手捧着福子的臉，悲切地說：“孩儿啊，咱們娘俩要冻死餓死啊！”三岁的福子看見娘哭了，也随着大哭起来。万般无奈，福子娘到荒郊野地的乱尸崗子拣了件死孩子穿的衣服，洗了洗給福子穿上，又在垃圾堆里拣了点破布把自己衣服上露肉的地方堵了堵。

希望一点点地破灭了。虽然向北走了好长时间，仍然沒有找到福子爹的下落。母子二人想要往回走，又不知道家乡在哪里。光記住枣栗庄，又不知哪府哪县，問問过路人，大家都摇摇头。就这样，娘儿俩背井离乡走了一年零八天，流落到一个叫做潘家台的地方。想找个庙住下，可是庄头的土地庙早已住滿了无家可归的人。轉了一天，腿都要僵硬了，好歹在潘家台找着一个破玄帝庙安下身来。

討飯的滋味真苦啊！一天，母子俩要飯来到何屯朱家大院。这地方，当地要飯的根本不敢来，外乡人哪里知道底細。剛一走上朱家的阴森森的黑漆大門台阶，黑心肝的地主便放出了两条恶狼似的大狗，一口将福子拽倒，福子的脚后跟被咬了两个大窟窿，鮮血象泉水一样涌了出来。福子娘惊叫了一声，不顾命地扑过去；幸亏赶集的人上前来帮忙，才把福子从狗嘴里搶了出来。此后，福子娘

再也不敢領福子去討飯了，每到一庄，就解下腰中的麻繩把福子拴在庄外的小樹上，或是場院的碾子上，讓他在那等着。可是福子一離開娘就大哭起來，福子娘心亂如麻，鬆開了繩子，狠心又綁上，走了幾十步遠又趕快跑回來看看，無奈，還得扔下“苦命”的孩子，含着眼淚，担着心獨自走去。

媽媽進庄討飯，十有九回是空手回來；福子餓急了，當媽媽不在時，就爬着啃吃道旁的青草和野菜。一來二去，肚子鼓得溜明淨亮，得了“大肚子”病。

這一年冬天，北風刮得透骨涼，福子病得奄奄一息，母子二人在玄帝廟里凍得昏沉沉的。媽媽顫抖地對福子說：“孩兒啊，老徐家就你這一條根苗，指望着你，誰想到你變成這個模樣！說什麼你也要活下去，讓娘好有個依靠！”說着說着，眼淚便流了下來。夜里，娘倆凍的抱成了一個團，福子娘想起老人說過的話：人前後心凍不着就死不了。于是在自己背心上綁上兩隻鞋，在福子前胸上放上兩隻鞋，緊緊地抱着孩子靠在廟牆上，他們就這樣苦熬着那些不眠的夜晚。

三

還是窮苦人的心連心，住在廟西邊的一個撿糞的老人潘慶道，看到這孤苦伶仃的母子無依無靠，難以為生，

三番两次地劝福子娘改嫁。福子娘看着身染重病的孩子，只好点头答应了。从此，福子才改了姓名叫：潘建章。

福子的继父潘占庭，四十岁才算成了家。这本是一件喜事，可是在旧社会，对穷苦人来说这却是压上了千斤重担。一家人也是吃这顿愁那顿。福子娘改嫁后总是泪水不干，渐渐眼睛上起了一层云翳，双目只能模模糊糊看见点光亮。潘占庭为了给妻子治病，把仅有的一间破房子和一点地典当出去了。一家人的“饭碗”没了。万般无奈，最后只好选定一条“活路”，逃荒上关东。

第二年早春，福子继父领着妻子和五岁的福子逃到了大连。潘占庭在码头上当了装卸工。谁知道人穷祸多，刚刚对付上一口饭，灾难就象无情的浪头连连打来。

一天傍晚，潘占庭在码头上卸货，干了一天了，两腿直发颤，走着走着腿一软，扛在肩上的箱子一下子摔到地上。把头赶过来不容分说，照着他的背后狠狠地用棒子打了起来。潘占庭是个倔强人，第二天便得了气鼓病。福子娘泪流满面地守着这被打得遍身青肿的丈夫，到第七天头上，潘占庭一句话没说便抛开了她们母子俩，离开了那万恶的世界。他昼夜奔波，可是到死时仍然穿着干活时那件破衣服。从此，福子娘两眼便什么也看不见了。

继父一死，生活的担子落在年幼的福子身上。他领着双目失明的母亲，流浪在大连街头，整整讨乞一年。小福子的大爷听见了弟弟惨死的消息，从潘家台赶来把他们

娘儿俩接回去。穷乡亲们凑了几个钱把一间四面透风的破房子贖了回来，让他们母子住下。这个周济点米，那个给点柴；可是大家都是受穷受苦的人，哪有更多的东西啊！瞎了双眼的母亲拉着儿子的手说：“孩子啊，咱们别老累赘着大家伙，还是自己想点办法吧。”于是，福子又拾起讨饭的破铁罐子，在周围村庄讨了四年饭。

到了十二岁，福子去给肥城县的富户王士奎放羊，言定一年工价七块钱。白天放羊上山，连双拖鞋也没有，光着下身赤着脚在漫山坡上撵羊，脚被树枝子、杂草划得一道道的口子，直滴鲜血，疼得他一步一咧嘴。夏天还好过，一到深秋就更难熬了，冻得两脚不敢沾地，看到老牛拉粪就赶忙跑过去站在上边暖和暖和。晚上回到家，吃点人家孩子剩下的饭，夜里就蜷伏在羊圈里。

这些苦处福子是不敢向娘讲的，每逢回家，娘便用手摸着福子的脸，一边哭一边说：“孩子啊，妈妈眼睛看不见你，能摸摸你也就放心了！”那时候的生活，真不如王士奎家的一条小羊羔啊！

四

福子十六岁，这一年肥城县来了招工的，说是到东北去，吃的好，赚钱又多。福子瞒着娘与同村的小伙子前去报了名，每人预支了三十块钱。夜晚，由肥城县万德站登

車，車開出了几百里路，化裝成老百姓的八路軍隨同勞工混入車箱，他們向大家点破了招工的騙局，砸开了車窗，領着大家跳火車逃跑了。回到家乡，同庄的年輕人都跟八路軍走了，福子也想去，但是因为有双目失明的母亲，被劝阻留下了。

福子偷跑回来，还使了招工的三十块钱，在家肯定呆不了，又起了闖关东的念头，便和母亲商量說：“娘儿俩在哪也是苦，不如出去闖闖也許能混上一口飽飯吃。”娘也无法可想，便同意了。福子搀扶着老娘，在一个阴暗的夜晚悄悄离开了潘家台，到东北蛟河县找表哥王培海去了。

有錢的財主哪里认得穷乡亲。福子的表哥王培海住在蛟河县德河沟，家有四十多匹牛馬、两套大車，雇了七八个长工。一見福子瘦小枯干又帶着一个瞎母亲，知道是吃閑飯的来了，小眼一斜，瘦臉立刻拉了下来。

福子娘看不到当时的情景，便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述說自己的苦难，哀求王培海留下母子二人。王培海总算是开了“善門”，让这母子俩住在一个破“馬架子”里。表面上見着福子娘还是舅娘长、舅娘短地称呼，其实骨子里却使了坏主意：不到五天就唆使村长抓福子的劳工，亏得福子躲藏的快，两次都沒抓着。

王培海一計沒成又生二計。一天，他笑嘻嘻地向福子說道：“兄弟，这里你是不能呆啦，我看你还是上奶子山

炭矿（現在的蛟河煤矿）吧！”福子看破了这狠心狠的奸計，二話沒說，辞別母亲来到了奶子山，在井下开水泵。

五

旧社会下煤窑就是下地獄，日本鬼子、把头、外勤就是閻王小鬼。上班，工人就象一群羊似的被赶进窑洞；下班，就把人塞进阴暗潮湿的工房子里。人不断地死去，奶子山上矿工的白骨鋪平了山坡，慘不忍睹。

一九四二年冬天，大雪飄飄，西北風刮得睜不开眼，天剛蒙蒙亮，福子下班了。伙計們求福子給捎“工牌子”（以工牌子来計算工时，当时捎工牌子是不允許的），他走到“牌子房”，剛把牌子放进去，不料被姓孙的外勤看見，一把扯住福子的脖領子，把他綁在“老虎系”（劳务系，当时管工人最厉害的机关，大家都叫它“老虎系”）門外的电綫杆子上，也沒打也沒罵。福子心想：“这回也許冻冻我就算完事。”不料姓孙的狗腿子从“老虎系”屋里端出一大盆洗臉水，狠狠地向福子头上潑下来。福子被澆得象一只落湯鸡，轉眼之間身上冻了一层冰，脖子底下結了大冰瘤，臉都冻白了。回到工房子，福子一头扎在土炕上便起不来了。

第二年春天，矿山鬧起傳染性的伤寒病，身体瘦弱的福子也沒有逃脫这一灾难。一个破工房里九十多人病了

一大半。鬼子、把头不但不想办法给工人治病，反而怕传染给他们，派了大批的狗腿子到工房里，把病重的全拖到奶子山后的万人坑活埋了。同房的老乡姜川良怕福子摊上横祸、扔下双目失明的母亲无人奉养，便偷偷地用大筐把福子送回蛟河县德河沟。四个月以后，福子病好了，也失业了，但总算是虎口余生，侥幸活了过来。

六

狠心狼王培海看到福子病刚好，不顶一个劳力用，便把福子找来冷冷地说：“兄弟，如今年月不大好过，我这小户人家也养活不了闲人，我介绍你到老吴家去帮帮忙吧！”就这样，福子又成了地主吴万增家的“半拉子”。秋天，福子的身体逐渐恢复了原状，王培海看见福子挺能干活，眼又红了，便把福子接回来，炒了四个菜，打了二斤酒，象迎接高门贵客一样，满面春风地说：“在外边也是干活，不如回家帮帮哥哥，哥哥不在乎你们娘儿俩……。”福子一听，气不打一处来，心想：“穷死饿死也不给你这狠心狼卖命。”于是，独自一人离开家上了“木帮”（伐木队）。

进山里伐木头，没有铺盖不行，只得花了积蓄的十五元钱买了一床大缎子被。福子有生以来第一次盖上被子，心中乐的不得了。没曾想，睡了一宿觉，被里就蹬个窟窿，用线一缝，连上这块坏那块。原来这床被子是地主家

多年的老箱底，早已腐蝕了，他白白地受了騙。“木幫”的生活是暗无天日的。整天在大森林里出沒，天不黑不許進工房。吃的是難咽的橡子面，穿的衣服磨得光剩下棉花套子了。福子一年磨飛了兩套棉衣、三雙靴，到年底一算帳，去了穿的就落下一張嘴。

“木幫”工人有病根本沒人管，看看病的不行了，“山把头”就在病人身上抹上油，用鐵勺子刮肋骨，說這是去毒火，刮得病人一聲爹一聲媽地慘叫。想跑吧，叫“山林隊”（山林警察）抓住就得打死。真是“上山容易下山難”啊！

不久大炮響了，小鬼子倒台了，苦難的日月熬出了頭。福子和窮哥們一齊下山，又回到了蛟河縣德河溝。打地主、斗惡霸，斗倒了狠心狼王培海，福子娘兒倆才算從深仇苦海里爬出來。

七

一九五一年，福子又回到解放後的奶子山，舊社會到處流浪的母子搬進了嶄新的職工住宅，福子也成了家。福子娘的眼睛瞎了二十七年，尋思是沒指望了，可是，經過礦山職工醫院千方百計地治療，動了四次手術，終於在一九五六年又重見天日，視力完全恢復了。福子娘樂得心都開了花，看見了已經長大成人的兒子，看見了膝前的

孙男孙女，看见了新生活，她又重新拣起针线颤巍巍地试着给小孙子缝起新衣裳。

生活一天天好起来，福子娘想起了往事，念念不忘被大水冲散不知死活的丈夫，心想让福子写信找一找，也许能找到。可是不知道哪府哪县，光记个枣栗庄，山东这么大个地方到哪去找枣栗庄呢？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七非来了一批新工人。一天，福子上班，听见一个名叫张金道的山东人说话口音和娘相似，一打听，原来是山东省兖州府微山县的人，离枣栗庄二十余里。哪府哪县找着了，全家人乐得一夜没合眼。

一封查找亲人的喜信捎到了故乡，徐全仁手捧着这封天外飞来的信，老泪纵横。阔别三十六年，一颗想念贤妻儿子的心象一汪死水又复活了，等不得写回信，星夜登车赶到蛟河煤矿。

一进门，全家人都不敢相认，徐全仁呆呆地站在门口，福子的娘也两眼直勾勾地望着这“陌生”人。半天，徐全仁才开口说道：“我从山东枣栗庄来，我姓徐。”福子娘这才失声叫道：“福子爹！”眼泪跟着唰地流了下来，徐全仁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夫妻二人分别时是一对年轻人，现在已经都白发苍苍了。想想过去，看看现在，一家人抱头痛哭，把几十年的苦水都倒了出来。原来，徐全仁被大水冲走后，第二年就回到了家乡，为了找他们母子俩，把仅有的二亩地卖掉，买了些针头线脑，扮做货郎，六

年時間他走遍了山東、山西、河南、河北四省，到處打聽親人的去向，可是母子二人如同石沉大海，影信皆無。後來，他叫日本鬼子抓去硬說是八路軍，打得遍體鱗傷。解放了，這條老命才算保全下來。

真是：

舊社會苦難重重暗無天日，
新社會黨救娘親重見光明；
舊社會妻離子散天各一方，
新社會家人團聚生活美滿。

路

——江西省新建县芦洲公社后洲大队

貧农涂孔美家史

陈 浪 朱孔生

引 言

从英雄的南昌城沿赣江而下数十里，有一个一望无际的洲子——芦洲，这就是新建县历来号称魚庫粮仓的赣江“二十四圍”。这里地肥水足，数以千計的农民，自古以来，就在这里辛勤劳动。

可是，在解放前的漫长岁月里，广大农民备受地主、恶霸、流氓的剝削和压迫，較之牛馬，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們有的慘死在地主的蹄爪之下；有的流离失所，客死外乡；有的卖儿卖女，骨肉拆散；有的想凭着自己的辛勤劳动，穷奔苦跃，建立自己的幸福生活。但是，旧社会的鎖鏈終于沒有能使他們驅开恶运的黑雾，他們只好由貧困走向破产，最后死亡。

涂孔美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今年六十三岁了，滿臉皺紋，留下了当年苦难的風霜。

破 迹

孔美能記事的時候，他家里是一個標準的中農。那時，他有父親、母親、弟弟和一個童養媳，一家五口，有祖傳下的三畝田地、三間瓦屋、一頭耕牛和齊全的農具。一家人辛勤勞動，日子倒也還過得去。

父親常把他們兄弟兩個叫到身邊，伸出一雙粗黑的大手，說：“伢崽，要不受窮，就要靠這雙手。作田人，要肯出力，來日收成好了，也好置辦些產業。”

當時，小孔美雖然不能完全領會這句話的意思，但從父母起早摸黑，省吃儉用的行動中，他体会到了莊稼人只有窮奔苦臥，才能有好日子過，所以放牛、担水、打柴、撈草，他從小就不吝惜自己的力氣。稍大一點後，他就到田里摔打去了。不幾年，就成了一個身強力壯的小伙子，學會了做田的一十八般武藝。而且他為人老實，勤耕苦作。

就在這時候，他們的鄰居，一個叫涂孟引的、圓頭肥耳、長着一雙老鼠眼的富農，却早已眼紅了，只是孔美家里並無敗迹，才遲遲沒能下手。後來，他借口修房子，故意把屋檐向孔美家這邊伸延了兩尺多長，然後說“滴水為界”，霸佔了他們的地基，并把煙囪對着他們的家門。一家人著實氣憤。但是，自古道：“財好人辣”，怎麼惹得起

別人？左思右想，也只好忍住了。

民國七年（公元一九一八年）農曆正月初一這天，孔美兄弟隨母親給窮親戚拜年去了。當他們回來時，忽然看見自己屋裡起了火；趕到家時，大火已經封住了門。全家除了搶出一條牛，一條小豬和一担火燒谷之外，家中財物都化為灰燼。有人親眼看見這大火是涂孟引放鞭炮引起的，但他財多勢大，孔美一家忍氣吞聲，不敢要他賠償損失。

火災的風波還沒有平息，涂孟引就親自上門，吡着滿嘴黃牙，口口聲聲以接濟他們為名，要買過孔美家祖傳的三畝地。

田地就是種田人的命根子，他們怎捨得賣掉呢？何況又是涂孟引作買主！但是生活的重負，又壓得他們喘不過氣來；父子考慮了整整一夜，才決定忍痛把田地典當給洲上的地主涂孟實，自己就成了一個完完全全的佃農。

從這一天起，他們更是日夜奔波，想按期贖回自己的土地，重創家業。但是，做牛做馬、流血流汗、吃糠咽菜的結果，除了償還按月累增的租谷債息，連一家人最低的生活都不能維持了。沒有辦法，父親只好以二十吊錢的代價，把孔美的二老弟賣給了外村人。買主領人那一天，孩子直叫娘，死拉活扯地抱住母親的兩腿不放；全家嚎啕大哭起來，眼見骨肉分離，但他們又有什麼辦法呢？

从此，父亲額头上的皺紋增多了，孔美也更沉默了。他把旺盛的精力都投在农活上，一天到晚，只顾拚命地做事，好象只有这样，才能安慰父亲和自己似的。

一波未息，一波又起。民国十五年（公元一九二六年），父亲在外做零工，被軍閥軍隊强拉为挑伕；因为受不了殘酷虐待，半路跳入塘中逃脫。后来虽然逃出了虎口，却因天寒地冻，回家之后，就生了一场大病。孔美只好典当借債，含着眼泪給父亲治病。但是，为了掙碗飯吃，稍能走动，他父亲就去給村主守港，而寒冬凜冽的湖風，却使他的病情恶化了。在一个夜晚，狂風卷走了棚頂，他沒向外挪动半里路，就扑倒在雪地上了……

大雪不住地飄落，漸漸地盖住了他破棉袄上的敗絮；盖住了他腰間捆扎的黃色草繩，盖住了他蜡黃的臉孔……。一个在肥沃的芦洲土地上辛勤劳累了一生的农民，就这样悲惨地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当孔美聞訊趕来的时候，父亲的尸体已經冻僵了。孔美含着深沉的悲痛与无声的眼泪，把父亲馱到家里。

好心的叔叔伯伯們，在极端穷困的情况下，湊了些錢为孔美的父亲买了一付薄板棺材。但是，按照族規，老人过世一定要宴請族尊、长辈、地富乡紳，否則棺木不能入土。孔美只好向恶霸地主涂序栋賒购了六吊錢猪肉。地主当时說：“这点肉拿去吃就是，我們邻里邻舍的，我又不等錢用。”几天以后，孔美在穷朋友們的帮助下，还是还了

五吊另四百文錢，剩下的六百文，言明日后償还，涂序栋不置可否地哼了一声。

逼 債

以后，孔美总想还掉这点小債。可是，手賺嘴吃，連年总无盈余，这笔債就给拖了下来。誰知这点小債，却成了地主以后更加残酷地剝削孔美的借口。

两年以后的大年三十晚，正是地主老財們燒香拜佛，祈禱上天保祐他們大发財源的时候，孔美空着肚子，顶着鋤头，从田里回来。行到半路却听說涂序栋正拿刀子找他要債！他只好暂时躲避一下。

二更以后，打听得地主走了，孔美才悄悄回家。走到屋里，里面黑洞洞的，灶里沒有一点火星子，缸里沒有一顆米粒儿，母亲伏在床上哭泣，妻子抱着五岁的孩子，哼着含混不清的字眼，哄他困觉，孩子直嚷着肚子餓……。

娘告訴他，涂序栋說，欠他的六百文肉錢，今天要还他六担谷；今年不还，就要算“頂头利”，到明年要还十二担。娘最后又說：“他还叫你去画个押；不还，不去，他就要杀掉你，要你今天回話。”說着又嗚咽地哭起来。

孔美一听，說了句“好狠！”心里实在气憤。

娘胆小，老婆也怕事，都劝他去认了这笔債。

唉，有什么法子呢，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他去画

了押，应承明年按期归还十二担谷子才算完事。

創 业

父亲的死，家庭负担的沉重，洲上地主恶霸的狠毒，并没有使孔美丧失对生活的幻梦；他总记得父亲生前所说的话：凭着自己的一双手，总可以创立一份家业，摆脱贫困。后来，他听别人说离芦洲四十里有个叫丰和洲的地方，荒地很多。在“天无绝人之路”的思想支配下，便产生了出外谋生的念头。

一九三五年，他又不惜高利，千方百计地向几家地主借了五十担谷子的重债，扶老携幼，添制农具，来到丰和洲牙湖湖畔开垦荒地，准备孤注一掷，大干特干一番，以便创家立业。

兄弟两个，早出晚归；孩子打草放牛；母亲、妻子除了照管家务、侍弄菜地，还摸黑熬夜打草鞋、织鱼网，一次又一次挑到镇上去卖。

洲田湖地虽然肥沃，单枪匹马又怎能抵挡洪水的冲击呢？一年夏天，眼看着秧肥苗旺，新谷抽穗，一家几口，笑得合不拢嘴，紧张的劳动后，还计算着可以偿还多少债谷，做着发家的美梦。忽然一阵洪水，冲走了庄稼，也冲走了他们一家人罕有的希望和欢乐！

就在洪水袭击之后，孔美的母亲，也一病不起，与世

长辞了。

此后，又是接連两年的洪水；他們顆粒无收，生計艰难，一家人垂头丧气。孔美用拳头狠狠地捶了一下桌子，然后从牙縫里迸出了三个字：“回芦洲！”

当他們重回芦洲的时候，地主們一翻陈賬，毫不留情地宣布，他們还有三百多担谷的积欠。还不清的債，付不尽的息，象一条条毒蛇紧紧地纏着他們的周身，使他們根本没有喘息的机会。孔美下定决心，等还清了債谷之后，宁願討飯、餓死，也絕不再向地主借債。

在茫茫的黑夜中，他还有一綫希望——相信自己身强力壮，三弟、孩子也都大了。穷奔苦臥，总能偿清債務，置得一份家业，“天无絕人之路！”

夺 佃

孔美一家返芦洲后，租种了地主涂春苟的一十八亩滩田，一家老小，又开始了在地主压搾下的奴隶生活。

这时，日寇入侵，国民党反动派不事抵抗，反而趁此时机抓丁派款，勒索人民。孔美兄弟二人白天不敢出門，躲了躲伏，夜晚插秧作田。

滩田地势低洼，易于成涝，他們到处开沟排水；地质貧瘠，产量不高，他們全家积肥，还替別人代养小猪，积儲猪糞，一齐挑到田里，鋪了一层又一层。为了第二年多收

点谷子，他們还总是从牙縫里省下点谷子，換来了紅花草籽。

由于他們精心苦作，經過三四年光景，十八亩滩田变成了良田。收入增多了，也漸漸地能还一些旧債了，孔美一家好不高兴。

一年春天，孔美看着滿田的紅花草长得墨綠墨綠的，心里正高兴地盘算着，几年之后还清了債谷，再积錢置田买地的时候，忽然地主涂春苟的人来叫他。

孔美心里猛一惊，象一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地跑到涂春苟家里时，本村的流氓恶棍涂怀江还在跟地主咬耳，桌上堆滿着礼品。

啊，夺佃！这是天外飞来的橫禍。眼下紅花草长得正好，谷秧出齐，地主却要夺佃了，这叫他一家人怎么活命呢？孔美含泪恳求，涂春苟一副恶象地甩出契約說：“笑話！老子的田，老子还不能作主？”說着就轉身走掉了。流氓涂怀江却站起来皮笑肉不笑地說：“孔美，俗話說得好，‘人走天下路，馬吃天下草’，你人勤劳力强，还怕餓肚子？”

絕望中的孔美，忽然气憤地指着涂怀江說：“你……”話剛出口，涂怀江就摆出一副流氓象，边走边說：“春爷的田，你种得，老子也种得！”一轉身也走掉了。

孔美滿腔憤怒地离开地主家門，門外，烏云蓋天，要下雨了。

一路上，他不平地想到：世上地主、老財都是頂惡的人，窮人在這個世道上，無論你怎么窮奔苦爬，也難抬頭……

受盡欺侮，孔美決心不在蘆洲呆下去了。他打發妻子、孩子到南昌去幫工，給資本家、闊太太們做傭人，弟弟無處可去，就在四鄉討飯，剩下孔美一人，把房門一釘，只身走到河下撐船度日去了。這時孔美已經四十七歲。

邊 緣

這已經是臨近解放的時刻了。

洲上的大地主們，早已逃之夭夭；小地主們整日提心吊膽，祈求神靈保佑。為了敬神拜佛的需要，地主涂序祿雇孔美的船到南昌去運火紙、綫香、鞭炮等迷信品，當時言明運輸力資偽幣四百元。可是東西運到蘆洲後，地主涂序祿閉口不提力資的事。靠着賣勞力為生的孔美，家中哪有隔宿之糧呢？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上門討了兩次，涂序祿却支支吾吾地說：“過兩天算，過兩天算！”

當孔美第三次上門時，地主竟破口大罵：“操你個娘，比要命債都急！”

孔美不服氣地說：“你罵人？”

“老子罵你，還要揍你呢！”涂序祿一副凶神惡煞的樣子，順手撿起一塊石頭，就朝孔美頭上打來，頓時使他嘴

角鮮血直流；接着又是一石头，打得他的左臂也立时青肿起来。地主还在发火，幸亏两个长工把孔美救走了。

孔美站在芦洲堤头，望着墨黑墨黑的江水，脑子里怀疑起“天无絕人之路”那句老話了——世上有地主、恶霸拦路，穷苦农民有什么不絕之路呢？

这时，这个穷奔苦趴了一辈子的农民涂孔美，望着滚滚的江水，回忆着过去的日子。想着今天一家五口（妻子、儿子、媳妇，討飯归来的弟弟和他自己），挤在一間破茅棚內，共盖一条破棉被的生活。这条补了几层漁网的棉被用了多少年，在他們的記憶中，已无可查考了。他們身上只有一件破棉衣，夏天拆除棉花当单衣穿，天冷再把棉花装进去。飯籃里装的是糰团、柳根、野菜。一条千疮百孔的小船。还有呢？就是連他們自己也数不清的債谷。

这就是旧社会給貧苦农民所安排的一条生活道路：貧困——破产——死亡的道路。

茫茫蒼天，烏雀飞翻。奔流不息的贛江水呵！你流尽这旧世界的苦难，洗刷这人間的不平，开拓出一条广闊的新路吧！

迈 进

贛江江水急促地傾流着，終于流到了一九四九年五月間。芦洲解放了，全国解放了。和全国五亿多农民一

样，芦洲人民开始走向了新的生活。现在，在集体化经济的康庄大道上，芦洲人民的好光景一年胜似一年。孔美一家自然也不例外。

去年，六十三岁的孔美老人，共做了二千七百多个工分，按他八分半的底分计算，共出勤三百二十多天。家里养了两头肥猪，一头卖给国家，买回了球鞋、水瓶、脸盆等等日用品；另一头一百六十多斤，全部自留食用。现在孔美一家五口（弟弟已分居，他也添了一个小孙女）共有新棉被六床，用品齐全，老人还为儿子买了一張价值几十块钱的宁波床。较之过去，真有天壤之别。孔美常笑眯眯地夸耀着自己的生活过得鲜甜鲜甜的。

集体化的道路，更加激发了老人的积极性，他努力劳动，还积极争取进步，他常常要求大队书记帮助，渴望早日入党。他一連八次被评为模范社员，最近又当选为后洲大队贫下中农委员会的副主席。他说得好：“现在我才晓得了，不是什么‘天无绝人之路’，是党中央、毛主席领导好！是集体化道路走得好！过去的路子越走越窄，今天的路子才越走越宽，只有紧紧跟着共产党、毛主席，才有铁打的江山。”

我被卖过七次

上海市川沙县六里公社
下西浜大队妇代会主任 范惠珍

在旧社会，我被卖过七次，受尽了地主、官僚的摧残，所受的苦，几天几夜也诉不完！

八岁落入“狼窝”

我只知道我是湖南人，姓范，小名叫妹子，生在湖南小营州。家里除了爹娘，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我们住在一座祠堂后面的一间破茅屋里。爹娘租种地主的土地。一九三〇年的冬天，那时我八岁，地主家里来了四五个狗腿子，张牙舞爪地向爹逼租。我们草糠充饥，衣不蔽体，哪里交得出什么租呢？地主的狗腿子逼不到租，就打烂了我家仅有的一点东西，我吓得直哭，躲在爹的身边发抖。过了几天，地主派人来把我拖了去。后来我才知道，爹因为交不起租，只好噙着眼泪把我卖给地主当“童养媳”。

地主哪要穷人家的女孩做“童养媳”，不过是我当

奴隶使喚。我虽然只有八岁，可是燒飯、洗衣、打水、割草、砍柴样样要做，每天从鸡叫做到半夜。我一年到头連冷粥殘羹也吃不飽，夜里睡在一張破席上，冬天也只盖一条破棉胎。娘知道我在“狼窩”里受苦，有一天，要我哥哥偷偷地送一只鸡蛋来給我吃。不料被地主婆看見了，她瞪着眼睛說：“你也有福气吃鸡蛋？”說着就把鸡蛋搶去給她的儿子吃了。

吃不飽，穿不暖，人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到了十岁，我累倒了，两腋下生了两个大疙瘩，两只手痛得动也不能动。我实在吃不消了，就在一天夜里，乘地主熟睡的时候，偷偷地逃回自己的家里。我和爹娘两年不見面了，爹娘看到我人不象人，鬼不象鬼，都楞住了。我一头栽倒在娘的怀里，哭着說：“娘！我是妹子啊！”娘也哇地一声哭了。

第二天，地主婆坐着轎子找人来了。我吓得逃到屋頂上。听見地主婆在屋內恶狠狠地說：

“你們要妹子很容易，她两年的吃喝穿著統統給我算清！”

“妹子已折磨成这个样子……你发发善心吧……”娘胆怯地爭辯着。

“沒有錢，拿人来！”

于是，我又被押回“狼窩”。地主婆拿了一根粗木棍，沒头沒腦地打了我一頓，痛得我在地上直打滾。这一天，連一口水都不給我喝，晚上还命我跪了一夜。

两年中我被轉卖了五次

一九三二年，我十岁，狠心的地主以四十六块钱的代价把我卖给离家更远的一户大地主家里当丫头。

我还记得，那天太阳下山的时候，他们勾结人口贩子，骗我说是去看我的娘。当晚，他们就把我拉到一个镇上，把我关在好象是一家客栈的阁楼。我知道他们不存好心，急得双脚蹦跳，哭喊着：“我要娘啊，我要看我的亲娘！”可是不管我怎样呼喊求救，却没有一个人理睬。

三天以后，新的东家派人来把我连抢带拖地领走了。这家地主的房子很大，大门、小门一道又一道，阴森可怕；佣人、丫头有十多个，光地主一人就要有三个小丫头服侍他。地主睡觉的时候，我们跪着，一个替他敲背，两个替他敲腿。敲呀，敲呀。一直敲到他象猪一样打鼾为止。地主睡着后，这时我们的两手已酸软了，两膝也青肿了，可是还得替他烧红枣莲心汤。地主一觉醒来，喝了莲心汤，又要我们给他敲背、敲腿，等他熟睡后，我们才能去睡觉。两眼刚刚合上，天就亮了，我们又得起身站到地主的床边，听候使唤。地主眼一睁，如果看不见人，我们就少不了受一顿毒打。

有天晚上，我替地主敲腿，累极了，眼皮实在张不开

了，打了一个盹，不小心，一滴口水滴在地主的腿上。地主霍地坐起，大罵道：“你这个賤貨！你的口水滴在我的腿上，今生今世也抹不干净。”說着噼啪两巴掌，打得我鼻血、牙血直流。他由于打得过猛，自己的手也有些痛了，更是怒不可遏，就叫另一个丫头去拿铁棒来打我。这个丫头吓得木楞楞地看着我。地主見她站着不动，就当胸一拳把她打倒。接着地主婆就用头上的銀釵朝我臉上乱刺。地主的心是多么狠毒啊！

不久，我又惹了第二次禍。一天，我端茶給地主喝，不小心，大拇指蘸着了一点水。地主看見了，臉一沉，將我一把拖到楼梯边，猛的一推，我从楼上滚到楼下。头跌破了，鮮血直冒，頓时昏了过去。后来由小姐妹把我扶到床上。我醒过来，看見小姐妹站在床边，我眼泪直流。我想，这种日子哪一天能了結呀！

过了几天，那个地主就把我轉卖给另一个地主。

这个地主是个大胖子，連自己的脚也抬不起，活象一头死猪。他坐着轎子下乡收租，我跟在轎子后面走。地主一到佃戶家門口，人还没有在凳上坐定，就要我替他敲背。因为这一年收成不好，佃戶們交不起地租，地主收租不順利，就把我当出气筒，說我生相不好，不吉利。几个月后又把我轉卖掉了。

这次我被轉卖给一个有大小老婆的地主。这个地主家里有五个丫头，后来轉卖掉三个，一个又被大老婆打

伤，我一个人要服侍地主的大小老婆两个人。大老婆唤我去，小老婆就用手擰我的臉，嘴里罵着：“死鬼！叫你到这里来，就不許你到她那边去。”小老婆唤我去，大老婆又用手擰我的臉，嘴里也罵着：“死鬼！叫你到我这里来，就不許你到她那边去。”我的臉，就这样被她們擰得青一块、紫一块。她們这样折磨我，还不准我哭出声来。这样的日子我怎么过得下去呢？一天晚上，我又准备逃走。但还没有逃出門，就被地主的大小老婆抓住了。她們用燒紅的火鉗燙我的脚底，我痛得喊救命！在那个时候，又有誰能来救我呢？

十一岁那年，我又被轉卖给一家做官的人家。他家有兩個女儿，一个十四五岁，一个十六七岁，都要我这个十一岁的丫头服侍她們穿衣、吃飯，哄她們喝牛奶。稍不如意，我就得任她們打罵，当官的还要責怪我服侍得不好，用“断命棍”打我。“断命棍”，是当官的特地做了專門毒打丫头用的木棍，我們一看见这种木棍，汗毛都会豎起来。

第二年，我又被轉卖到南京另一个当官的家里。有一次，我吃力地提着从“老虎灶”泡来的两大壶开水，在过馬路的时候，被一辆运输汽車撞倒了，打翻的开水潑在我臉上，右腿也被汽車的前輪压伤。我当场不省人事。一个看弄堂的老人和汽車司机一起把我送进了医院。我在医院里躺了三个半月，腿伤还没有好就被迫出院了。当

看弄堂的老人把我扶到当官的家里的時候，这个家伙对我說：“哼，你为啥沒有死掉！？”

哪里有我路一条

在南京又过了一年，我思念爹娘，想得快瘋了，一天到晚喊着爹娘。当官的討厌死了，就对我說：“你要娘，我给你找个寄娘吧！她在上海，明天就去。”

第二天，我就被送到了上海。我的“寄娘”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广东人，姓庄。她长得很胖，人家叫她“阿肥”。这胖女人对我說：“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娘。你就叫庄双蓮。”我的“娘”？天啊！这是什么娘啊？“阿肥”在收下我以后，就把我荐到官僚和老板家里去当佣人。我象牛馬一样地一年做到头，挣得的一点工資全給“阿肥”霸占去了，而我用的、穿的，她問也不問。真是：跳出“狼窝”，掉进“虎口”。在当时的社会里，哪里有我路一条！

又熬了四年，我十八岁了。“阿肥”看到我已經长大，怕我逃走，就动了一个坏主意。一天，她装着关心似地对我說：“双蓮，你年紀大了，娘托人給你做媒……。”邻居知道了，就提醒我說：“双蓮，媒人媒人，两面瞞人，你要向你娘問問清楚。”我就去問“阿肥”。不料，“阿肥”听了勃然大怒：“不要臉，亏你問得出口……”說罢噼啪两个巴掌，打得我两眼直冒金星。

就这样，在一九四〇年二月，我“出嫁”了。丈夫是浦东人，家里住在现在的六里人民公社下西浜生产大队刘家宅。那时他在上海做雕刻工人，家里一贫如洗。他为了娶我，不得不借债，又当掉了可以作典押的东西，才付给“阿肥”一笔巨款。结婚时家里用的桌、凳都是借来的。我的丈夫每月收入不多，维持两个人的生活，已经很吃力了，哪来的钱还债？为了这事，后来他急得生了病。病中他把我叫到床前，对我说：“惠珍，你到我店里去把我的皮夹子拿来。”我到店里把皮夹子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叠当票，再过三天就满期了。我对着皮夹子直哭，一直哭到家里。

丈夫病了，家里没有一点吃的。我别无出路，只得噙着泪水去找“阿肥”荐我去当佣人，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今天我过着幸福的生活

又熬了几年，到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了。我和广大人民一样，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当时我们刘家宅也驻了解放军，他们向我们宣传党的政策，看到我家生活困难，就送饭来给我们吃。我双手捧着满碗的白米饭，流出了感激的热泪。乡干部也经常来关心我，帮助我进步。不久我当上了妇女组长。真没有想到我这个过去被人家踩在脚底下、连做人的权利都没有的奴隶，能同劳动人民一

起坐江山，当家作主。

一九五一年，土地改革以后，我分到了土地。为了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党号召我们组织起来，走合作化的道路。我听党的话，坚决跟着党走，参加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在党的教导下，我的觉悟不断提高，在一九五三年参加了共产党，后来又当了妇代会主任。

依靠了组织起来的力量，生产发展了，生活也逐步提高了。我和丈夫虽然身体都很弱，农业生产的技术又不高，但由于靠了集体的力量、领导的关心，自己勤俭过日子，十多年来不仅吃饱穿暖，还逐步添置了不少农具、家具和衣服等，一九五六年还新造了一间房子。人民公社成立以后，生产进一步发展，收入又有了提高。一九六二年除了每个月的工分预支，年终我家还分到二百八十多元。

现在我有四个孩子，三个男的，一个女的。大儿子今年十七岁，读到初中，现在已经参加社里的农业生产劳动。二儿子、三儿子都在读书。最小的一个也三岁了。他们现在过的生活，同我的童年生活相比，真是天差地别！

喝水不忘掘井人，翻身不忘本。我要永远记住剥削阶级种下的仇恨，热爱新社会，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我还要把自己在旧社会的血泪史讲给我的小辈听，一代一代传下去，让他们知道我是怎样过来的，永远不要忘记本，永远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

李健忠整理

我真有千言万語要向毛主席傾吐

上海郵電器材廠機械工程師 蔡金龍

我今年五十四歲了，但我真正的生命，却是從新中國成立那時開始的。

撫今追昔，憶苦思甜，不禁熱淚滾滾。我要倒出解放前四十年中在我心頭積存的苦水；我要歌唱解放後十四年來黨和毛主席給我的恩情。

苦 海

我生在上海浦東鄉下。祖祖輩輩都是佃戶，世世代代受地主欺壓，家里沒有一個識字的。當我還在娘肚里時，父親就替我取了個響亮的名字——蔡金龍，願我成“龍”成“鳳”，擺脫地主對我家世代的壓迫和盤剝。到我八歲那年，父親向地主借了十塊銀洋，讓我進了一所私塾念書。哪知道，我念了一年私塾，沒有學到什麼，家里却愈過愈窮，三天兩頭揭不開鍋，更還不起為我讀書借的“閻王”債。沒辦法，父母親只好讓我退學，含着眼淚把我送

到地主家去当放牛娃抵债；我母亲也只得离开家，到上海去帮佣。

这个地主是只“笑面虎”，没开口，先露着焦黄的门牙嘿嘿笑。一天，他把我叫去，脱口喊了我一声，顿时就收住了笑脸，竖起眉毛说：“穷八字，富贵名，啥个‘真龙’‘假龙’？今后不许你叫这个名字。”听了他的话，我肺都气炸了，心想：“穷人连个好听的名字都不能随便取吗？”接着他又嘿嘿地笑了两声说：“冬天牛吃的草料不够，你白天把牛放出去找草吃，晚上再喂料房里的干草。”说完，他就跑进房内吸大烟去了。

隆冬酷寒，滴水成冰。我裹着一身遮不住羞的烂单衣，出外放牛。北风吹在身上象刀割，光着的双脚生满了冻疮，踩在冰冻的地上，疼得象乱箭穿心。这样的痛苦生活真难熬啊！

快近年关了，地主整日在家吃鱼吃肉；而我却还在外边喝西北风。我实在熬不住了，一天，偷偷地从牛棚里拿了些干草烤火，暖和一下身子。谁知这事被地主知道了，他象凶神恶煞般地打了我几个耳光，打得我眼冒金星，跌倒在地上。狠毒的地主又用鞭子没头没脑地抽我，一面抽，一面骂：“小赤佬，你要死了！老子叫你这条‘金龙’变成一条‘毛虫’！”一顿毒打，把我的脑神经和耳鼓膜打坏了，我昏倒在地上。待我醒来后，地主便一脚把我踢出了黑漆的大门。

我冒着風雪，噙着泪水，跌跌撞撞跑回家，却不料母亲也被人家解雇回来了。她看到我遍体鳞伤，血迹斑斑，把我抱到怀里，伤心地痛哭了一场。半夜里，我浑身象火烧一样，特别是被打坏了的耳鼓膜痛得象针扎，里面嗡嗡直响，痛得我在床上翻来滚去。由于无钱医治，我的伤越来越厉害，整天发高烧，昏迷不醒，差点送了命。后来，命虽保住了，但耳朵却成了“重听”（听力严重减弱）。

地主的心腸真是狠，把我害成殘廢还不甘心，见我活了，又逼我再去替他放牛。我母亲不忍心让我再去受罪，就向地主求情，說我已經殘廢，不能再去放牛了。地主皮笑肉不笑地嘿嘿了两声說：“不回去，也可以；馬上还清欠債，算清飯錢！”我父亲被逼得无路可走，心一橫，把自己起早摸黑开出来的三亩多荒地給地主抵了那笔“閻王”債。地主夺了地，还幸災乐禍地罵我父亲說：“蔡家祖宗缺德，生了个‘現世报’！”

一九二三年，我一家四口都病倒了。不久，小弟弟不幸夭折了；父亲也染上了瘟疫，手臂上又生了一个大毒瘤，鮮血和着膿水直往外涌，痛得日夜喊叫。因为没有钱医治，就这样病死了。

父亲死去不久，我的病也加剧，几次昏死过去。一次，我昏死过去以后，母亲以为我死了，一边哭着，一边用破席把我卷出去，准备把我埋葬在父亲的坟旁边。这时，雷电交加，大雨傾盆；母亲又把我抱起，一摸，发觉我还有一

絲热气，就把我抱了回来。她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不睡，把我紧紧地摺在怀里，直到我苏醒过来。当我醒来的时候，看见破屋中一支残烛，发出幽幽的微光，照着母亲惨白的脸。母亲见我苏醒过来了，惊喜若狂地把我抱得更紧，顿时，我瘦小的脸颊滴满了她的热泪。

这次我虽然又死里逃生，但是我的耳朵却聾了，什么也听不见；声带也坏了，不能说话。我就是这样被万恶的旧社会摧残成了一个又聾又哑的人。

狠 窟

乡下不能活命，母亲就求情送礼把我送到我舅父开的上海金森记五金厂里当学徒。那时，我才十三岁。

天下财主一样狠。舅父并不因为我是他的亲外甥而“另眼看待”；相反，利用我生理上的缺陷，百般地虐待我。记得我头一次煮饭，不当心煮坏了，我舅母——老板娘怒气冲冲地走过来，撵住我的耳朵，伸手就给我两巴掌。打了不算，还不准我吃饭。我只好饿着肚皮去干活。又有一次，我看见朱阿菊老师傅用铜水铸模子，就走攏去想学点技术。朱师傅心肠好，他作着样子拿起一杯烧沸了的铜水，慢慢地倒进一只小模子内，一面倒一面吹气。我也照样倒，照样吹气。我恐怕气力不够，就使足了全身力气吹，不料把倒下来的铜水都吹在水门汀上。这件事又被

老板娘发觉了。她用双手使勁地擰着我的耳朵，然后又左右开弓打我。我立脚不穩，一头撞在風箱上，差一点跌倒在那沸腾了的銅水中。

我实在受不了这种虐待，就逃了出来，流浪在街头。但是，我接連逃了三次，被老板抓回去三次，每次都被打得渾身鞭痕累累。逃跑不成，我只得在厂里继续做牛做馬。我日夜劳累得不到休息，身体很虛弱。有一天，我从三楼提着一大銅吊(水壺)开水下来，在下楼的时候，突然头昏眼花，两脚一軟，跌倒在水門汀地上，右脚背被开水燙得滿是血泡。狠心的老板娘不但不給我治疗，反而把我鎖在鴿子籠似的小閣樓里受罪。三伏天，悶热的“鴿子籠”里充滿了臭气，臭虫、蚊子叮得我全身紅腫，我的伤口也烂得出了蛆。幸亏朱阿菊老师傅偷偷地弄了一点豆油給我涂伤口，伤口才慢慢地好了。

我在厂里做了三年学徒，从朱师傅那里学到了一点技术，总想可以滿师了。誰知，老板要我拿出四十块銀洋办“滿师酒”，否則还要做三年学徒。天哪！我身无分文，哪有錢办酒呢？結果，只得继续当学徒。一个三年，又一个三年，一直熬到了第九年，那时我已經有了一手熟练的技术，老板才让我滿师。老板欺我是一个哑巴，給我的工資只有一般工人的三分之一。真是气人哪！我早就想离开这个“狼窟”，但苦于沒有机会。后来，这个工厂被日本鬼子的飞机炸毀了，我才离开了这个“狼窟”。

地 獄

在旧社会，殘廢人到处受欺凌。我离开了金森記五金厂后，又先后到过四家工厂做工，受尽了剝削和压迫。記得我在一家工厂做了半年工，結果沒拿到半分工錢，气得我病了三个月。

一九四五年二月，我被騙子騙到日本鬼子办的一家軍火工厂做工。在那里，每天都有我們的同胞被日本鬼子无故毒打。我是一个哑巴，遭受的苦难，就比一般人更多更深。当时，日本鬼子为了防止我們工人反抗，就規定各車間工人不能相互走动。我不懂这个規矩，有一天无意走进了另一个車間，看見一个女工的头发被卷进机輪里去了，我急忙飞步向前，用左手拉机輪，救下了那位女工，但我的左手腕却被削去了一大块肉，當場就昏倒在血泊里。日本鬼子不但不給我治疗，反而誣說我是“密探”，把我抓起来拷問了一頓。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接收了这个工厂。我以为国民党是中国人，总会对中国工人好一些。其实，他們是一丘之貉。他們剛接收工厂不久，厂里一些工賊混水摸魚，大量窃卖厂內器材，肥飽私囊。我当时耳朵听不見，也不知道他們干什么。有一次，我看見別人拿东西，自己也拿了一小卷旧帶尺，想做褲腰带，誰知被大門口卫兵查到了。那些工賊就乘机嫁禍于我，誣賴我是“大盜窃

犯”，把我毒打一頓，硬逼着我这个哑巴招“口供”。我是哑巴，有冤說不出。他們把我打得皮开肉綻以后，又把我关进了阴暗的监牢。我在牢里渾身生滿了疥疮，还得了严重的胃病。后来我从牢里逃出来，在外过着流浪的生活。

多少个凄風冷雨的夜晚，我随着苦难的人群，蹒跚在黄浦江畔。这时，母亲已病死在乡下，家里仅有的半間草棚也被土匪放火燒掉了。我望着江水，想到我悲苦的身世，什么时候才能結束这苦难的生活呢？

新 生

一九四九年，随着上海的解放，我也得到了新生。我这个在旧社会中受人歧視的哑巴，从此做了国家的主人。

在我工作的单位里（当时在交通部上海电訊局修配所工作，一九五二年調到上海邮电器材厂），領導上对我非常关心，处处照顾我，时时帮助我，使我能順利地克服了因生理缺陷而帶來的种种困难。就在一九五〇年，我在厂領導和工人帮助下，改进了电报机內的一个零件的制作方法，提高了工效四十倍。

党的恩情似海深。我在旧社会受尽了折磨，身体很虛弱，党就送我到杭州去休养；党还千方百計为我治疗聾哑，一九五五年，我去北京开会，邮电部負責同志亲自把我送到医院去治疗。虽然医药不能再治好我的殘疾，但

这件事却永远銘記在我的心上！

一九五八年，这是我終生难忘的一年，我光荣地参加了偉大的中国共产党。当組織上通知我已被批准入党的时候，我激动得流出了幸福的眼泪。我，一个在旧社会受尽压迫和歧視的哑巴，也成了工人階級先鋒队中的一員，这怎能不叫我激动、高兴啊！

那一年，厂里掀起了技术革新热潮。为了使电傳机能成倍地增产，我們嘗試制造一副复杂的模具。过去，这种模子是經過泥坯翻砂后制成的，工效低、质量差；这次要求造出的一副模具，直接用金屬溶液澆鑄。这在新中国邮电事业中还是第一次。厂领导經過研究后，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了我。

在党組織和工人同志的鼓动下，我毅然地挑起了这副重担。在制造过程中，党给了我无限的力量，使我克服了重重困难。比如看图紙吧，以前我制造的模具，都是凭几十年积累的經驗，靠打“腹样”而制作的。这次試制模具的图紙有一大堆，而且相当复杂，我都不熟悉。于是，我下苦功，揣摩每一張图紙，花了一个月时间，把每張都記住了，然后在脑中拼成一个假設制成了的模具。就这样，經過不断的努力，我們終于把这副复杂的模具造成了，生产工效提高了二百八十倍，产品质量也显著提高。

十四年来，我在党的教导下，提高了階級觉悟，在邮电器材的革新方面，每年都做出了一些成績，还創造了十

四年不出廢品的紀錄；同時，也幫助旁的同志挽救了不少將要報廢的成品。黨對我做出的每一点成績，都非常重視，還給我榮譽和獎勵：數次評我為先進生產者；讓我三次上北京；一九六〇年，黨又提拔我當了工程師。這些在舊社會是做夢也想不到的啊！

一九六一年“五一”節，我和全市二百九十多位先進生產者，在上海電機廠會見了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當時，我真有千言萬語要向毛主席傾吐，但我說不出來。我只能用熱烈的掌聲來表達我對毛主席深深的敬意，來表達我內心所要說的話：敬愛的毛主席啊，是您解放了我，使我擺脫了舊社會的折磨和摧殘，過着幸福的生活；是您培養了我，使我這個受盡凌辱和欺壓的啞巴成為新中國的工程師。這海洋深的恩情，我怎樣來報答啊！

我感到黨和人民給予我的榮譽和獎勵太多了，而我給黨和人民所做的事卻太小太少。今後，我要在黨的領導下，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貢獻出我的一切力量！

“人殘廢，心不殘廢，一顆紅心永遠向着黨！”這就是我的誓言。

按：一九六三年五月上旬，蔡金龍同志在《解放日報》上見到了《我這十四年》的征文啟事後，又激動，又着急，他心里有很多話要說；可是他既不會說，又不能寫，着急了半天，後來找了一度也是個啞人（後來治好了）的王光匯同志來幫助他。他們倆前後花了兩個多月的時間，終於合寫成了這篇文章。

沒有名字的燒鹽工人

——一个工人家庭在解放前的遭遇

李 景 之 光

今年八月，我們訪問了四川自貢鹽場。
我們記下了一個燒鹽工人家庭的遭遇。

一

一九二五年，劉平山十五歲，家住富順農村，爹種王三畏堂的土，媽是殘廢人。一家人，每天灌一頓高粱羹，不小心潑在地上，狗都舐不上嘴。住的半間破草房，晴天屋里裝太陽，下雨屋頭就象小河漲水。那一年，平山爹累得吐血，還沒有交夠租子。地主宰押金，收田土，整得平山爹一倒床就爬不起來。半夜過了，房頂上的雨水還在往下淌。劉大娘雙腳跪在床上，兩手端個破斗笠遮着丈夫上半身；平山的小妹，伏在床上抱着爹的腿；劉平山兩腳泡在水里，抓住爹的手。他爹睜開眼睛，喘了幾口氣，才說：

“大娃哩，我只当冷处該朝热处走，沒譜是雪上又加霜。这陣，爹跋不贏紳粮，唯願你們是菜籽命，高种高生，矮种矮长。……”

話還沒說完，爹爹死了。夜，墨黑。雨水順着土墙不住地流，板子床也象被水抬起来了。

一家三口，担子落在刘平山肩上。他帮地主放牛，每月三个双板銅元(六百錢)，地主还說他没带鋪盖，睡老板的谷草，要扣二十个錢。平山气不过，連草帶背篋，一齐摔进牛栏，摸黑跑回家里。

回到家里，大娘又把他叫到床前，說道：“磨骨头养腸子都拖不走了，只有把小妹抱給人家。……”妹妹才八岁，就要嫁人！平山嚷着：“不！我不……”捏紧两个拳头，冲到門口。还不懂事的小妹妹呵，正坐在門口阶沿上，拍着小手唱：“月亮光光，芝麻土头燒香。……”那天晚上，小妹出奇的高兴，睡着了，还迷迷糊糊地唱着：“黄絲媽媽，吹吹打打……吹吹打打。……”她哪里知道，明天她就要嫁給人家作童养媳了。

烏云遮住了月亮，妹妹真睡着了。刘大娘脫下小妹的衣裳，一針針，一綫綫，补疤連縫；又走到塘边，細心地洗，慢慢地搓，她怕把縫好的衣服搓烂了，更怕自己再也洗不到小妹的衣服。她走回屋里，站在床前，痴痴地看了女儿好一陣，又偏偏倒倒地跨出大門，走出坝子，走过黃梅树，……平山这才明白，媽是朝爹的坟上走呵！他連忙

追上去，一把抓住媽的手臂，估倒把媽媽扶回家里。刘大娘睡在床上，把女儿抱在怀中，眼泪跟倒手臂流。刘平山坐在門坎上，一夜沒有上床。

第二天早晨，大娘給女儿洗了热水臉，又拿起那半截梳子，給她梳头发；扎成一根小毛辮，辮子才搭齐后頸窩。小妹摸摸毛辮，又摆着脑壳搖毛辮，嘻开小嘴对着媽笑。吃早飯了，大娘端起高粱羹羹，半天吞不下，把羹羹倒給女儿。小妹从碗口边抬起一双大眼睛，偏着脑壳看媽媽。“娘，我吃饱了。”她双手把碗端到媽的面前。大娘說：“乖女，你要走路，上坡下坎的……”小妹又吃了一碗。媽想再給她添一碗，鍋巴都沒有了。大娘拉着女儿的小手，哽哽噎噎地說道：“乖女呵，家里沒吃的，你到謝二爸家去吃干飯……你爹走得早，娘对不起你們。”小妹楞着眼看看媽媽，又看看哥哥，突然一头栽到媽的怀里，紧紧抓住媽的衣裳，放声大哭。哭了一陣，她才把头抬起来，用手去揩媽媽臉上的眼泪。才八岁的小妹妹，一下象懂事的大人了，她喊道：“娘呀，哥哥呀，你們不要哭，我去吃干飯……我去給你們拿米回来，拿錢回来，你們好煮干飯吃嘛。”

刘大娘牵着女儿的小手走了。平山双手蒙着臉，咬着牙齿坐在阶沿上。小妹妹走不多远，回过头来，閃着一双大眼睛，喊了一声哥哥，平山突然站起来，一趟追到黄桷树下，抱起妹妹就朝家里跑，嘴里嚷道：“我死也不得

让她去！”媽媽拉住他，哭着說：“大娃哩，放她条生路呵……”又把女儿拖过去背在背上。大娘送女儿回来不久，病了一个多月，沒拖到收谷子，死了。

刘平山安埋了娘，心想在乡里山穷水尽，到盐場也許好点；反正凭气力吃飯，闖一闖金窝銀窝，肯信嘴巴会遭凉拌。他到爹娘坟前磕一个头，跟千百万农村破产逃到城市的农民弟兄一样，背起两双草鞋，走向自貢。

二

刘平山来到自貢，坐在河边歇气，听到店子里的人議論紛紛，說是刘湘伙起各路軍閥打敗了楊森，各路軍閥又一齐按到自貢，米开啥子“善后会議”，街都搥翻了。他闖上大街，只見长不到两里的街上，成了一座兵山，手枪碰着連枪，人都挤得要掉耳朵。他轉进背街一条巷子，又見一大堆人，圍着在看牆上貼的对子，有人在說：“嘿嘿，把善后会議几个字都包进去了，安逸！”有人大声念道：“善者无可如何，会放狗屁；后事不堪設想，讓个鸡巴。”就是这次“会議”，軍閥們从盐場搶走了一千零三十二万八千多块銀元。

刘平山走攏大坟堡，只見天上黑烟滾滾，雾气騰騰，硬是黑了半边天，山头都被烟雾遮住了。密密麻麻的高高的井架，也被烟雾纏繞；井架上扯的篾绳，象蜘蛛网一

样从天空罩到地下。每个井架下面，都有黑压压的一片車房，挤在一堆。汲卤的篾绳在天上穿梭，一片轰隆隆的吼声，灌进耳里；卤水的气味，冲得他脑壳发晕。他站着东看西看，慢慢才发现篾绳上的卤水洒下，象牛毛细雨，混杂着煤屑和灰渣，落了一身。他感到这地方馬嘶人喊，簡直象打仗一样，不比田坝清静。

他走进場口。两边房檐都要挨攏的小街上，人群拥来挤去。卖瓜子的撩开门帘，屋子里几十盏烟灯旁边，躺着一长排烟哥，鴉片烟味从門里冲了出来。沿街摆滿賭摊，一堆一堆的人圍得梆紧；有的臉紅筋脹，把衣裳脫下一卷，当作賭注扎下去；有的冷得打哆嗦，还擲下骰子直呼“六六六哇”。刘平山听得真心煩。

他走到一家牛肉店門口，一群人正在摆談，有个老婆婆說：“遭孽呵，多乖的一个姑娘，走攏場背后，一个燒盐老汉把她藏在背篋头，上面壅起包谷心，連背篋一起卖。买家在灶門口倒包谷心，才看到娃娃，衣襟上还縫得有生庚八字。人当包谷心卖，遭孽呵！”刘平山听得火冒，真觉得比抱妹妹还惨，杂种，咋个这盐場比乡下还要武辣！咬住下嘴皮一想，来都来了，怕啥！最多是睡谷草扣二十个錢。他就連忙打听“通緣井”在哪儿，好找么叔刘炳云。

这个井灶是大資本家大地主王友謙的，因他信佛念經，又称“王善人”，很好打听。来到門口，黑漆的朝門虛

掩，四面是高牆和木头簽子。刘平山向看門头說了姓名，半天他才傳話进去。隔了不久，走出一个人来，灰黑一張臉上，只看到两个白眼珠在轉，上下紅嘴皮在动，那个人喊道：“平山！”他才知道是么叔。在家听娘說么叔是燒盐工人，咋个燒盐的一臉煤烟？庄稼汉使犁耙，黄泥巴才敷齐脚杆嘛。

刘炳云把他領进朝門，走不多远，钻进一間低矮的瓦房。剛跨进門，一股热气冲来，平山头上的筋脉直脹，周身冒出毛毛汗，啥也看不清楚。他定了定神，才模模糊糊地看見，几排大铁鍋里的卤水浪翻暴跳，亮油壺在雾罩中閃动着慘黃的火焰，近处热气閃过，露出盐工的赤条条的脊梁和手臂，远处白茫茫一片，只听到炭灶里哧哧的吼声。半夜，么叔才告訴他：要吃燒盐这碗飯，先得見啥做啥，給資本家帮干忙，等操出手艺，进得了“炎帝宮”，在柜房裡搵得上名字，才談得到工錢、伙食。沒上到名字，开伙食你不能动手，等我躲过“坐灶”，再添飯給你。刘平山心惹，做工比做庄稼名堂还多，哪有做活路不拿工錢，还吃偷偷飯的道理？这不比地主还凶？哼，我肯信資本家就把人丟在盐鍋里煮来吃了，便答应吃到偷偷飯再說，在么叔家里住了下来。

从此，他跟着么叔做些手脚活路。灶房象火烤，周身脫光了，汗水还是滿身鋪；地上湿漉漉的盐水，泡得钻脚板；灶內的火又熊又旺，滾燙的盐水，簡直从鍋里跳出来

咬人。在灶房，水火攻心，热得要命；出灶房，冷風一吹，光打寒噤。进进出出，冷冷热热，三趟两轉，刘平山就支持不住了。么叔还說这是秋天，日子好过，三伏天燒盐，小心燙脫几层皮。

刘平山在灶房忙了一天，早累坏了，正要坐下歇气，外号“滿天飞”的掌柜馬玉堂走来，指着他喊道：“那个小伙，快去，快去！”平山还没弄清楚，馬玉堂就催着他跟一个老工人走了。老工人叫蔡成林，工友都喊他蔡胡子。走出大門，平山問蔡大伯到哪里去，蔡胡子黑着臉，半天才說几个字：“弄‘退秋’。”“啥叫‘退秋’？”蔡胡子再不答腔，刘平山更加奇怪。走了十多里，天已黑尽了，才在一个么店子落脚。蔡胡子叹了一口气，才对他說：“小兄弟，难怪你不懂呵。‘王善人’不准杀生，偏偏爱吃退秋魚。这种魚出在富順安溪，要等秋水退了才好弄，退秋一出水面就死，只有赶紧下鍋，味道才鮮。这安溪隔大安寨一百七十里，他沿路派人送魚，十里一站，一站傳一站，連夜飞跑，要赶上他的早飯。馬玉堂叫我們两个跑这最后一站，我上了点年紀，耽心拖累你。唉，小兄弟，时辰沒到，鸡再叫也沒用呵！”

他俩在店里歇下，不到二更，倒头就睡了。不知睡了多久，店門打得乒乒乓乓，有人又喊又叫。蔡胡子把平山拉了起来，开門一看，只見一个大汉挑着水桶，一个大汉提着馬灯，累得話都說不出来。蔡胡子挑起担子就走，平

山連忙接过馬灯追了上去。天又黑，路又窄，蔡胡子走得偏偏倒倒，平山搶过担子挑上。剛走不远，路旁鸡叫狗咬，天色快亮，老汉提着馬灯跑了起来，平山咬牙紧紧跟上。跑攏大坟堡，东方已經发白，还要爬两里陡坡，才攏大安寨，蔡胡子着急地說：“小兄弟，还，还要快点呵！”他接过担子，不换肩地爬上高坡，喊开寨門，領了签子，进了大安寨，来到王友謙家后門，一擱水桶，便倒在石坎上了。两个門丁出来，提起水桶，才罵蔡胡子：“老东西，王一公不准哪个坐他的阶沿！”平山好生火冒，正要扑过去，那家伙砰地一声把門关了。平山扶起蔡胡子，說：“走，蔡大伯，屙尿都不要朝他这一方！”

刘平山一只手撑腰，一只手扶着蔡胡子回来，灶上正在开飯。刘炳云从大甌子里舀了一碗干飯，瞞过“坐灶”，偷偷給他端来，平山双手捧住。这是什么飯呵，又酸又霉又臭，还未进嘴，味道就熏得人难受，剛累倒的人，吃下肚里的飯，直往外嘔。他不敢吐，又强迫自己吞下。刘平山悄悄地掺了一瓢冷水，碗里立刻浮滿一层黑脑壳虫。杂种資本家，买的发水米，又放在仓里漚，安心叫虫虫吊吊結成砣砣，等到吃它，装米不用籬筐，使铁钎拗开，跟修屋基用的石条一样，繩子一套就抬走了。把它丢在鍋里，一泡就算飯；若要煮，就成了粉粉。平山又气又恨，用眼泪当菜，咽了大半碗。

刘平山有时給掌柜挑柴、送米，回来错过吃飯机会，

还連这种烂臭的燒仓米也吃不上。无錢就餓，碰到么叔給点零錢，买筒米回来，装进瓦罐，放在盐鍋里“飄河灯”，煮熟来填填肚子。过后他才明白，自貢的大资本家，头数王、李二姓，連小孩子都曉得：“你不姓王，不姓李，老子不怕你！”难怪“王善人”是这么歹毒！

在灶上混久了，平山常常听到工人們摆談炎帝宮。明說炎帝宮是燒盐工人的帮会，其实是和軍閥、资本家、袍哥串通一气来压迫剝削工人的一个反革命衙門。燒盐工人要在炎帝宮交錢挂名，領了“藍本本”，才能在柜房里上名入册，在盐場里混碗飯；查到沒有挂名的，他們就打、抓、押、关，还說什么“严防奸伪捣乱，保障工人利益”。有一天，刘炳云去炎帝宮繳香錢，平山知道了，才把这一向憋住的火气发作出来：“么叔。哪有做活路还兴上稅？不繳香錢，哪个敢把你咬了？”刘炳云只当平山年輕气盛，沒有理睬，揣上錢便走了。平山气悶，在家里坐不住，跟在么叔身后，从大坟墓走到城里。正当过河，刘炳云才发现平山：“你跑来做啥子？”平山說：“我来看炎帝宮有好歪。”炳云急了，只好向他讲：“做庄稼都要上粮嘛。”平山不服气，又頂了两句：“盐巴交过了盐稅。你听說放牛娃要出香錢？”炳云看平山轉不过弯，只好把他帶到炎帝宮門口，才說：“你沒有藍本本，就在大門外等我，我繳了香錢馬上出来。”

刘平山留在炎帝宮門外，臉上火爍火辣的，朝里一

望，一坡笔陡的石坎，好象压在自己头上。他不相信炎帝宫有这么大的规矩，就走了进去。正穿过戏楼下面，便被两个大汉拦住，一个伸手要他交蓝本本，一个提起四尺多长的烟箴片。刘平山假装不知道，把拦住他的手推开，一直朝正殿走去。“打不死你！”“没名字的‘黑人’！”平山听见追起骂他，连忙转身，那个家伙抡起箴片劈面打来，平山赶紧闪开，箴片掺在石坎上，破成几片。那家伙震得虎口流血，痛得叫唤；另一个大汉冲上来扭住平山。平山放开嗓门大喊：“凭啥子打人？打死人抵命！”这一叫，惊动了正殿上缴香钱的工友，刘炳云和十多个烧盐的工友扑下来，又掀又推的拉开了把门狗。拿着破箴片的大汉，指着刘平山的鼻子骂：“‘黑人’，混进来偷蓝本本的！”刘平山一見人多，放起胆子顶撞：“放屁！你把嘴巴揩干净点！这是火神庙嘛，老子过路来拜火神菩萨，就该挨烟箴片呀？你们看，他把箴片都打成刷把了。”众人听了，都站在平山一边，把两个把门狗挖苦得还不起嘴。刘平山趁势走出大门，边走边说：“啥子炎帝宫哟，閻王殿！骗钱，打人！”

刘平山没有心肠等么叔，一个人走回大坟堡。在路上，一想起自己在乡下城里到处受气，他就哭了。这样的生活，足足过了五年，学了一身手艺，他还是一个没有名字、没有工价、吃偷偷饭的“黑人”。

三

一九三〇年。有一天，“滿天飛”馬玉堂，急忙坐上四人大轎去大安寨。到了楊柳樹門前，停下轎子，斥退“大班”，才輕輕叩門。王友謙的貼心保鏢從門洞里看清楚了，才開門讓他進去；左彎右拐，到了第二道大門，也是等門洞里的人盯准了才放進去；爬坡上坎，穿林過橋，走到第三道大門，這道門要讓王友謙的小老婆看明白了，才能進去。“滿天飛”見到王友謙，雙手一拱：“東家，道喜，道喜。旺昌井出火了。”王友謙數着佛珠，喃喃念道：“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一到夜晚，他帶着保鏢，走出後院，爬到僻靜的寨牆上，遙看大城堡，只見旺昌井的亮筒，瓦斯火騰空而起，紅了半邊天。他喜得抓耳搔腮，回到家里，賞這個小老婆一百張金叶子，賞那個尼姑一個金菩薩。第二天，叫來馬玉堂，賞他火圈十六口，說是“賜忠”；又命馬玉堂傳令炎帝宮會首，開簿子收燒鹽匠。

加入炎帝宮，要先交五個大洋零八百錢。劉平山是兩個肩膀抬張嘴的淨人，哪有錢來交？劉平山說：“就是有了錢，我也不拿去把那些傢伙喂得象四大天王來整自己！想穿了，就當一輩子‘黑人’，吃一世的偷偷飯。”么叔勸他，他只當耳邊風。蔡胡子說：“有了藍本本，才好闖王家，碰李家，鹽老板才肯供你。”苦朋友們又都幫湊他，這

个一吊，那个两吊，凑了三个銀元交在他手上，刘平山反轉作难了。么孀对他說：“二十岁啦，挣上工价，也好安个家嘛。”說完，她把几年挑煤炭省下的一块七角錢塞給平山。么叔找到放大利的“堆金会”，保上加保，又借了一个大洋。刘平山把錢揣在身上，过了两天，还是沒去炎帝宮。逼得么叔无法，把他撵出灶房，么孀跟着他，一齐走到炎帝宮，把平山揪进了大門。

么孀在炎帝宮門口等平山，一个卖草鞋的老大娘死盯住她。沒隔一会，老大娘又向一个十八岁的大姑娘，嘰咕咕地說一陣。姑娘背着背篋，沒有开腔，只是哭。老大娘揩了眼泪，才問么孀：“大嫂，剛才进去那个大哥，是你的兄弟呀？”“哪里哟，是我侄儿。”“該是燒盐的？”“才去領藍本本哩。”老大娘自言自語地說道：“大嫂，你福气好呵，侄儿媳妇准是个好帮手。”么孀說：“嘴巴都沒有糊住，不敢結亲哟。”老大娘又知道了么孀生一个，丢一个，眼前只有平兴和长生两个娃儿，就再也沒有說話了。她把姑娘的背篋里的衣服取出来，一件一件地折好，又放进去。

刘平山算是一个有名字的燒盐工人了。他从炎帝宮出来，么孀看了藍本本，才放心落实。老大娘提着一双草鞋，走攏他們身边，向平山說道：“大哥，看照我穷婆子，买了这双草鞋吧。”么孀看見平山光着脚板，就叫他买下。平山把錢递給老大娘，老大娘背过身哭了；他和么孀走过石桥，那个姑娘也跟着他們走过石桥，平山回头一望炎帝

宮，老大娘还站在那里望着他們。背背篋的姑娘一直跟在平山和么孀的身后。走过五星店磨子井，么孀叫歇气，刘平山說声到茶館喝碗凉水，便走开了。平山一走，那个背背篋的姑娘，就挨着么孀坐在地上。么孀問她：“你走人戶呀，到大坟堡？……”話还没有說完，姑娘就伤伤心心地大哭起来。么孀細細盘問，才知道她叫楊怀芬，爹是鞞工，去年热天从天市上摔下来跌死了，三个小兄弟餓死一个，老大娘是她媽，沒有办法，才把她放給平山当老婆，姑娘的紅庚八字，就夹在平山买的草鞋里头。……

四

刘平山和楊怀芬結婚一年后，剛生下牛儿，灾难突然落到他的么叔身上。刘炳云累得发暈，右臂陷进了盐鍋。刘平山听說，跑进灶房，只見么叔倒在一个工友的怀里，痛得双眼紧閉，牙齿把嘴唇咬出鮮血。右臂和胸部烫起果子泡，好多处烫烂了皮；手腕只剩一根骨头。……刘平山扶住么叔，痛进心里。有个工友叫喚：“快想办法！”他急得火星子濺，眼泪长流。

正在这时，大掌柜馬玉堂乘了。他穿着白綢汗褂，拿着牙骨扇把的团扇，三步当成两步地赶来，吆喝着跟在身边的坐灶管事：“为什么不捞盐？捞盐呀，一鍋盐巴，一称金銀，你赔得起？”刘平山憋不住了，跑到馬玉堂面前，吞

了一口气，才說：“掌柜，招呼柜房請个医生。”馬玉堂用扇把指着昏迷不醒的刘炳云，冷冷地說：“自不小心，惊动四邻。”然后用团扇搨搨背心，拍拍屁股，玩着扇把上的絲縷，斯斯文文地走了。刘平山心一橫，搶了一步——不知是誰紧紧把他抱住。

远远的，傳来了他么孀的哭声。平山照顾着么叔，顾不到么孀。他么孀，早就被掌柜拦在朝門外面。馬玉堂罵她：“你进去打髒了灶，冲跑財神，得了？你男人沒有死，右手带点伤，左手还摸得到你嘛。叫刘平山，快把人抬走！”

第二天，几个工友帮着刘平山，把刘炳云抬到雨台山上的仁济医院。那个会說中国話的洋人赫維特院长，笑眯眯地說：“欢迎住院，先繳十块銀元，欢迎欢迎。”刘平山要求先收病人，再設法交錢；赫維特只是半閉起眼睛，用喉嚨管說道：“上帝保佑。”在这个基督教办的医院門外，刘炳云整整呻喚了两个小时，平山他們还是只好又把么叔抬回家。抬起走了几步，赫維特才出来，連画了几个十字，口里念着：“上帝可怜不幸的人們。”

过了三天，受伤的地方发炎化膿，都发臭了。刘平山沒法，走进柜房，恰好又碰見“滿天飞”。平山說：“我么叔只有住院才有救了，他是給你們掙銀子受的伤，你高矮敷点湯药錢嘛。”馬玉堂向坐灶問道：“有这个規矩嗎？”接着又說，“不是我舍不得錢，兴坏了規矩，这自流貢井、东西

兩場還成個體統嗎？哼！”劉平山氣得兩眼直盯着掌櫃，敞開嗓子說道：“我跟你借，借一點錢好吧？不看我么叔給你們流了幾大鍋汗水，就是我这身牛肋巴也還抵得到幾個錢。”馬玉堂早就惱了，他覺得跟劉平山講幾句話，已經是賞了面子，讓他得寸進尺，這還行嗎？不等劉平山再說，他就吼開了：“滾，你滾！你滾出去！”坐灶管事趕緊把劉平山拉到外邊，做得很體貼地說道：“你不怕倒甌子嗎？”平山還要闖進櫃房，又被幾個工友拉住。他吞不下這口惡氣，在街上煩躁地轉來轉去。空起兩手回家，怎麼對得起么叔？自己要有辦法，哪還去找那雜種說話？想來想去，還得自己找路走。一抬頭，“高平第”當舖向他敞開着大門。……

么孀從枕頭下取出長生娃過冬的棉背心，拿在手里呆了一陣，才把它放進包裹。劉平山坐在門口，望着么孀，指了指自己的房間，么孀懂得，侄兒是叫她去幫助侄媳清理要當的東西。侄媳結婚才一年，她怎能狠心去收拾她當新娘的穿戴呵！

劉平山急了，站起來朝大腿一拍，向么孀舉着雙手，搖晃着齊伸伸的十個手指頭，衝出門外。么孀知道，這十個指頭，是十個銀元呵。她用衣袖揩干眼淚，艱難地走到楊懷芬的房門口，一見侄媳在折結婚時做的紅花上衣，她就抱着門枋痛哭失聲了。楊懷芬紅着眼圈走出來，把么孀扶進屋里。么孀看見床上，幾件衣服疊得伸伸展展，趕

紧走到床边，把那件紅花上衣取出。两个人坐在床上，爭来爭去，床上的牛儿，惊得炸啦啦地哭。怀芬抱起牛儿，在房里轉来轉去，口里輕声念着：“紅花花衣裳，是蔡大伯他們給的錢，么孀做的……”

刘平山挑了一担，么孀背了一背篋，大步跑到“高平第”。走进当鋪，是一人多高的板壁，板壁上是簽子門，从簽子門望去，才看見歪戴着瓜皮帽的掌柜。平山和么孀踮起脚尖，把衣服递进簽子門。掌柜把衣服提在簽子門口，前后里外看了一阵，唱小調一样叫着：“藍布长衫一件，吊二。”唱完，把衣服往里一丢。一件一件往里丢，把么孀的心都掏空了。她从板壁縫里望进去，再也看不见侄媳結婚穿的衣裳和长生的棉背心了，心痛得嘴唇不住顫动：“莫要捆得那么紧呀，我要来取的，要来取的……”

簽子門里递出十个銀元和两吊錢，又扔出一迭当票。刘平山剛把当票接在手里，兄弟刘平兴滿头大汗地跑来了，他手里拿着媽媽剛做好、还没有上脚的青布鞋，喊了一声哥，又喊一声娘，把布鞋塞在娘的手里，說：“多当几个錢，好給爹医伤。”么孀把儿子摟到身边，两行眼泪，不断綫地掉下。……

刘平山总算把么叔送进了仁济医院。

刘炳云进了医院，一家六口的生活，平山一个人挑了起来。他搶着去做每月三十班，白天夜晚拚命地干，一家人的嘴巴还是敷不圓。他抽空跑到医院去看么叔，十天

不見松，一月不見好，医药費又差一节，他急得心慌意乱，闖进院长室去找赫維特。赫維特睡在躺椅上，两手抱住肚皮，嘍哩哇啦說了一串。刘平山不管他的洋話，着急地說：“你要医好我么叔，一家人靠他吃飯！”赫維特一下站起来，用手指着房門，嘴里又响了一通。平山心想，杂种，口口声声喊上帝，說話不算数；要錢說中国話，罵人就放洋屁。无怪乎有人說：“仁而不仁，济而不济，扯謊害人，阿門上帝。”

么孀看見丈夫伤势愈来愈重，院里又在逼医药費，平山顾着一家人，拖得来两个眼睛都落了眶，她坐不住，也不忍心，便向侄儿說：“平山，我想到井上推車子……”刘平山惊了一下，跳起来說：“孀地，我就是上刀山，也不得让你……你是有……”一扭頸子，跑进房里去了。平山知道，么孀怀了孕，手边还拖着长生娃，井上推車，比坐班房还惨，不是人搞的活路。

么孀哭了一場，还是瞞过平山去推車子。那陣平兴才十四岁，横順要跟着娘去，他答应不告訴平山哥哥，么孀才把他带去了。

五

么孀去推車的那口海兴井，还是“王善人”王友謙的。王家的車房又黑又矮，三方都是土牆，太阳照不进去，里

头阴浸浸的，靠墙丢了些谷草，又烂又潮湿，热天一股臭气熏人，晚上蚊子起堆堆，硬是象座黑班房。

刘么孀走进車房，几十个人都在上杠子。多半是妇女，有老太婆，小姑娘，还有几个男子汉，一两个瞎子。她解下背带，把长生娃放在谷草上，又连忙把搭背象背背篋一样地挂上肩膀，套住背后的杠子。平兴娃拿根小搭背，跟她站一排，两眼看着娘；刘么孀给他挂搭背，手摸着他的薄菲菲的肩胛骨，鼻子就酸了。

人还没站好，車房管事“熬油灯”甩起馬鞭子就开吆，刘么孀赶紧拉娃娃一把，躬起背背朝前拖。要把五十多挑卤水从两里路深的井底扯起来，光是那根篋绳就不知道有好重呵！他们埋起脑壳，頸子伸得多长，两手触地，脚趾把坭巴都挖起来了，車子还是不肯转动。才转到两圈，头发尖尖上都在淌汗水。么孀看平兴娃，眼睛都震瞎了。

刘么孀偏起脑壳看谷草上的长生娃，头几圈，蚊子叮在他眼皮上，他不曉得吆；过两转，他餓得抓起背带角角啃；再转两趟，他哇地一声哭起来。哭得么孀背心发冷。“熬油灯”听到娃娃哭，提起馬鞭气汹汹地跑过去，平兴吓得喊了一声“娘！”“熬油灯”車轉身来：“你想梭肩膀！”劈脑壳就是一馬鞭。平兴娃一边拖来一边哭，长生娃又在嘶声叫，痛得刘么孀一口接一口的眼泪，直朝喉嚨里哽。

推着推着，門口进来一乘四人抬的拱杆轎子，轎后跟

着保鏢大汉，王友謙从轎里走出来，站在車房外面看推車，“熬油灯”赶忙把椅子端过去。側边看推車的穷苦人，看到妇女、娃娃推起太遭孽，实在不忍心，有个大哥过来把平兴换下去，跟着又有几个男的下来帮着妇女推。王友謙都看进去了。

放回車，卤筒下井，大家才歇一口气。么嬷赶忙去看平兴娃的伤，他不让看，反把弟弟抱給娘。累坏了的兄弟姊妹，躺在谷草上喘气。膘眼子女水烟匠，从柜房里走出来，提起根三尺多长的水烟袋，拍拍斃头的肩膀，把烟袋嘴从背后递攏他的嘴边。

么嬷看到心煩，抱起长生坐到柜房的窗子下边去喂奶，又听到柜房里几个女人一阵干哈哈，王友謙笑起在罵：“出去出去，老子封你們当車盘管事，不要在柜房头作观音菩薩。”几个当娼的从柜房里慢吞吞走出来，端起长板凳逡进車房。

王友謙又向“熬油灯”說：“你看到沒有？車房头女人一多，男的就來打干膀膀。再叫这些烂家什，去把哨子唱唱些，推車的更展勁，打干膀膀的还要多。”“熬油灯”接着說：“是，是，多推水，少花錢，一公的場合更紅火。”

刘么嬷在窗下听到王友謙的話，周身发麻，心子都紧了。她万想不到“王善人”叫娼妓來給推車的提勁，又叫她們勾引男人來推車。她实在不敢听下去了，抱着长生娃站起来要走，王友謙正跨出門來，吊起眼睛把她盯着。

“熬油灯”說：“一公，她两母子都在井上推車，嘿嘿，还規矩。”王友謙說：“規矩就好。我坡上的那口井要見喜了，过一陣，把她的娃娃喊过去，那边的活路松一点。”么嬭沒有答話，赶紧走开。

王友謙一来，就把“熬油灯”的“油”上滿了。王友謙的轎子還沒抬出朝門，一群保鏢还在車房，他就扯起声气喊：“上車，上車！”提起大馬鞭，把还在谷草上喘气的人吆起来。那几个当娼的，坐在长板凳上，拉着女水烟匠，不歇嘴地噴烟子，“熬油灯”掉头就罵：“嘴巴塞紧了嗎？把哨子放喙点！”她們就嘶声尖叫地喊得钻耳朵。

“熬油灯”是个高权权的干烟灰，他岔开两根叫鸡脚杆，立在車子边上，逼着大家放小跑。么嬭跑得眼睛花，看到“熬油灯”的两腿和馬鞭，变成了三支脚。前头根杠子上的王大嫂，是有喜的人，跑着跑着昏倒了，她差点踩到王大嫂的肚皮上。么嬭叫喚一声，“熬油灯”跳过来，抓住王大嫂的头发拖到谷草上。么嬭忍不住喊：“人！”“神，老子也要端他的刀头！”“熬油灯”說着給她一馬鞭。人些放声吵起来，立馬把車子推慢了，“熬油灯”干跳了几下，还是招呼不住。大家看着王大嫂双手攢着肚子，痛得臉上黄豆大的汗珠不住冒，哪个还有心干活。“熬油灯”看到大家在顾王大嫂，走过去用馬鞭敲着她的肚皮，喊道：“起来，再推两趟。年紀輕輕的，挺在这里看受湿气；要睡，等会到我床上去睡。”

刘平山回家，听怀芬说么嬷推车子去了，就赶紧跑到車房。平山看见“熬油灯”欺负王大嫂，按进車房，大吼一声：“不是人养的东西！”“熬油灯”转身甩一馬鞭，平山用劲抓住他的手杆一拖，“熬油灯”一扑爬啃着谷草。他爬起来嚎叫：“你，你姓啥？”“老子沒名字！”刘么嬷一听声音好熟，仔細一看，是他，平山！么嬷心想摔了襟背去顾他，平山向她瞄了一眼，她才明白，认了平山，“熬油灯”要到灶上找他鬧事。刘么嬷正在为难，平山反轉跟沒事的一样，甩脚甩手地走过去，取下王大嫂的襟背，帮她推車子。“熬油灯”气不过，拿着馬鞭在平山头上直晃，推車的几十双眼睛恨着他，他又不肯打下来。狗东西打不出噴嚏，又攔不下臉，聳聳鼻子，自言自語地說：“哼，猫儿聞不得魚腥，还不是想来打干牙祭。”

平山推了几十轉，趁放回車，含着一包眼泪，远远看一看平兴兄弟、长生娃和么嬷，掉头就走，忙着回去上班了。

推車的累得头晕眼花，“熬油灯”还嫌跑得不快，对着几个娼妓厉声叫道：“車盘管事，来个快的，打登儿！”那几个女人，敲着碰鈴，卷起舌头，不断气地彈出“登儿……”，接着又唱：“心肝奴的哥，細听奴家說……”

大家遭“王善人”一整，都累垮了。

推到擦黑，么嬷和平兴下了車子，抱起长生娃，拖着两条腿，跟着大家正要出朝門，“熬油灯”立在門口，擋住

大家喊着：“王一公吩示：今天推晚班的，給一公挑东西上大安寨去了，你們頂一班。”妇女們着急起来，有的說家里有病人，有的說娃娃还没吃飯，“熬油灯”咔嚓一声把門鎖了。

天黑了。“熬油灯”在給“井口土地”燒晚香，刘么孀看到土地庙內的一堆菩薩，一个土地就有几个土地婆，跟“王善人”娶的老婆一般多。“熬油灯”敬完土地，又来催大家上車。妇女、小娃娃，推了一天車，又只喝了两碗稀飯，哪里还拖得动，簡直是在地上爬。推到下半夜，“熬油灯”去睡了，当娼的也走了，只剩下王大嫂还躺在墙角谷草上，車房里頓時靜得怕人。两盞大鉢子油灯吊在梁上，照出好多怪影子，一陣冷風扑进来，灯光不住打閃，到处的影子都在晃。平兴娃惊叫一声，一把抓住娘，他說看到有人在梁上甩。两个小妹子，吓得悄悄地哭。大家又是伤心又是恨，輕声地唱起挽子歌；登一步，哼一声，唱得好沉悶呵：

天鞦子轉啲地鞦子圓，
老娘推車呵儿賺錢。
管事來打呵东家來賤，
老娘推車呵莫奈何。

.....

刘么孀回到家里，平山上班去了。楊怀芬給她說，平

山留了話：他累死也要救么叔，叫么孀保住娃娃。平山越體貼，么孀越過意不去，還是每天去推車。哪曉得隔了一個多月，么孀推車時肚子絞起的痛，回家就小產了。娃娃剛死，“熬油燈”又給么孀說，王友謙坡上的井要打穿了，那邊活路松，工錢多，叫平興去打井。娃娃推車太遭孽，醫院又在催繳錢，么孀只好讓他去了。平興娃回來，做夢都在呻喚；他怕娘傷心，還只說好。誰曉得那是啥子活路呵！

過了十多天，那天正是平興娃的生日。劉么孀從車房回家，做好飯在門口等他。一等不來，二等也不來，坡上打井的聲音：“當兒——噏兒”“當兒——噏兒”，就象敲在她的心上。天黑，么孀聽到過路人說，井上有人遭碓尾巴打飛起來摔死了。她門都沒關，就朝坡上跑。

踩碓打井，哪是人做的活路呵！一座木架有房子高，兩排人站在上面，左邊的四個踩了碓尾跳過去，右邊的四個又踩一下跳過來，跳來跳去，只看到人飛。平興和那七個人，都是光身子，只圍塊汗帕，么孀站多遠，汗水都洒到她的臉上。么孀想喊他，又不敢喊，平興娃眨一下眼睛，都要犯險呵！

“熬油燈”提着馬燈站在房檐下，么孀去問他，話還沒有說，他就吼起來了：“王一公的井，打了五年，就要見功了，早一個時辰出水，就要多進幾挑銀子，這下正在火口上！女人家，滾回去，出了事，你一家人賣了都脫不到

爪爪！”

說着說着，王友謙从房里走出来，一大群保鏢跟着他。他向“熬油灯”說：“时辰要紧，改成脚脚紅。”“熬油灯”破起喉嚨就叫：“大家听倒，現在，攔倒寸寸紅，不按打井的进寸給錢。一公关照大家，动手打脚脚紅；使勁的，按脚数多拿錢；不使勁的，摻烏梢棒。”說完，他就端起錢盤坐在板凳上，手里卡一节銅錢，架子上的碓尾巴踩下来，打响底下的铁片——当儿，他就丢一个銅錢；沒打响，他抓着烏梢棒跳起去打脚杆。这下呵，只看到平兴他們，跳来跳去，碓尾巴敲得“当儿嚏儿”“当儿嚏儿”不住地响。这才是血盆里抓飯吃，活人落进了老虎嘴。

么孀走过去，一把扭住“熬油灯”，叫他把平兴换下来。平兴在架上看到，急得喊了一声“娘！”么孀怕娃娃打慌脚，遭橫禍，只得紧閉嘴巴，哭起朝側边走，心头象油煎火烤。刘么孀生了九个娃娃：大儿，病死了；二女，只活了六十天；四儿，拖死了；五、六两个是对双，餓死了；第七个，卖給人家；第八个是长生娃，只会吃奶；第九个，推車子掉了；只有老三平兴娃，要是他，……偏偏那天又是平兴娃的生日呵！

么孀想看他，又怕看；不看他，又着急。她心里念着：大东家呵，你們吃了我那么多娃娃，莫非还要我这根沒有成人的嫩苗苗！

么孀象看到她那一群娃娃。

她站起来想跟他们拚了。

她偏偏倒倒朝王友謙走去。

“熬油灯”高举馬灯，王友謙亲自在給大家讲：“今天是黃道吉日，我要奖励大家，放下脚脚紅，来个节节高。打滿規定的尺寸，多一分，給两分的錢，多两分，給四分的錢！溜軟脚的，我也要算蕙賬！”“熬油灯”提起烏梢棒把架上的人盯倒，逼着平兴他們不打頓地跳，只看到人影子晃，連“当儿嚏儿”的声音都分不清楚了。

刘么孀扑过去抓住王友謙：“把刘平兴給我換下来，我的娃娃还年輕呵！”王友謙張开嘴巴笑起来：“年輕人跳起才好耍。”

“你們还要不要人命？”

他一声震得么孀耳朵聾：

“老子要盐水！他要命，我要錢！老子是拿錢买命！”一掌把刘么孀掀到坎底下。

刘么孀昏了好久，她不曉得。平兴把娘扶起，她才回过神来。平兴盘起两条腿，象个殘廢人，横起磨一步，皺一下眉；么孀气得昏昏沉沉，走得偏偏倒倒，也不曉得是平兴扶她，还是她扶平兴娃。

才沒走几步，平兴娃喊声：“娘！”就一口鮮血噴出来。

背后井上高叫：“出水了，給东家道喜！”

六

刘平兴得了吐血症，么嬷也倒床不起。楊怀芬照顾着长生娃和牛儿，刘平山上山四处寻草药。刘平山晚上回家，怀芬悄悄告诉他：“么叔死了！你不在家，我又分不了身，蔡大伯他们想方设法才把么叔埋了。么嬷还不晓得……”刘平山半句话未说，跑到灶房找着蔡胡子，陪他去官山坡坡。刘平山跪在坟头，泣不成声：“么叔呀，么叔！我一无香，二无烛，三无半张纸钱烧给你，你慢走一步，等侄儿我给你去算帐！”

第二天中午，刘平山来到柜房。馬玉堂抱着一个妓女正灌酒，平山拉开妓女，指着他的鼻子问：“大掌柜，我么叔烧盐受伤，死在医院，你用两个盐包子就打发了？你们吃人还吐不吐骨头！”“满天飞”把手上的酒杯摔得稀烂，大声吆喝：“岂有此理！胡闹！滚出去！”馬玉堂火上加油，刘平山气得双手掀倒面前的一桌酒席，馬玉堂连喊“来人呀！”刘平山大步走出柜房。

馬玉堂不会轻易放过刘平山。第二天上午，差狗来传平山去衙门，一个灶房就轰开了。蔡胡子和几个工友丢下活路，跟着平山一起走。公堂上，胡分县先问馬玉堂，馬玉堂说道：“回明分县，刘炳云烧盐，自不小心，按进盐锅，洋人都没有救活，这与我们掌柜、东家，有何关

系？……”

胡分县点着头說：“是呀，是呀，与你，与你东家无关。”

馬玉堂接着又說：“刘炳云到通緣井，是他苦苦哀求于我。我念他一家衣食无着，才收留灶上。刘炳云出事情，我丢了一鍋卤水不說，他还来无理取鬧……”

胡分县又点着头說：“是呀，是呀，你是为好不得好，反轉惹煩惱。”

刘平山一听，急得大叫：“有錢該生，无錢就該死？我么叔……”胡分县把桌子一拍，吼道：“休得咆哮！刘炳云自不小心，你要怪誰？你大鬧柜房还有道理？”听到堂口嘈动，他看見一群燒盐工友橫眉瞪眼，才把話头一轉：“刘平山，念你丧事在身，免予重办。你推翻酒席一桌，即作东家撫恤。退堂。”

刘平山怒气冲冲跨出衙門，又回头对着衙門上画的青天白日，喊了两个字：“好污！”

隔了几天，坐灶管事叫刘平山到柜房談話。当时，盐工有句口头禪：天不怕，地不怕，只怕柜房喊談話。一喊談話，十有九成是开除。刘平山听說柜房傳他談話，他心中有数，便把当班草鞋和褲子洗得干干淨淨，放在炉上炕起，又給灶房头的弟兄一一道了謝。他吃了晚飯，拴好包袱，找根小竹竿穿上，拗在肩头，走进柜房。

馬玉堂說：“庙小神大，你高升发财吧。”刘平山一下

火了：“我們这号人，凭气力吃饭，是千家門上的客，万家人户的祖宗牌，这家不供那家供，大的不供小的供，小的不供吃邻供。高升发财，是你贵人的福分，我么，高攀不上！”馬玉堂一看来头不妙，眼眨眉毛动，把声音放矮了：“噢，好来不如好去，这是你的工錢。”

刘平山收了工錢，把拗在肩上的竹竿，搖了两搖：“大掌柜，你看不看？謹防你看守的东西掉了哟。”馬玉堂哭笑不得。刘平山拗起衣服走了。

刘平山失业了。吐血症纏上平兴兄弟，刘平兴不願拖累哥哥，就跑出去自寻生路。

刘平山一个人失业么？这一年，自貢盐場有一万七千六百八十五个工人，就有三千四百九十八人失业，五股占了一股。刘平山沒有回家，他从大坟堡的人市坝走到自貢城里，沒找到活路，在沙灣碼頭睡了一夜。第二天上午，他看見富台山上有一乘拱杆轎子抬了下来，前面四个大班双手举起轎杆，轎頂平得可以放个水碗；一个洋人，坐在綠呢玻璃窗的轎內閉目养神。平山心想，莫非是仁济医院的赫維特么？他等轎子过了釜溪河，抬上碼頭，就搶上前去喊了一声，几个戴大圆盘帽的稅丁，拉出盒子炮，吼道：“瞎了眼睛，协理来了！”洋人把头伸出窗外，笑了一笑，就揮手叫轎夫抬到“川南盐务稽核分所”去了。刘平山向側边人打听，才知道协理叫蒲克礼斯，专门坐鎮自貢收什么外債，每年要拿走一百三十七万九千一百七十个

銀元，伙同他們在重慶海關搶劫的銀子，一起裝上輪船運到上海，再用兵船押運回國。以後劉平山才知道，帝國主義都是強盜。

回頭再說灶房，自從劉平山跨出大門，工友們就嘈開了。他們看到劉炳雲的下場，劉平山又遭倒甌子，個個說“王善人”不講天理人情。一傳十，十傳百，到處都在罵“王善人”是狼心狗肺。風聲傳到王友謙耳里，他象喉嚨里哽塊骨頭，坐臥不安，生怕工人鬧事，擄走他的財神。王友謙把馬玉堂喊到大安寨，商量了半天，最後咬牙切齒地說：“莫把我招牌打爛了。你把他找回來。”馬玉堂只好撻一個“請”字，把劉平山“請”回灶上。

平興兄弟跑到哪里去了？緊緊地壓在劉平山的心上。么嬭記得，平興娃跑出去的時候，只穿了一條補了疤的短褲，天冷了，不餓死也要凍死呀！一家人懸心吊膽，端起飯碗就想他。

有天晚上，劉平山托人帶信回來，說有人在雙鍋爐烟巷子碰到過兄弟，叫她們趕緊去找。烟巷子是什麼地方呵？么嬭知道，盡是些走投無路的失業工友，在那里遮風避雨，他們比倒在街頭巷尾的兄弟姊妹更要傷慘。一聽說平興娃在烟巷子，她的鼻子就酸了。么嬭和懷芬忙慌慌地上了街，摸黑走進烟巷子。巷子里又窄又臭，腳下又溜又髒，陰溝里的水聲，呻喚得淒淒慘慘，冷風從背後灌來，她們冷得打顫。么嬭和懷芬手牽着手，慢慢摸起上

坡。走到水巷子尽头，来到一条背街，楊怀芬仔細一看，街中間石板路下面，是連着鍋炉和烟囱的巷道，頂上有座天桥从鍋炉房通到柜房，剛好把巷道蓋住。难怪大家叫它烟巷子。烟巷子的石板上面，橫三倒四地挤了一堆人，有的睡着了，有的在呻喚。側边棧房的檐灯，光亮昏昏沉沉，她們沒法把人看清，怀芬輕声地叫着：“二兄弟，二兄弟……”沒有人答应。棧房里傳來一个卖唱女人飄飄忽忽的声音：“梨花落，杏花开，臥倒长安十二街。……”

她們在棧房里討了三支香，把它点燃，搖着香火，慢慢地从干柴竹棍般的腿杆中間跨過，一个一个地辨认。么孀摸着石板，燙手；怀芬摸着一个人的肚子，冰浸。有个小孩正在說梦話：“媽……我……不去。”說完，又咽咽地哭起来。

“么孀，你看这个，該是二兄弟！”么孀赶忙搖晃香火，和怀芬跪在地上用心細看：一个十多岁的娃娃，脑壳钻在背篋里，睡着一块破磚；两个鴛篋，搭在脚上；双手捂着臉，周身蜷做一团，背脊骨象馬路上的石子，一个一个地頂起，冷得象篩糠。看大小，很象平兴。么孀搖着他的手臂，輕声地呼喚。

他从梦中惊醒。

么孀和怀芬臉挨臉地望着他。

香在手里不停地搖晃。

他很快地从背篋里钻出来，还没有完全睜开眼睛，就

一把拉着怀芬，喊了一声：“姐姐！”

三个人，你瞧我，我瞧你。

抓住怀芬的手，松了。

半天。他才說：“我叫陈紹明。三个姐姐都抱給人家当童养媳了。你們找哪个？”怀芬說：“找兄弟。跟你一样大，姓刘，你见过沒有？”他說：“这个死了，那个又来，今天死一堆，明天又来几个，燒盐的，搗碓的，推車的，还有跟我一样大的。呵，早上还埋了一个。他，他說是死了爹沒得办法……”么嬭赶紧問：“他在哪里？”

陈紹明哭了。他边哭边說：“春生井的掌柜，嫌工人在这里臭，怕冲走灶上的财喜，埋一个，賞一吊錢。关麻子是专埋死人的。今天早晨，关麻子把他拿盐包子一裹，篾索一拴，搭在肩上，拖去窖了。我听到他还在說：‘关大爷，我还没有死啲。’关麻子拖起声气說：‘曉得，曉得，你早迟都是要走这条路的。’……”

么嬭和怀芬忍住了眼泪，沒有哭。

香快燃完了。么嬭摸着陈紹明的肩膀，向他說道：“小兄弟，阴沟头的篾片，总有它翻梢的一天！”

七

过了几个月，有一天擦黑时分，刘平山正和几个工友抬盐巴，突然听到喊叫“炎帝宫的来了，来了！”几个工人

拚命乱跑。刘平山掉头一看，只見門口走来几个大汉，把朝門乒乒一声上了杠，前头一个抱着花名册，后头五六个提着烟箴片，連声嚷叫：“站住！”“不准跑！”跟平山一起抬盐的，是个沒有“藍本本”的年輕人，他丢了杠子，剛跑几步，背后大叫：“沒名字的‘黑人’！”一个大汉追上去，抓住他的衣領往后一拖，掄起四尺长的箴片，向他脑壳搽去，一搽冒一个包，鮮血跟着伤口流。刘平山跳过去，一把抓住箴片，那青年才慌慌張張地朝灶房跑去。炎帝宮的一群袍哥打手，不住吼叫：“拿册子点人！”“香錢繳了沒有？”“沒名字的，給我打！”“抓起走！”一陣箴片，又是一陣咒罵，鬧了好久，才一窩蜂走了。

刘平山跨进灶房，猛听到灶上一声惊叫：“捞人！”“捞人！”“捞人——”工友們一迭連声呼喊，惊得人汗毛倒立。平山跟弟兄們，涌向一口大鍋旁边，举着六七盞亮油壺，拿着几把竹編的灶箕子向鍋里捞；人們大睜着眼睛，汗水鋪臉地滾。那鍋里的盐水上下翻滾，又跳又噉，团团热气，直往上冲；头几下捞起来几块衣裳、草鞋，后几下捞起来的，就只有……骨头，骨头！骨头当中，有一根水烟棒。这正是剛才和平山一起抬盐的那个青年的呵！誰知道他被打慌了，一跑竟栽进了盐鍋。

工人們提着亮油壺，圍着一堆骨头，好久沒說一句話。火热的灶房也冷得钻心，一个青年工人在低声哭泣。憋不住了，刘平山吼道：“盐，盐，盐，熬的是老子們的血

呵！”接着一片咒罵：“把狗日的卖客拖来打！”“找东家算帳！”蔡胡子叹口气，搖搖頭說：“哪年不死几个弟兄，枪炮掌在人家手头，連二杆咋拗得过大腿。”正說着，忽听門口喊声“攔轎”，两盞馬灯引着馬玉堂赶来了。他对直朝出事的盐鍋冲去，边走边嚷：“盐鍋整坏沒有？”沒人开腔。他掉轉身来，隔一丈多远站住，向着圍住骨头的工人吼道：“你們要得安逸，搞髒了盐鍋，还不快点弄干淨！”一个工人說：“这人死了，你……”話才出口，他就打断：“說話兴个忌諱。王友謙，王一爷，王一公的規矩，摔在盐鍋头搞髒卤水的，照价赔偿。”刘平山站起来，指着一堆骨头，冷冷地說：“馬大掌柜，他在这里。乡下卖光了来的，淨人一个。請过来嘛，他賠你。来！大家閃开点！”工人們閃出一条路，几十双眼睛盯住馬玉堂。馬玉堂楞了，臉上的干筋不住扯动，停了停，才紮起勁仗叫道：“你，你，把活路給我攔倒！”一揮手，跟着馬灯走了。

沒等馬玉堂走出灶房，刘平山就說：“攔倒就攔倒。”他把圍帕解开，搭在肩上，走到自己管的火圈子，一下把瓦斯火关了。跟着有几个工友也解开圍帕，关了开关。蔡胡子走到平山身边，說：“平山，我們湊几吊錢，买副板子把兄弟埋了。”刘平山含着眼泪，捧着骨头，向大家說：“这就是我們的弟兄呵，人都死了，还没有藍本本，沒有名字！”他用手臂揩了眼泪，又說：“炎帝宮害死人，沒有偿命；‘王善人’不安埋，还叫賠他的卤水。这是什么王法？

这是什么世道？不行！弟兄們，橫順一條命，跟他們拚了！”有个工人边哭边喊：“打官司！”刘平山上过当，連忙摇头，他叫道：“要出头，靠自己，只有拚！”蔡胡子禁不住热泪橫流，把圍帕解下，瘖哑地喊一声：“攔活路！”

全灶房的工友，都解下了圍帕。刘平山用自己的圍帕包了骨头，又接过蔡大伯的圍帕，拴住包袱。工友們都把圍帕交給刘平山，他便一根連一根地接上。刘平山用牙齿咬住最末的一块圍帕，爬上柱头，翻到灶房的橫梁上，把包着骨头的圍帕在橫梁上吊起。蔡胡子拾起地上的水烟棒和草鞋，用绳子套紧，双手遞給平山，平山把它拴在包袱上。一个灶房，火灭了，盐鍋里的卤水不跳了，只有規竿里流进大桶的卤水声音，大桶里滿出来了的卤水流到地上的声音。

刘平山說：“大家生在一起，死在一路。”工友們圍住平山，一起商量他們将会遇到的艰險。……

第二天一早，坐灶管事跑來說：馬玉堂請他們到柜房談話。刘平山讲：“对不住，喊他到灵堂！”早飯过后，馬玉堂走到柜房門口就罵：“你們要造反？”蔡胡子說：“杀人要抵命！”随后，任馬玉堂怎样叫罵，大家坐在圍台上都不答話。馬玉堂軟下来問道：“你們要怎样嘛？”刘平山讲：“要談，进灶房來談。”灶房一地都是卤水，馬玉堂无法下脚，急得直喊轎子。蔡胡子說：“大掌柜，哪有把轎子抬进灵堂的規矩？”馬玉堂无法，只好撩起褲脚走进灶房，問道：

“誰叫你們攔的活路？”刘平山理直气壮地說：“你！”馬玉堂說：“昨天我說的是气話。”刘平山讲：“大掌柜的吩咐，我們哪个敢不听。”馬玉堂气得跺脚，濺了一身卤水，結結巴巴地吼道：“我說錯……錯了！現在点……点火燒……燒盐。”刘平山指着梁上圍帕里的骨头，很平靜地說：“他不答应。”“你安心要怎么办？”刘平山站起来：“大家的意思：黑漆棺木埋死难工友；炎帝宮会首披麻带孝送丧；不准炎帝宮杂种到灶房抓人。”“你們乱了……”蔡胡子搶着叫道：“推他龟儿下盐鍋，喊他賠命債！”馬玉堂吓得打抖，抱拳作揖地說：“好商量，好商量，我去找王一公。”

当天下午，坐灶管事領来了八个短工。八个短工一听灶箕子捞骨头，工友攔了場合，事情未了，哪能上班燒盐！就有个短工向坐灶管事說：“少做点丧德事。我們肚皮餓起茧巴，也不搶这碗飯。”蔡胡子听了，走攏去抓紧他的双手。刘平山送走短工的时候，向他們說：“穷帮穷，富帮富，劳煩众位弟兄，在人市坝上讲明我們的事情。”

王友謙在大安寨上，怒气冲天，傳来了炎帝宮的会首，請来了盐官和胡分县。会首說：“莫非是‘黑人’奸匪搗乱？”馬玉堂讲：“查不得‘黑人’了！都有藍本本。”他們盘算了一陣，还是異口同声地劝王友謙多丢点銀子，燒盐匠攔活路熬不到几天，讓他們在灶房吃飯，不发工錢，看他屋头的婆娘娃儿咋办。

不到三天，刘平山他們家里真餓飯了。莫說吃飯，燒

盐工人家里連盐巴也吃不起了！楊怀芬从倒了的灶里，檢回一块“鍋巴盐”，哪曉得这是一块齧巴，一連吃了半个月，小牛儿就开始咳，咳得轉不过气，倒在地上跋，血从嘴里流出来，停一口气，他就喊：“媽，媽——”

媽媽不在家，天不明就去挑煤炭了。么婆呢，推車去了。长生哥哥，跑上街去了。小牛儿坐在門坎上等媽媽，他昨晚上給媽媽說过的：“媽，我給你守着門，你早点回来呀。”他一直坐在門坎上，赶場的回家了，媽沒有回来；太阳落坡了，媽还是沒有回来。小牛儿越咳越凶，瘦得象鸡娃，两只眼睛昏漠漠，一匹匹肋巴数得清楚。晚上，媽媽回来，把草药熬給他吃了，小牛儿倒在媽的怀里，搭着脑壳，有气无力地說：“媽，陈五娘家，晌午吃的……豇豆飯……有盐……好香呵！”怀芬扶着儿子的头，吞着眼泪，伤心地說：“牛儿，明天，媽給你煮豇豆飯，放一調羹……盐巴。”

鸡才叫，楊怀芬又出門挑煤炭了。她只想多掙点錢給牛儿請医生，挑起煤炭两脚不沾地的跑，也不管偏东雨打得睜不开眼睛。还没有跑攏大坎堡，突然一个人追上来喊住她：“刘大嫂，你那牛儿不对头了！”头上象响个炸雷，楊怀芬呆呆立着，雨水跟着头发流。东家的煤炭还没交呵，还有豇豆、豇豆……她硬起心腸，給东家送了煤炭，在街上掀起一把豇豆丢进籬筐，也不曉得給了多少菜錢，嘴里不住念着牛儿……

楊怀芬拖着一身泥水跑进屋，小牛儿歪坐在地上，抱

住板凳脚。她把牛儿抱在怀里，给他擦掉嘴角上的鲜血。小牛儿慢慢睁开眼睛，死死盯住妈。妈妈抓起一把豇豆，声音直抖：“牛儿呀，牛儿呀，妈给你买的豇豆，豇豆要放盐……”牛儿又睁开眼睛，看看妈妈，嘴角微微动了一下，象是在笑，接着脑壳一偏，眼睛紧紧闭上了。杨怀芬止不住放声高喊：“他爹，你在哪里呀？”

刘平山和工友们忙着在灶房给没有名字的工人扎灵堂。蔡胡子进来告诉他：“外面有个老师来找你，他说是‘萧方’的好朋友。”刘平山听说萧凤阶、方士廷两位烈士的好朋友又来找他，心里就更有胆量了；自从萧、方烈士牺牲后，平山和别的工友都很焦急，想方设法打听带路人。这阵，不由平山细想，他连忙走出灶房。从那以后，两个多月来，他脚不停地，从灶房跑到井口坝，从车房又去串连捣碓工人，争取他们都拦下活路。

有一天，刘平山抽空跑回家中，家里房门大敞开，没有一个人，除了一张床一口破沙锅，什么也没有，连孩子的籬筐窝也不见了。他一个人走到街上，来到茶馆门口，看到长生坐在阶沿上，正在啃豌豆壳和胡豆壳。刘平山喊了声：“长生娃。”长生娃把他盯了半天，见他又黑又瘦，光是两个大眼睛、长头发，都认不出大哥来了。平山又说：“长生娃，是我呵！”长生听出声音，哇地一声就扑到大哥怀里。刘平山牵着长生往回走，长生饿得来双脚打颤颤；刘平山心酸，双手把他抱起，轻得象一把谷草。

刘平山問他：“娘呢？”“天不亮就推車子去了。”“嫂嫂呢？”“跟娘一起走的。”“牛儿呢？”“他，他睡了。”

“睡了？”

“嗯。娘說的，睡了。他就睡在牆背后，包谷苗苗都长起来了。”

刘平山什么都清楚了，他再也不想回家了。他把身上仅有的一个大二百文銅元，請人宰成两半，自己揣了半边，把半边交給长生，說：“弟娃呀，这一百錢你拿去喝碗稀飯，剩下的交給么嬭。我走了。”“你莫走呀，娘和嫂嫂天天念你。”“你大哥要去給兄弟伯叔报仇！”长生娃又說：“娘和嫂嫂都給我說，等你回来就吃干飯。”

刘平山哭了。他不願意弟娃看見他的眼泪，車身就走。长生在后面追，一跑一跌，又哭又叫：“大哥呀，我不要錢，我要跟你去……”刘平山急了，他心疼长生，打了长生一个耳光，把弟娃的小手掰开，將銅元塞到他的手里，厉声地說：“听話。喝了稀飯就回家。給么嬭說，人是一口气，就是下油鍋，也要活下去！”

长生娃吓坏了，一边哭，一边問：“給嫂，……嫂，說……說啥子？”

給妻子說什么呢？有什么好說的？长生娃說得明白嗎？唉，好歹总該留几句话，平山抱着弟弟：“长生呀长生，我心头痛呀。莫哭莫哭，你看倒我。”长生娃真的不哭了，望着大哥的眼睛，他說：“哥哥，你讲嘛。”平山說：“你

給嫂嫂讲，大哥說的，她要走要飞，我不見怪；要等我回家，她就給么嬾一起掙碗飯。长生娃，你要給嫂嫂讲呀，心要放开些。你記得不？”长生好象很懂事，直点头。

刘平山心一狠，扯开腿就上路，再也不回头。刘平山在路上，一想起么叔和牛儿，二想起拴在梁上还没有掩埋的骨头，心头象一鍋燒开了的盐水，滾翻暴跳，他心里想：人有志，身有胆，癩蛤蟆都吃得上成都，不打倒王友謙、馬玉堂和炎帝宮，死了也不閉眼睛；充其量屋头的人滿盘餓死，他也要斗到底。

沒过好久，东場，西場，这个井，那个灶，到处擱場合，天天在鬧事。……王友謙在大安寨里，象热鍋上的螞蟻，急得团团轉；晚上有个蟋蟀叫，他听見都心烦，信倒奶媽、丫头把蟋蟀捉干淨。炎帝宮的会首天天上山稟告：“燒盐匠捆得梆紧，密不漏風，查不出真凭实据。”那几天，梆梆枪、盒子炮护送着四人大轎，牽纜綫地上山下山。事情越鬧越大，逼得胡分县出面轉弯，代表王友謙和炎帝宮，答应了盐場工友的条件。

出丧那天，黑漆棺材上面鋪了紅毡，紅毡上放了一块白布，白布上摆着死难工友的骨头。在棺材后面，是燒盐工人的圍帕扎的一条长龙。长长的队伍，从大坎堡走到炎帝宮，一路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王善人’！”“打倒炎帝宮！”

第二年春天，馬玉堂又喊刘平山到柜房談話。刘平

山这回笑了，他还是用根小竹竿把包袱穿上，拗在肩头，与工友们一一道别。当他喊声蔡大伯，蔡胡子高兴地朝他的胸膛打了一掌，刘平山才晃悠悠地走出灶房。这回倒馊子，馬玉堂加上一个誅諭，說他“忤逆炎帝宮”，便沒收了刘平山的藍本本。

刘平山又是一个沒有名字的燒盐工人，又跼在人市坝上。在人市坝上，他不焦不愁，来看他的朋友多，找他的人多，他和失业工友亲亲热热，人家都听他的話。那些掌柜管事来到人市坝招短工，把工价压低杀垮，在工友们头上揮舞着签子。刘平山說：“我們不是那号人，跟着你的签子轉。你那几个臭錢，留着自己刮痧吧。”

这是一个打不倒、压不垮的燒盐工人！

八

我們記完刘平山同志一家在解放前的遭遇，天已經亮了。

今天，我們在盐場走馬观花，往日打井的碓架，已經放进盐場博物館里；牛推或人推的車房，也成了只被旅客参观的古董。井場上，紅磚玻璃窗的車間里，年輕的姑娘一按开关，白水嘩啦啦地灌下去，盐水就轰隆隆地流出来；这才是真正的自流井。

我們訪問的同志，大都是退休工人，他們坐在俱樂部

里，喝着盞碗沱茶，或是搖着蒲扇下棋，或是向年輕人擺談生產經驗。一到中午和晚上，扎着小毛辮的孫女便跑來了，扯着爺爺的衣裳喊道：“爺爺，你又忘了吃飯啦，媽媽等你回去……。”

早晨，鮮紅的太陽，從東方升起；四面八方，傳來了震動世界的《國際歌》聲：

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
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
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
要為真理而鬥爭！……

1963. 9. 13.

表的故事

北京市電車公司車軌廠司機 陳國霖

兩年前，我大女兒高中畢業後在中學里當少先隊的輔導員了。我們一家人合計着，想給她買只手表。買表的那天，我親自到店裏仔仔細細挑了只一百多塊錢的，還配了條不銹鋼的表帶。

回到家，我手托着這只閃光發亮的新表，真是越看越愛，越愛心里想得越多。我把大女兒叫過來，告訴她說：“孩子，你剛參加工作，家里就能有富裕錢給你買只表了，你要動心細想想，自己享的是什麼福！戴上這只表，你千萬別忘了，二十多年前，你爸爸像你現在這麼大那陣，可是燒香算計鐘點的！”接着，我又講起那時候半夜上班受的罪來了。

二十多年前，我在電車上賣票。那年頭的電車工人，不論家住多遠，上下班都得凭着兩條腿走。我家住西單辟才胡同，電車廠在崇文門外法華寺。清早四點上班，我夜里兩點就得往那兒走。這十幾里地，緊走快趕也得兩個鐘頭。走着走着，什麼時候聞着龍鬚溝的臭味，什麼時候

才算到了。摸黑走夜路，你脚底下还得多留神，一个不小心，就许让满街的“倒卧”絆个跟斗。“倒卧”是什么？现在的青年人，大概都没见过。那多半是些失业要饭的人。一个个身上披块破麻包片子，肚子里多日没食，实在耗到一丁点热气都没有了，走着走着，一歪，倒在街上就算完了。解放以前，每到数九寒天，北京城里哪天都得往外拉这种尸首。摸黑走路让它絆个跟斗，真能把人吓出一身冷汗来。

夜里走这两个钟头倒还好说，最受罪的是家里没有钟，不知道准确的时候。

每天晚上，我躺下睡觉，我老爹就得坐在旁边守着。一会儿出去看看星星，一会儿出去听听动静。约摸着时辰差不多了，再把我叫起来。看星星，听动静，哪有准儿呢！碰上阴天下雨，就更难估算了。所以我常常不是起晚了，就是走早了。

要知道，在那种年头，你到厂晚了，就得多挨几天饿。你到厂早了吧，又得多受不少罪。

到厂晚了，为什么就得多挨几天饿呢？在旧社会，我们这些卖票的和开车的，虽说都有职业，其实全是“在业游民”。按照当时厂里的规矩，你上车干一天，月底才发给你这一天的工钱，要是你今天来晚了几步，派车员喊你没应声，那今天就算没有你那五毛四了。这还不说，明天等着瞧吧，门口准贴出来了“红字点名——一九五”！

“一九五”就是我陈国霖。那时候开车的和卖票的，在电车公司都不配有姓名，一概论多少号。你在车上干多少年，也没人称呼你的尊姓大名，什么时候都是叫你“一九五”、“一九六”一群号码！

什么叫“红字点名”呢？那就是停你的班了。往后，每天清早四点，你得照旧赶来点名，在厂门口候着。哪天用着替班的，哪天你才能上车。要是一连老停班，那就离着开除不远了。开除，那又离着“倒卧”不远了。听到“倒卧”这两字，当时的电车工人谁能不胆战心惊！

那么，到厂早了，又怎么多受罪呢？这我先得说说那时候我下班以后还要干什么。每天我卖完十二三个小时票，回到家就是掌灯时分了。连累带饿，人已然乏得像滩泥，一心盼着到家能有口稀粥喝。可是进门一看，一家老少还都没法儿动烟火呢。唉！只好转身出去租辆破洋车，豁出命来再干。拉完晚车回来，少说也有十点了。我半夜两点又得往外走，脑袋统共才能跟枕头靠上多大工夫呀！驴马干完一天活儿，还有个上槽的时候呢！我老爹真恨不能让我多睡会儿，实在舍不得早点叫我起来。

再说，早到厂子，也有早到的苦。

别管刮多大风，下多大雨，你得抱着票兜子在厂门外蹲着。为什么不进屋避一避呢？厂里房子倒有的是，就是不准开车的和卖票的进门。谁把咱们当人看了！

夏天在厂外蹲着，蚊子咬，臭味熏，还都好忍，一到冬

天可就要命了。有时候，刮風下雪我老爹沒有估摸准时候，老早把我叫了起来。我走到厂子門口一打听，才一点多钟，唉！冻着吧。我渾身都穿的什么？上身是我家里的用她一条大褲衩拼凑起来的小棉袄。应名是棉袄，其实短得盖不着肚子，糟得挂不住补釘。在車上一挤掉一块，風一吹滿街跑棉花团子。下身呢？只有条破单褲；脚底下趿拉两只烂鞋片子。十冬腊月后半夜的“刀子”風，刮得人透心寒，我觉着自己的脑浆子好像都冻成冰块了。一蹲几个钟头，也就是仗着我那陣二十多岁，多少还有点火力，万幸沒倒臥在那儿。

要能知道准钟点，不也省得晚走着急、早走受罪嗎？

我老爹疼儿心切，老琢磨这事，到底让苦日子給挤出一个穷办法来：燒香算計钟点。他买了些大根的香，事先計算好，点多长是一个钟头，用尺子比着，在香上一节节地划上墨笔道。每天晚上我睡下，我老爹就燒起香来，不錯眼珠地守着，点完一根赶快再續上一根。点到第几根的哪条墨笔道上，算是到钟点了，再把我叫起来。

其实，看天也罢，燒香也罢，真正夜夜当钟用的，还是我老爹。可怜他老人家，十幾年沒睡过一宿整觉。夏天，困得他滴里搭拉像串蒜瓣子，自个赶快站起来活动活动，也不敢閉会儿眼。冬天，屋里沒火，穿的薄，肚里又沒食，冻得他上牙跟下牙打仗，渾身哆嗦成一个团，还得不大工夫就冒着颼颼的夜風，站在外边去看天、听动静。更难为

人的是那份提心吊胆勁兒。叫早了，心疼兒子；叫晚了，一家人又要多挨餓。就是燒着香，他也不敢鬆心，萬一陰天下雨香返潮了呢。

上歲數人，夜夜這麼折騰着當鐘使喚，我做兒子的看着心裡該是什麼滋味兒？

說起來現在的年輕人都許不信，就這樣天天受憋，年年受罪，我們一家人誰的心裡都沒敢轉過這種念頭：“買個舊鐘吧！”不單我家沒鐘，我們住的那個大雜院裡十幾家人，哪家都沒鐘。

那時候，亨得利鐘表店也跟現在一樣，在北京開着三家，從早到晚不關門。可是出來進去的，都是些坐自用洋車、小汽車，穿綢緞的資本家啦，官太太啦，我就沒見有一個工人模樣的人往裡走過。我拉洋車、蹬三輪那六七年，天天免不了打亨得利門口過，甭說進去買了，都沒打算過隔大玻璃往裡瞧一眼。你想想，老的老，小的小，還都空著肚子眼巴巴盼我早點回去呢，我哪兒有那份閒精神！

這是什麼樣的社会，什麼樣的揪心日子呀！

这样的社会，这样的日子，咱們应当一絲一紋地刻在心坎上頭！活到一百歲，享着天大的福，也不該把它磨掉！

我常想：一個人的心坎上，要老刻着這種紋路，就好像心裡多了杆金秤，添了面銀鏡子。好些事，就都容易掂量出輕重，分清青紅皂白了。只要你能掂量出輕重，分清青紅皂白，心裡明明白白的，吃什麼，穿什麼，都能得益。

可你要是不明不白的，穿的好，吃的好，倒許得不着益。

还拿我們家头两年买的那只表來說吧！你要是就从眼前浮皮表面这么一看，自个凭本事挣的錢，存起来买只表，那是应该应份的！再說，如今我們那个杂院里，家家都有钟表，我家的小柜上也早摆着两只小鬧钟了，有富裕錢多添只表也算不了什么！你要是再站在大街上比比，南来北往的干部呀、工人呀、教师呀，戴表的人多着呢。人家不但戴表，还穿着毛料衣裳、騎着自行車哪。你要这么不明不白地想，今天戴上这只表，明天就許惦着做套毛料衣裳，后天也許又一心打算置辆自行車了。全都置备齐了，你再上街一比，人家有你沒有的东西更多了。得！慢慢的，你那心里就会严絲合縫地塞滿了这些东西，成天为它奔了！

可是你要是心里头有那杆金秤，多一面銀鏡子，同是这只表，分量可就完全不一样了。从这只小表，你就能照出自个那小家和咱們整个国家这十几年的天大变化来！照出社会主义的洪福来！

要随时这么动心細想，日后，工作的时候，你准知道該使出什么样的劲头儿来。就是拿着自个的劳动所得，你也准知道該怎么用了，决意不会随手乱揚。哪怕你后来再有富裕錢，多添置些什么东西，它也不会塞住你的心。

样样这么量，事事这么照，慢慢的，你就会越来越爱社会主义！越来越一心扑在社会主义上！

永远不能忘記的历史

长辛店机車車輛工厂工人 禹德水

我的老家，就在北京西南角四五十里地的王庄。这里一馬平川，除了种植小麦、玉米，还可栽插水稻。真是庄稼人施展本領的好地方。

我爷爷就是这里的庄稼人。因为家里缺吃少穿，爹很早就給地主扛长活。

卖子逃生

那时，給地主扛一天活，可以掙两升（合三斤）玉米。我出世的时候，已經有了三个哥哥，一个姐姐。全家七口，每天就靠这两升玉米过活。从我記事的时候起，家里吃的离不开榆树叶。

日子一久，我們几个孩子的臉都肿了起来，顏色黃得发青，沒有一点血色。爹瞧着我們，再也忍不住了，下狠心到地主家借了債。地主定了两个条件：一是冬借一石，春还一石三，还不清，利上加利；一条是轉年必須上他家

干活，工資中先扣除債務。這明明是一條死胡同，爹為了一家大小活命，眼睜睜地鑽了進去。

借的兩石玉米，把爹給買下了。成天給地主扛活，掙的玉米還不夠抵償利息。借的玉米也吃完了。日子怎么過呵！

一天晚上，爹和媽商量了一下，什麼東西也顧不上帶，用籬筐把我們最小的一挑，趁月黑頭，拉家帶口，逃離了家鄉。走了大半夜，來到了長辛店南面墳地的一個破窩，歇下腳來。這時，我發現爹的眉毛皺着，唉聲嘆氣；媽呢，哭哭泣泣，摟着我們幾個。我不知道將要發生什麼事情。

天亮了，爹說到長辛店去找熟人。過了很大一陣，他和一個陌生人一道來了，攆着全家，在飯鋪吃了一頓飯。雖然，很久很久沒有見過白面了，對着桌上的饅頭，爹媽都吃不下去，老是嘆氣，哭泣。

飯後，陌生人仍然跟着我們。我們來到了鐵路下面的一個地下過道。過道里真黑呀！一進去，我什麼也看不見了。當我鑽出來時，爹不見了，媽不見了，哥哥姐姐一個也沒有了。我哭呀，喊呀，但是再也不能把他們喊回來了！只有那個陌生人捉住我的兩手，硬拖着，到了他的家。

後來我才知道，爹媽沒有辦法，把我賣了；在賣我的當天，十五歲的姐姐也給人家當了童養媳。爹媽他們上了北京，爹拉起了洋車。

铁蹄下的童年

那个陌生人叫曹中，住在长辛店曹家口，是国民党和日本侵略者的狗腿子。

他把我买作家里的小奴隶。八岁的孩子，每天挑水、升火、刷碗、扫地、倒尿盆……主要的家务劳动都挑在我肩上。一事不顺他们的心，不是打就是骂，罚跪变成家常便饭。

到曹家不到一年，日本侵略者来了。我的日子也更难熬了。曹家规定，要拾满一竹筐煤核，才给饭吃。可是，日本兵又不准在铁路上捡。两年多时间，为了捡煤核换饭吃，曾经十来次被抓到警务段，拳打脚踢。有一天清晨，背着竹筐出来，走到铁路边就被捉住了。“小孩，这回你可死了死了的有。”说着，拖进警务段，丢进了一个大水池，一手按头，一手按脚，硬灌我凉水，不多一会，就昏了过去。当我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正躺在水池的边上，嘴里还不断流出水来。

可是，曹家并没有免掉我这份差事。一个竹筐仍然每天伴随着我。有一天下午，刚拾好煤核往家走，一个日本兵喝得酩酊大醉，拦住了我，逼我带他找花姑娘。我想，怎么也不能带你去欺侮中国人。他举起柳木棒就打。我乘他不注意，拔腿就跑，可他不放过我，紧紧追了来。

我跑呀跑，跑到了工厂的污水沟边，跳进了沟里。总算，这沟污水救了我的命。

回到曹家，曹中的老婆看见我头上的大疱，一身的污泥，没有半点同情，反说：“怎么没打死，你又回来啦！”这时，我真伤心透了。我恨死了日本侵略者，也恨透了曹家；同时，也怪怨起爹妈，怎么扔下我不管。那时，我不懂得这是旧制度吃人，爹妈也没办法呀！

后来，姐姐知道了我的遭遇，托人写信告诉了爹。爹来到长辛店，偷偷地用洋车把我拉回了北京，我才离开了这个虎口。

哥哥的遭遇

当时，我家住在朝阳门外锯碗胡同。大哥、三哥已经到工厂当了学徒。没有工资，吃不饱饭，劳动时间很长，平常没有假日，这些都用不着说了。最可恨的是资本家不把他们当人看，想打就打，想骂就骂。有一次，不知为点什么事，掌柜的顺手抄起压毯的木棍，向我大哥背上打去。这一棍打得真狠，肉烂了，骨碎了，身上穿的小褂，粘到了骨头上！打完之后，掌柜的还问：“你还学不学？”大哥恨得钻心，但是转念一想，学徒不满期是要赔饭钱的，家里哪有钱赔？他咬了咬牙，回答说：“你打不死我，我还得学！”

三哥在另一家工厂学徒，命运也是一样。有一次，正是元宵节前两天。他好不容易盼到了一年两天的假期，想回家看看爹妈。可就在这时，掌柜的把三哥叫了去，指着三哥织的一块地毯，一边说错了一类毛线，一边夺过三哥手上的笤帚，一个劲乱打，直打到新笤帚变成了一根根高粱苗。当然，一年一度的两天假期也没有了。

更惨的还是二哥。他起先也是在工厂学徒。突然得了痢疾。资本家不仅不给医治，反而把他交给了日本侵略者。当时北京霍乱流行，鬼子称为“霍痢拉”，一发现就集中起来，不少人还活活地被活埋了。二哥到了鬼子手里，自然也不例外，被送进一所破庙，扔在铺了厚厚一层石灰的地面上，不给吃，不给喝，几天就惨死了。

家庭毁灭

我在北京干点什么呢？爹已是快五十的人了，拉洋车很吃力，一家人（妈、嫂嫂、小妹和我）的生活压在他身上，真是喘不过气来。我十二岁不到，刚够上洋车后面的横木，就帮着在后面推！我们一老一小，一前一后，转遍了北京的大街小巷，风里来，雨里去。可是，劳累一天并不能使家里人得到温饱。妈妈、嫂嫂、妹妹就给工厂加工毛线。但是，使足劲干，一人一天成品四五斤，工资不过相当今天的四、五分钱。全家人生活还是没有办法，就只

有在街上檢白菜疙瘩和菠菜根，填塞饥腸。

就是这样，在吃人的旧制度和帝国主义統治下，也不得安身。有一天，風雪交加，家里沒有一粒粮食。爹咬着牙出車了。我既无棉衣又无破鞋，爹疼我，不让跟車。就在这一天，爹剛租好車往朝阳門东大桥一放，一个伪警察走了过来，吹鬍子瞪眼睛，說車停得不是地方。就因为爹动作稍为慢了一点，这家伙用他的三色棒，唰唰两下，拦腰猛打。爹的腰折了！真是，乡下沒有穷人的活路，城里也一样沒有穷人的活路！

家里丧失了最主要的劳动力，从此，就只能用两頓菜根来打发日子。沒有多久，嫂嫂得了重病，当然沒有錢医，不几天永远閉上了眼睛。又过不久，小妹也結束了短促的生命。从她发綠的臉上，看得出是吃菜根、野树叶中毒死的。

爹看着这样下去，一个个都得死在这里，他下了狠心，对媽和我說：“不是我忍心，活出一个是一个，咱們各自逃命吧！”我們哪里舍得再分手啊！可是总得活命！媽到地主家当了佣人；我和爹流落在街头，当了乞討的花子。

不幸，一个接着一个。就在我們分散以后，日本侵略者抓劳工，腰伤的老头也沒有放过，爹被抓了。他被押到石家庄，再也經不住折磨了，就在那里結束了苦难的一生。

天下哪有白烏鴉

我离开了爹媽，到了朝阳門外七圣庙地主張家。十三岁的孩子管一大片菜园。白天黑夜地干，换来的只是吃不飽肚子的几个窝头，沒有拿过一分錢的工資；而且，經常挨打挨罵，真是受尽了欺搾压迫。在这里硬挺了三年。最后，有一天下午，我刚澆完了一块新开的菜地，少东家来了。因为是新开地，水滲得快，硬說我偷懶沒澆，不由分說，撿起地里扒葱的铁弯齿，向我奔来。我想，已經受够气了，今天不能再受欺侮！他举起铁弯齿要打我，我一側身反手夺了过来，使勁朝他擲去，不偏不歪，正打在他腰上，哇哇叫着跑回屋叫他爹去了。我一想，不逃跑准得沒命，就这样，离开了这里。

我又进了羊圈楊姓地主的大門，管起了一片果林。这家伙心一样狠。当然沒有工資。吃飯呢？一天两頓，每頓只給两个豆皮麸子作的貼餅子。后来还因为让我去树上摘一个蜂窝，我怕螫不肯，打了我一頓之后，規定每頓飯再减少一个貼餅子。好，你不让我吃，我也有办法。我管果林，就摘果子吃，这倒也給我找到了活路。可是，有一个晚上，他突然要吃鮮果，硬逼着我上山去摘。那是个山区，一出屋就听到了狼叫。我怕狼吃人，回說不去又必定挨揍。心一横，走，不干了。在这家扛了不到一年活。

我又跨进了芦沟桥地主大贵家。他家有兩個狗腿子真叫狠。有一次他們让我作油面吃，怪說面粘是我沒作好，一边打一边还威胁：“下頓再这样，把你塞到井里去！”我一想，这两个家伙是說得出真做得出，还是趁早跑掉吧，这就又回到了北京。

經過这三进三出地主家門，我明白了，沒有一个地主不狠，正像天下沒有白烏鴉！我寻思，再不給地主扛活了！

三双手养不活四張口

这时鬼子投降了，哥哥們也已經出师了。我沿着爹的老路，拉起了洋車。我們寻思，这一下日子好过了，凭着三双手，怎么也能养活四張口了。

可是，幻想立即破灭了，哪有一天好日子过呀！国民党的金元券、銀元券，一天一个数字，哪里吃得上飯啊？我現在还清楚記得，有一次三哥接下了一件大活，讲好的工資，当时可以足足买两石玉米，可是完工后領下的这笔錢，只够买一条小褲衩！为了糊口，我們一样不得不每天在大街上拣菜根、菜头，拿来充饥。

我拉洋車，受那帮国民党的狐群狗党的欺压就更說不尽了。有一次拉一个偵緝队的特务，从东大桥到东壩，足足三十里，肚子里空、路远，真是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車停下向他要錢，他从腰間掏出盒子枪，說：“老子这是有

公事，要錢，把这个拿去。”明明是威胁，我只得忍气吞声掉轉了車头。类似这种事，我也記不清碰上了多少次。

不过，我們洋車工人也不是好惹的。等这些家伙晚上喝得熏熏大醉的时候，吆喝几个同行，拉到僻靜去处，狠狠地教訓他們一頓。揍完，我們各自东西，等他醒来，早已不見人影了。当然，这也只能泄泄胸中悶气罢了。

最倒霉的事情又发生了。我拉一个客人到白塔寺，剛停下車，警察过来了，硬說我違犯交通規則，把車上的銅把摘走了。交車时，車行老板硬要我賠很多錢，否則不收車，昼夜計算租金。我怎么办呀！回家商量了半天，决定去找“李三姐”借印子錢。我媽明知，这和早年爹在老家向地主借債一样，是一条死胡同，但也只得往里钻了。

提起“李三姐”，鋸碗胡同一带无人不知。她一方面放印子錢，一方面与偵緝队勾結，誰也不敢惹她。按規定，借錢当时，就得先扣掉利息四成，然后一月之內平均偿还。借了錢，車行老板那里倒是擋过去了，但是再也擋不住“李三姐”的逼討。因为，無論我們怎样拚命，也沒有錢每天还債。可是一天不还，她就上門提鍋、扒炕，甚至拿偵緝队的铁籠来威胁。沒有办法，把家里仅有的几件可以卖錢的东西，包括一床破被，全都变卖了，这才还清了債務。

三叉手养不活四張口，还备受欺凌，就这样在国民党統治下生活了三年。如果沒有一九四八年底隆隆的解放炮声，我們全家不知会再落个什么下場！

魚 得 水

解放了，哥哥留在城里，繼續在厂做工，我和媽回到了离別十多年不敢向往的老家。

轰轰烈烈的土改开始了，我担任了村里的民兵小队长。枪杆子第一次握在农民手上，地主老爷再不能横行霸道了。这一次，不是地主向我們逼債，是我們向地主討債，討回了农民世世代代的血債！土改中，北京还来信把我叫去，斗爭了七圣庙張家地主，最后政府按照我們的意見，把这个汉奸和恶霸逮了起来。土改后，我和媽在王庄分得了七亩好地，自己新盖了一間房。

与此同时，城里也相继开展了民主改革运动，哥哥斗爭了他們那为非作歹的掌柜，再也不允許他任意打罵剝削工人了。

从此，我們全家都翻身作了主人。不愁吃不愁穿，也真正享受到了自由的幸福。事情就怕对比。过着新社会自由幸福的日子，想起旧社会苦难的遭遇，我就想，今天的生活来得真不易啊！劳动人民的江山一定要坐稳，自己的国家一定要建設好。而每一次想到这里，心里不由得就十分激动：今天我是主人，就得像个主人样子，坚决听党的話，坚决跟着党走！

一九五一年国家逐渐开始建設，需要大批工人，我踊

跃地参加了基本建设队伍。北京展览馆、北京修造厂等处的漂亮楼房，也包括了 my 劳动汗水；官厅、唐山陡河水库几千人的庆功大会上，我得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奖状！

一九五七年我刚结婚，丰台青龙头水库开工了。当家作主的喜悦，我把媳妇也带上工地，一齐参加了劳动。新婚夫妇搞水利的事，一时被传为美谈，有的人把它画成了漫画，还有的人把我们的事编成了快板。不过，我觉得，这本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一九五八年，我被调来长辛店机车车辆工厂，当了建筑车间的架子工。这时，在我记忆里的“伤心店”，已经不存在了，八岁失去父母的黑洞，已堵塞起来。说也巧，现在我家又住曹家口，可是如今收工回家，饭熟菜香，早已等着我；与二十多年以前，提心吊胆地背着煤核到曹家换饭吃的情景，真是天上地下！

今天，再也不是“三双手养不活四张口”的时代了！我的大哥在天津地毯厂当工人，三哥是老家公社社员，我们各自的家里都有了四五口人，幸福地生活着。

禹德水呀，禹德水！只有共产党来了之后，我这久遭大旱的鱼儿，才得到了无穷无尽的幸福恩水！我常想，甜时不忘往日苦。想想自己过去的遭遇，该爱什么，该恨什么，心眼就更加明亮了。

謝大鈞整理

紡織女工話今昔

王緒生

“亲爱的潘媽媽，在这愉快的国庆节，我們很高兴地把自己的成績告訴你……”

“亲爱的潘年芳同志，你在旧社会的痛苦遭遇，使我更加懂得了今天幸福生活的可貴……”

“亲爱的潘年芳同志，你的报告給了我們深刻的教育，我們一定要握紧手中的枪，百倍警惕地保卫祖国国防，保卫社会主义建設……”

一封封热情洋溢的信，从四面八方飞到上海国棉十二厂細紗擋車工潘年芳的手里。写信的人，有紅領巾，有青年工人，有解放軍战士……。他們在听了潘年芳的报告以后，都滿怀激情地向她訴說自己的感想，汇报自己的学习和工作。

二十八年前，潘年芳是个被黑暗势力踐踏在脚下的包身工，在漫长的岁月里，在旧社会的最底层，她过着悲慘的非人生活。一九四九年，潘年芳获得了新生，成了新社会的主人。从去年开始，她担任了上海老工人讲师团的讲师。近两年中，她到过不少工厂、农村、部队、商店

和学校，作了近百次报告，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年轻的一代进行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

—

潘年芳生长在苏北泰州乡下的一个贫农家庭里。全家八口人：爷爷、爸爸、妈妈、一个妹妹和三个弟弟，只种着两亩祖坟地和向地主租来的三亩薄地。爸爸白天给地主家推车、挑担，夜里就披星戴月下地干活，可是到头来，交了地主的租，就所剩无几了。八口子住在两间破草屋里，墙是草泥糊的，门是蒲叶编的，四处透风。一年到头，穿的象蓑衣，喝的是稀糊。为了活命，潘年芳刚满八岁就到地主家放牛。在放牛的时候，年芳还带着镰刀和篮子割草，割满十五斤就卖给地主，换到一个铜板。对穷人来说，一个铜板也是难得的啊！年芳的妈妈常常候在路边，从她的小手里接过这用力气换来的一个铜板。

一九三四年夏天，大水淹没了泰州农村。潘年芳全家爬在树上、坐在木盆里，度过了难熬的七天。那会儿，妈妈正怀着八个月的身孕，因为受不住这样的折磨而去世了。

天灾加入祸，逼得人们走投无路。就在这时候，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魔掌伸进了苦难的农村。

一天，村里来了个头戴铜盆帽、身穿绸长袍的陌生

人，自称是上海日本紗厂的带工老板，特地到农村来招工。他張开油嘴对老乡們說：“嘿，到上海做工可好啦，进大工厂，住洋房、吃白米飯……三年以后，工錢全归你們自己！”

淳朴的农民疑疑惑惑地打量着这个不速之客。

“跟你去有啥規矩？”有人問他。

“有，規矩是：吃包飯，听老板的話。”陌生人說。

“几个錢一年？”

“一年不包，要包得包几年的。”

“几年呀？”

“三年。一年十元，先付定洋五元，怎么样？”

年芳的爸爸看看塌落的草房，看看还是一片水汪的薄地，看看站在一旁的全家老少，动心了。他对带工老板說道：“五元定洋太少，多一些吧！有錢人拿出五元錢不在乎，穷人多了五元，可能救人命哪！”

“那不行，說五元就是五元，規矩不能破……”带工老板铁青着臉，冷冷地回答。

“爸，五元就五元，让我去吧，活命要紧呀！……”十二岁的年芳噙着眼泪，央求着爸爸。爸爸用顫抖的手撫摸着年芳的头，什么也沒說，几滴热泪落到了孩子的头上。

看看事情已經入港，带工老板就拿出一張包身契。契上面写着：“生死疾病，一听天命，先付包洋五元，人銀二交，恐后无凭，立此包身契是实。”带工老板要潘年芳的父

亲按上手印，随后掏出五元钱，诡诈地说：“现在小姑娘卖给我啦，钱收下吧。”

当天晚上，潘年芳和前村后村的小姑娘，一共十个人，乘上船，由带工老板带到上海。

二

一旦跨进这“冒险家的乐园”，潘年芳就堕入了一个新的苦难的深渊。

清晨五点钟，日本裕丰纱厂（现在的上海国棉十七厂前身）红围墙的旁边，站着一百多个拖着一条长辫子的农村姑娘，她们都是跟潘年芳一样，被带工老板买来的。九点多钟，厂门开了，开始写“号头”（即登记做工）了。一个日本人拿着竹竿，象撥弄一捆捆棉纱似的，把这些小姑娘挑来拣去。身材高大一些的被写上了号头，生得比较矮小的潘年芳却被剔了出来。

当她们回到老板那里的时候，老板娘坐在门口，见一个问一个：“号头写上没有？”写上号头的通过了这个关口，轮到潘年芳时，她胆怯地摇了摇头。老板娘顺手抓起一只板凳，砰的一下，往潘年芳头上擲过去。板凳角砸破了年芳的头顶，顿时鲜血直淋。但是，老板和老板娘是决不会让一个五元钱买来的“活工具”白白吃闲饭的。他们叫她烧饭、洗衣服、拖地板……，稍不如意，就拳打脚

踢。年芳头上的伤疤，刚结痂又被打破，怎么也长不好。

后来，潘年芳哭肿着眼睛，又一次等在日本纱厂的墙脚边。有人告诉她：踮起脚尖，看起来可以高一些。可怜小小的年芳踮着脚尖足足等了三个小时，才算写上号头。就这样，潘年芳当上了包身工。

包身工的生活，把潘年芳打进了人间地狱。三十多个人，睡在一间七尺宽、十二尺长的搁楼上。寒冬腊月，四个人合一条被子。早上四点半，天色还灰蒙蒙的时候，就响起了头道铃声，夹杂着“起来啊！起来啊！”的吆喝声。搁楼上立即一阵骚动：包身工们一个挨一个地在木桶里小便，穿鞋子，用狗齿般的梳子梳辫子，把破被头堆起来……一会儿，二道铃又响了，一个小姑娘拎出一桶碎米薄粥，一只放着几片臭咸菜的粗碗。这就是早饭。于是又是一阵骚动：当当的碗筷的碰击声，唏嘘的喝粥声……。潘年芳刚喝完一碗，伸手拿起勺子时，勺子已碰到桶底了。即使喝得快的，侥幸喝上两碗，也还是填不饱肚皮。

十三四岁的、十五六岁的姑娘，已经长大成人了。可是她们穿的是露着肩膀、没有衣边没有袖底的破衣服，蓬头赤脚，无夏无冬。潘年芳做包身工已经两年了，身上穿的仍然是过去妈妈在世时亲手做的两套衣服，脚上穿的也是妈妈亲手做的两双鞋子。衣服已破成条条块块，鞋子也磨光了后跟，但她还是当宝贝一样保存着；她知道，不可能有比这再多一点的东西了。在夏天的晚上，这些

擱樓上常常發出“喔！痛呀……”的哀號聲，這是包身工們在相互幫助脫衣服，因為蚊子、臭蟲在她們身上咬了許多紅斑，抓破了就發炎，衣服都粘在爛瘡上了。爛瘡給潘年芳身上留下了斑斑疤痕，成為她永遠忘不了的苦難的標記。

作為“會說話的工具”，潘年芳和小姐妹們是沒有一點人身自由的。每天，她們被帶工老板或者老板手下的流氓押着上班下班，不准與外人講話，不准與親人見面，不准寫信。……在工廠里，吃飯也是違法的。廠里規定吃飯不關車，她們只好站在車旁，一邊工作，一邊乘那些統治者去吃飯的間隙，用手抓着冷飯，往嘴里塞。吃飯如此，大小便同樣地被控制得嚴嚴的。兩個車間的幾百個人合用兩塊牌子，憑牌進廁所，沒有牌子不准去。有時半天也拿不到牌子，小便在身上的人不是個別的。她們每天要工作十二小時。車間里絮塵飛揚、蒸汽如霧，惡濁的空氣令人窒息。這還不算，那些穿着大皮靴的日本領班，穿着木屐的東洋婆（日本女人），穿着圓口皮底鞋的“拿摩溫”（工頭），象餓狼一般整天在車間里踱步尋事，侮辱工人。哪里斷了頭沒有接好，哪里錠壳軋壞了，或者皮輓擺錯了方向，只要被他們挑到一點差錯，就會招來一頓打罵。包身工，更是他們壓迫欺凌的對象，他們愛怎樣擺布就怎樣擺布！日本領班動輒用大皮靴踢她們的下身；東洋婆常常扭住包身工往“車弄堂”里摔，摔倒了再踏上几木屐；拿

摩溫呢，拉住包身工辮子拿銅管、木管劈頭劈腦地亂敲。碰到這種情形，她們只好流淚哀求，哭聲大一些，就要受到更惡毒的毒打。

做包身工後的第二年夏天，潘年芳的腳底心裡生了一個瘡，沒錢醫治，還要拖着半截鞋在細紗車弄堂裡不停的跑。傷口擴大了，紅凸凸的，象只小人拳頭。有一次，潘年芳搭腳在車梗上伸手拿細紗，不料鐵梗碰到爛瘡，一陣鑽心的劇痛，使她速速“啊唷”了幾聲。她彎下腰剛要看看傷口，日本領班來了。

“揩油！壞東西！”日本領班過來，惡狠狠地朝着潘年芳連踢了三腳。

潘年芳驚惶失措地逃向廁所，拿摩溫覺得這正是自己討好日本人的機會，立即追上去拉着她的辮子，邊打邊拖到日本領班的寫字間里去。

“揩油壞東西，開除，開除啫！”日本領班翹起腿坐着，嘴角邊叼着一枝香煙，露出了一副吃人的凶相。

開除！可以離開這活地獄，這不是潘年芳日夜盼望着的嗎？可是，能行嗎？帶工老板的皮鞭和猙獰的面孔浮現在她面前，毒打和死亡的陰影籠罩着她的全身。她顫抖地哀求着：“求求老板，不要開除我，我是吃包飯的啊！”

“哼！”日本領班冷笑一聲，就叫拿摩溫把一只方凳四腳朝天放倒，要潘年芳的兩隻手和兩個膝蓋抵在四只凳

脚上，臉朝地的趴着。就这样，潘年芳“趴”了足足三个小时，才保住了飯碗。

三

猪一般的生活，泥土一般的被踐踏，很多人被折磨得瘦弱不堪，有的患脑膜炎等急病死了，有的害瘧疾死了，也有泻肚子泻死的，倔强一些的姑娘，那就被活活打死。跟潘年芳同船出来的十个小姑娘，只剩下了五个。她的同村姊妹陈桂英，是在她的怀里咽下最后一口气的，那是潘年芳永远也不会忘却的事。

陈桂英是潘年芳的邻居。她俩在一起背着籃子割草，一起玩耍。来到这吃人的地方，她們又同睡一个被窝。第二年，桂英得了黄疸病，渾身沒有力气，連路也走不动了。她喘着气哀求老板說：“今天实在做不动了。”可是，“請假”的例子是不能隨便开的，老板随手啪啪啪地往桂英头上打去。桂英一个踉蹌，倒在地上，一时的惊慌和气愤，使她禁不住大哭起来。在这个地方，大声地哭，就是一种反抗的行为。“呀！賤骨头，你敢哭，看誰有本事！”老板抖动滿臉横肉，吼叫起来。他丢了一个眼色，狗腿子就把桂英反綁着手吊在梁上，又扎紧了她的褲脚管，灭絕人性地把一只黄猫塞进桂英的褲襠，接着又用皮鞭抽打，鞭子一抽，黄猫就在里面乱跳乱抓，尖利的猫脚爪把桂英的

下身和两腿抓得鲜血淋漓。为了“杀一儆百”，老板又逼着其他包身工在旁边看着，就这样，一直折磨了三刻钟。

桂英被姊妹们搀到搁楼上时，已浑身是血，不省人事。从那以后，几天来，她一直闭着眼睛，不哼一声，也不愿喝一口水，只是紧紧握着两只冒着冷汗的拳头。

“桂英姐，喝一口粥汤吧……”潘年芳下工回来偷偷地盛了半碗薄粥，噙着泪水扑在桂英身上。

桂英的嘴唇牵动了一下，想说些什么，但，声音没发出，泪水却涌了出来。她挣扎着，睁开失神的眼睛，猛的捏着年芳的手，哆嗦着说：“兰英（潘年芳的小名），你要替我出这口气啊！你对我爸爸说，要算这笔账……”倔强的桂英，终于离开了人间。

包身工里也有烈性子的姑娘，想到过“逃走”这条路。但是，在流氓的严密控制下，没有一个能逃出他们的魔掌。有一个姓蔡的十一岁的小姑娘，暗地里认识了一个好心人，张罗了几个钱，在一个阴暗的清晨，在上工路上逃了出来，搭上了回家的小轮船。就在这时候，流氓赶到了，连忙把她拖回去。在一间空房子里，流氓用布头塞住姑娘的嘴，浑身毒打。第二天，有人在垃圾桶里发现了她的尸体。

潘年芳受尽剥削和痛苦，熬过了四年（三年后，带工老板想出种种借口，要她多做一年），才算脱离了包工老板的魔掌。

可是，在旧社会里，对于一个工人来说，脱开这个带工老板的魔掌，却跳不出那个老板的魔掌。重重叠叠的黑暗势力压在头上，使潘年芳始终喘不过气来。抗战胜利后，潘年芳从裕丰纱厂转到大康纱厂（国棉十二厂前身），但国民党反动派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差不多，世道仍旧是一样，骑在人民头上的仍是那些压迫者和剥削者，被踩在脚底下的还是工人。由于长期的折磨和劳累，解放前夕，不到三十岁的潘年芳，已经浑身是病：严重的妇女病；拖了十多年的痔疮，整天流着血和脓，走起路来不能跨大步；胸口生了个大血块；还害了血吸虫病，像个怀胎十月的孕妇。白天，她拖着碎步上工；晚上，由丈夫背到家里。在潘年芳看来，她这一生除了受苦难以外，再没有什么希望了。她甚至念佛吃长素，想修个好来生。

四

然而，黑夜总有尽头。包身工终于见到了太阳，共产党和毛主席给受苦人带来了希望。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了，工人翻身了。厂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包身制取消了，拆除了专门给工人走的木栅栏。潘年芳从十二岁做工到现在，第一次扬眉吐气地从大门走进走出；满脸横肉的工头恶霸，都被斗倒了。……

在旧社会里受尽折磨、被病魔拖得半死的潘年芳，在

党的关怀下，一次又一次地得到了治疗。解放第一年，她在工会的帮助下，把拖了十多年的痔疮割治了；同年下半年，她又进医院治好了血吸虫病；第二年，她开刀割治了子宫瘤，第三年，为了根治她的脾脏毛病，厂的领导和院方经过仔细研究，为她动了大手术，在胸部左下面开了个六寸长的刀口，从胸腔里取出了十斤重的大血块。潘年芳的生活也越过越好了。她的丈夫在旧社会里长期失业，现在才有了固定的职业。老夫妻身边有个十三岁的小女儿，儿子和媳妇在北京工作，孙子孙女也有了。

最近，在国棉十二厂的工房里，我访问了潘年芳同志。她住的房子不算大，但收拾得十分齐整。当我打量着房间的布置时，她就忙着为我指点说：“你看，我做包身工时根本没想过要桌子，以后做工结婚时用的是四脚摇摆的破板桌子，现在是四平八稳的红木台子；过去当包身工睡的是地铺，以后结婚是用两条竹凳子搁上四分厚的铺板，现在睡的是新床。”她又指着房间里的箱、柜说：“这些都是解放后买的。……”

在她房间的墙上，挂着几个玻璃镜架，里边嵌着很多照片，很多是她在杭州工人疗养所休养时拍的。有一个镜框里放着工人文化宫聘请她担任讲师团讲师的聘请书，她指着它激动地说：“党不仅夺回了我的健康，给了我幸福生活，还使我懂得了生活的意义，我在一九五九年九月底入了党，去年又被聘为老工人讲师团讲师。我要把自

已亲身经历的千辛万苦告诉青年人，要他们珍惜新社会的美好生活，永远不要忘记过去。”

那天，她兴致很高，陪我到她当包身工时住的地方去看看。我们从她的家里出来沿着海州路、贵阳路走向她二十八年住过的裕丰工房——现在是国棉十七厂定海路四百四十九弄工房。如今，这里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工房的大门口高挂着毛主席像和大红星，潘年芳拉着我的手气愤地说：“过去，这里进出的是两种人：一种是叉着腰、呼么喝六的老板、老板娘和流氓；另一种就是叫化子一样的包身工。她领我走到右边最末第二幢房子前站住，红着眼圈说：“这就是从前我们住的地方，桂英姐就是死在这搁楼上的。”而现在，一切都变了，这里住着幸福的工人家庭，房子已修理一新，暖和和的阳光透过玻璃照射进去，更加显得舒适和宁静。

工房后面有两扇掩着的淡蓝色的门，门上写着“儿童乐园”四个字。潘年芳已多时没有来过这里了，她快乐地叫了起来：“你看，这有多好啊！二十八年前，这里是一片荒草哪！”我们推门进去，只见两排房子，粉刷得雪白，衬着淡蓝色的玻璃窗框，分外耀眼。房子里边整整齐齐地排着小紫红凳子，在房子后面还有个小花园。一群四五岁的孩子欢乐地玩着。

我们又沿着潘年芳过去每天拎着破饭篮上工的定海路走向国棉十七厂，她指着两旁的商店和厂房说：“那时，

这里全是长得人把高的荒草地，我們多少个好姊妹被虐待死去以后，尸体用芦席一卷，就丢在这荒地上。……”

一陣欢乐的笑声打断了潘年芳的談話。迎着我們走来的是一群放工回家的女工。她們都穿得整整齐齐的，凡是冬天出門所需要的都有了。她們的手里都拎着一只小提包，手提包里有的放着正在編織的毛綫衣物，有的装着順便在街上买的一些日用品。有孩子的女工，抱着寄托在工厂托儿所的孩子，这些小孩都被耀眼的花布棉袄或鑲着白色毛毛边的紅綢子斗篷紧紧裹着；有的还戴着小口罩，只留两只烏油油的小眼睛望着媽媽。有的女工还同推着自行車的爱人并肩走着，他們大都是在一个厂工作的；有些女工的丈夫在邻近工厂工作，順便等在厂門口同道回家的。另一群嘻嘻哈哈打鬧着的十八九岁的姑娘，是年輕一代的紡織女工。她們穿着鮮艳的短棉袄，卡其布褲子。潘年芳指着她們說：“你看！她們是培訓工，国家除了供給她們吃住以外，每月还有七八元的零用錢，每天工作八小时，有老工人包教技术；下班后，工会还組織她們开展文娱活动，唱歌、跳舞、看电影。……比比我們的过去，真是天上地下。……”

是啊，天上地下，換了人間。从这个包身工的今昔对比，从两代紡織女工的巨大变化，我又一次深刻地感受到：党是永远不落的太阳，她給我們光明，給我們溫暖，給我們幸福，給我們力量！

我的学徒生活

上海汽轮机厂編鋼車間工段长 应德全

一九三〇年三月，我剛滿十二岁。一天，母亲給我換上一套半新的夾衣，叫我跟孀孀到上海來學生意。到了上海，孀孀備了一副香燭，在一个阴沉沉的上午，把我送进当时的項興昌翻砂厂。从此我就象进了監獄一样。

項興昌翻砂厂在当时还算是个比較大的工厂，有四十多个老师傅和二十多个学徒。老师傅們晚上回家，我們二十多个学徒就睡在一間小棚楼上。在这个小棚楼上，老板用毛竹搭成三层床鋪，就象是“鴿子籠”一样。每天清晨，我們从“鴿子籠”里钻出来，走进黑洞洞的又矮又小的工場間，点起幽幽的灯火，开始篩砂泥、拌砂泥、糊炭灰，把当天造型用的砂箱一只只扛到老师傅做生活的地方去。这铁制的砂箱，輕的一个人可以搬得动，重的則有五百斤到一千斤，又沒有行車等起重設備，大家只好用扛棒抬，五六人或七八人挤在一起，象螞蟻搬骨头一样把砂箱一个个地搬到指定的地方。这些重活不做完，老板是不准我們吃早飯的。我們常常要做到八九点钟，才能吃

早飯。早飯沒有菜，每人每天只發一個銅板。當時買一根油條要三個銅板，我們只得三個人合起來買一根油條，大家分着吃，有時弄一匙醬油往粥里一拌——吃“紅粥”。這樣半飢半飽地吃一頓早飯，熬到中午，又吃什麼呢？老板是個吃素的，規定葷菜不准進門，全廠老師傅和學徒只得陪着他吃素，天天吃的是臭咸菜、煮青菜。其實，他吃素是名，“刮皮”是實。我從十二歲學生意到二十二歲，吃了整整十年的素。下午，化鐵爐生起火來，工場間煙霧瀰漫，一直要到晚上七八點鐘才開爐出鐵水澆鑄。老板規定，一定要在出完鐵水、澆好全部鑄件以後，才能吃晚飯。等到澆好鑄件，這時差不多已是晚上十時左右了。老師傅們吃了晚飯，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家去了，而我們學徒還要整理工場，經常干到深夜一二點鐘才能休息。有時老板還要逼我們加夜班。我們常常一邊干活，一邊就睡着了。後來，我們就索性睡在工場里。夏天，我們常常弄一塊木板，把兩頭攔在砂箱上，就算作床鋪。冬天，有熱氣地方就是我們的最好的睡覺場所。我們學徒經常是五六個人背靠背地擠在出鐵坑里，靠出鐵坑里的余熱暖和身子，直到鐵坑漸漸冷下來，我們才被凍醒。

工場間整天飛揚着灰塵，空氣十分混濁。我們根本沒有錢、也沒有時間去洗澡，一年到頭，渾身都是黑的。有一次，我母親從鄉下來看我。我三步並二步地跑到母親面前，母親卻呆住了。她睜着兩只眼睛瞅着我，左看右看，

好象不认得我似的。原来这时的我，除了两只眼睛会动，一排牙齿是白的以外，脸上身上一片墨黑，真象从炭窑里掏出来的一样。等我喊了一声“妈！”她才惊醒过来，一把将我抱住，呜呜地哭了起来。我离家时，母亲为我做了一件半新半旧的夹衣，进厂没有多久，就被我穿得象理发店里的磨刀布一样。那时，我们一年只有八天假期，可是每到节日，老板又要我们学徒把全工场的全部砂泥筛一遍，然后才能休息。这样一来，我们只好在节日前夜再加一个通宵班，把砂筛好，在第二天上午睡一觉，下午才可以休息半天。这时候，我们才能够稍稍透一口气。

那时做学徒，是很难学到技术的。老师傅们忙着做自己的生活，哪有心思来教我们呢！老板也巴不得我们学不到技术，这样，我们即使满了师，由于没有手艺，人家不要，就只好继续在厂里为老板卖命。我在项兴昌翻砂厂做了两年杂活，才被派做小泥心。当时，我心里很高兴，以为可以学到技术了，哪晓得却被调去受活罪。当时全场四十多个老师傅用的小泥心全部都叫我一个人做，我技术又不熟练，哪能来得及？但老板是要靠浇好的铸件去赚钱的，一碰上泥心来不及供应，就叫领班的工头拿着铁棍来打。铁棍常常又是刚从铁水里抽出来的，烧得火红火红，一棍打到身上，就在我身上留下一串紫红色的血泡。我实在被打怕了，大热天，有时也穿着一件破棉袄坐在工场里打泥心。这样即使挨打，也不致把皮肉

燙壞。翻砂工場的溫度本來就很高，再加上穿件棉祆做生活，真象坐在火坑里一樣，難受極了。但是這比火紅的鐵棍打在皮肉上總要好受得多。

那時，我也下過幾次決心，要跳出火坑。我曾逃跑過好幾次，但都被送了回來。一次，我被領班打了一頓後，逃到一個師傅家裏。師傅雖然很同情我，但連他自己也吃不飽，又怎能收留我呢？這樣我又被送回到廠裏。第二次，我做壞了一隻“生活”，為了怕挨打，就逃到我叔父家裏。叔父也養不起我，只好再把我送回廠裏。叔父一走，老板就惡狠狠地拿起籐條鞭子把我毒打了一頓。第三次，我又做壞了一隻“生活”。我怕老板再用籐條鞭子打，又逃跑了。這次，我混在人群中，擠上了船，回到寧波鄉下。當時，我還天真地想：這次我逃出了上海，老板總歸拿我沒辦法了。可是回到家裏以後，我又冷了半截。我家實在太窮，回家後媽媽不但不能養活我，而且老板還要她賠三年飯錢，我家又怎能賠得起呢？媽媽抱著我痛哭。我想來想去，只好硬著頭皮，仍舊回到項興昌翻砂廠去做牛馬。

一九三五年，也是我的學徒生活的最後一年，虹口地區的翻砂工人，為了反抗資本家的殘酷剝削、爭取把每天的勞動時間減少到九小時而舉行罷工。當時有些老師傅告訴我，我們工人要翻身，就要團結起來和資本家鬥爭。我高興極了，就跟老師傅們一道行動起來。一次，我去通

知隔壁一家工厂的工人罢工，哪晓得被老板发现了。老板打了电话到巡捕房（警察局），巡捕房开来一车子全副武装的巡捕，动手抓人。我厂老板指着我对巡捕说：“这个小赤佬是个坏东西，把他带去。”就这样，我与其他五位老师傅被关进红车子，押到当时嘉兴路公共租界的巡捕房。当天，虹口的翻砂工人大多到巡捕房门前去示威，要求释放我们。在工人弟兄的压力下，他们才把我们放了出来。但是，我们六个人还是被老板借口参加工会开除了。老板还在报上登了声明，使我们长期找不到职业。我为了生活，不得不东奔西走，经常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

是共产党和毛主席救了我。上海解放后，我进了通用机器厂（上海汽轮机厂的前身）做工，生活才安定下来。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我提高了阶级觉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当了工长。一九五八年，我的儿子在初中毕业后进了我们的工厂，被分配在我们工段里做造型工。年轻的一代在党的教育下，进步很快。想想我们当年的学徒生活，我真为他们感到幸福。党为他们开辟了多么美好的天地啊！

薛润德整理

在一場民族糾紛的圈套下

河北孟村回族自治縣塔上公社
塔上大隊副大隊長 劉廷貴

最毒不過地主心。在舊社會，萬惡的地主階級，在殘酷地壓迫和剝削着各族勞動人民的同時，還常常互相勾結，打着“民族”的旗號，製造糾紛，從中取利。俺家就是在地主製造的一場糾紛中傾家蕩產的一戶。

俺家是回族。土改時儘管連個貧農都算不上，但是在四十五年前，俺家還耕種着祖傳下來的十畝好地和十七畝碱洼地。那時，再加上父親賣點醬油、醋，一家七口人，生活雖說不上好，但也過得下去。哪想到，就在這個時候，一場禍事突然臨頭了。

那是一九一八年的農曆正月初三。俺父親劉步峰，一向勤快、老實，又逢剛過春節，所以一清早就把門前打掃得干干淨淨。這一打掃不要緊，鄰村黃龍潭漢族地主黃金榜和張介臣，硬說俺家偷了他們的干草，帶領着十幾個狗腿子，堵住門口要搜。不管俺父親怎樣解釋，他們都一口咬定是俺家偷的。

這時，一個叫張頓的漢族弟兄站了出來。他是黃龍

潭村的，在俺塔上給回族地主刘獻曾打短工，对俺家比較了解，就劝解說：“刘步峰一家是安份守己的，不会干偷偷摸摸的事，是不是誤会了？还是再訪查訪查吧。”

这两个地主一看穿的破破烂烂的張頓竟敢帮回民說話，立时把狗眼睛一瞪，說：“你不在家跑到这里干嘛，一定和賊回子有勾結，先把他綁起来！”不容分說，狗腿子就把張頓綁了个結实。接着就硬往俺屋里闖。

站在一旁的回族老乡刘蔭池，見地主欺人太甚，气不平地說：“你們要搜也可以，可是搜不出来怎么办？”

“怎么办？——你也是他們的同党！”地主一声吆喝，狗腿子上去两巴掌，打得刘蔭池鼻口出血……

就这么着，俺家象犯了抄家罪似的，屋里屋外，被翻了个底朝上。干草，当然沒有搜出来。可是，在当时那个天日下，哪处去說理呀！他們又說俺家把干草藏到別处去了，把俺父亲打了一頓，又綁起来，要送往县衙門。俺看捆上父亲就急了，过去拉住說：“搜沒搜出来，怎么还綁人！”黄金榜过来就是一脚，把我踹了个趑趄，疼得半天喘不过气来。俺父亲被带走了，家里哭哭叫叫地半宿也沒睡觉。

第二天，俺母亲叫俺到城里給父亲去送飯，順便打听打听案子怎么样。俺送完了飯，就住在西关馬家店听信。天晌午的时候，正赶上在县衙門里做飯的一个汉族老乡来了，他告訴俺說，俺家的案子不十分要紧。因为地主沒

搜出干草，就在路上拉攏張頓，叫他证明俺家偷了干草，事后給他一些好处。地主以为有錢能使鬼推磨，万沒想到張頓人穷志不倒，到了堂上，实話实說，把地主气得干瞪眼睛。他劝俺不要着急，过两天打个保，就会放出来的。过了两天，果然俺父亲取保釋放了。一个老实人家，虽然无缘无故地挨了頓打，坐了两天班房，可是人回来就欢喜啦，哪敢再去分什么理呢。

但是，俺村回族地主刘献曾知道后，却大罵俺家弄种，給回民丢了臉，并說：“你完了，我可不完，这官司我替你打！”俺父亲說：“三爷，这个事是受了屈，可是要打官司，俺耽誤不起功夫，又拿不出錢，还是算了吧。”刘献曾把胸膛一拍說：“一切有我呢，你就整好吧！”

当时，俺和俺父亲虽然受到了汉族地主的毒辣，但是对本民族的地主缺乏認識，还觉得人家腰杆硬，能替自己出口气也不錯，便沒有再說什么。

从此，刘献曾經常坐着两个騾子拉的大轎車往县城里跑。可是官司打得怎样，他不說，俺家也沒敢問。一天，俺进城去赶集，碰巧看見刘献曾和黄龙潭的黄金榜、張介臣一块从县衙門里出来。他們一路走，一路說笑，好象老朋友似的，最后还一块到飯館去喝酒、吃飯。俺心里捉摸：两家打官司，是冤家对头，干嘛他們这样亲近呢？莫不是有什么圈套？我回家告訴了父亲。父亲听了之后，沉吟了半天，才叹了口气說：“看来咱这点地要保不住了。”

我問：“为什么？”父亲只搖了搖頭，說了句：“這年頭什么事都有呵！”

過了幾天，俺父親去問劉獻曾。這個狡猾的地主一見俺父親就哭喪着臉說：“黃金榜他們已經托了門子，看來官司不大好打！”俺父親立時轉舵說：“三爺，不好打，就算啦，反正俺家也打不起！”劉獻曾嘿嘿冷笑了兩聲，陰險地說：“到了這一步你想撒腿也不行啦，我不能跟着你丟臉！官司，我一定要打下去，他們能托門子，我也能走動走動，走着瞧吧！”

地主的心，都是又毒又狠的。俺家打不起官司，他硬壓着頭皮讓俺打，他圖個嘛？還不是看着俺家那十畝好地。俺父親這時已經看透了地主的陰謀，愁得整天連飯也吃不下去。可是俺愁地主却樂呢。他更加緊往縣城里跑，那大轎車叮叮當當的鈴聲，真象催命似的叫人難受！

當地里的高粱長到一尺多高的時候，一天，劉獻曾高興地通知俺父親說：“我总算沒白出力，官司打贏了！過幾天就給你唱戲、賠禮，這回你的面子可不小呵！”俺父親雖然心里愁得厲害，但是表面上還不得不說“托三爺的福”、“感謝三爺的幫忙”。過了幾天，果然黃龍潭村來人在劉獻曾的房后，搭起了戲台，敲起了鑼鼓。俺父親擔心這筆賬無法算，連戲台邊也沒敢傍，只是悶在家里唉聲嘆氣。我年輕不大懂事，就跑去轉了轉，見劉獻曾戴着眼鏡，榮耀地坐在看台中間，象立了什麼大功似的，一会儿和這

个夸，一会儿又和那个讲，根本没有俺家的事。俺跑回家生气地告诉父亲：“不是给咱唱戏赔礼嘛，干嘛一点也不提咱家的事，这戏到底给谁唱的？”俺父亲一句话也不说，只是眉头上的疙瘩越结越大了。

可是，戏台拆了之后，俺父亲却被刘献曾叫了去：

“戏给你唱了，你的脸也有了，我这两条腿跑得也累了。”刘献曾打了个饱嗝，接着说：“累点嘛，为了咱回民，倒没有嘛，可是托门子花钱着实不少啊。我也知道你家不太宽裕，我既管了这档子事，也就参加一份，你少拿点，就掏三百三十块吧！”

“三百三十块！”在那年头可以置七八亩顶好的地。俺家每天都过着“鸡衔食”的日子，哪出得起！俺父亲脸都吓白了，哆哆嗦嗦地说：“这么多钱，俺……俺家……怎么……拿得出！俺原先就不愿打官司，三爷说一切由你担着，如今又叫俺出三百三十块大洋，这……这……”

“你这哑巴（当地骂人的话）真不知香臭！你牵了牛叫我替你去拔橛子，天下哪有这样便宜的事！”刘献曾声色俱厉地说完，又马上转了个弯儿，假惺惺地说，“什么事得讲心呵！为了你家的官司，我又跑腿、又出钱，你说，我图嘛，我的地也不是白拾来的！还不是为了你，为了咱塔上的回民。”

“可三爷，俺家实在没有呵！”

“没有？——不是有地嘛！”

俺父亲这几个月担心的，就是地。现在一切摆清楚了，地主设的圈套也正是为了俺家的地。可地是庄稼人的命根子呀，怎么能轻易出手呢！俺父亲连忙哀告说：“地卖了，让俺一家老少吃嘛，三爷……”

“卖了，可以再置嘛。”刘猷曾一瞪眼睛，坐在太师椅子上，翘起了二郎腿。

不假，他家年年都置地，当时塔上的好地差不多都成了他的。可是咱们国汉劳动哥儿们，却越越越穷，谁还能买地！俺家要没了那十亩好地，一家的生活都成了问题，哪还有力量再置！俺父亲苦苦哀求他，他却一口咬定：“一个铜板也不能少！”最后，俺父亲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打掉了牙往自己肚子咽，卖了七亩半带青苗的好地，才算把这个窟窿堵上了。从此，俺父亲忧愁成病，再加上以后的日子不好过，没过多久就死了。

闹纠纷的这一年，由于卖了一家活命的好地，其余的孬地又没有收嘛，第二年一过年，粮食就不够吃了。一家老小只好弄点稗谷子，蒸点窝窝两手捧着吃。吃得连屎都拉不下来。后来，实在熬不下去了，就硬着头皮向刘猷曾借粮食。向地主借粮，是填不满的无底洞，不久俺就被地主拉去当短工，顶债。那时，俺虽然十八岁了，可是身子骨长的差，不管锄地还是收割，即使拼命地干，还常常落在后面。有时在地上想直直腰，喘口气，让地主看见了，非打即骂，遭的那份罪简直别提了！晚上，人家吃饭

去了，我还得给他家挑水，一挑就是十几担，肩头都压肿了。就这么着，从早忙到黑，累得夜里连炕都爬不上去，一家人的生活还过不了，只得再陆续卖地。到解放前，俺家只剩下了几亩人家都不要的碱洼地，还没有还清刘献曾的阎王债！你看，在旧社会，还有咱们老实庄稼人的活路不？

更可恶的是，地主阶级通过这次纠纷，不仅害得俺家倾家荡产，并且进一步挑撥塔上和黄龙潭两村回汉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榨取人民的血汗。俺村的人到黄龙潭那边拾柴，黄金榜就挑撥汉族群众抓住打，打完了再打官司，他向大家敛钱；黄龙潭的人到俺们这边割草，刘献曾就怂恿回民群众动手，打后再经官，钱当然由塔上回民掏腰包。就这么着，一来二去，日久天长，两村的回汉劳动人民越来越穷了；而肥了的却是两村的回汉地主！

解放后，两村的劳动人民斗倒了地主，翻了身。但是，有些人对过去两村回汉民不团结的原因还搞不太清楚，因此，有的时候还互相闹意见，吵架。一九五五年，孟村回族自治县成立后，两个村的代表在一起开了个会。在这次会议上，大家通过揭发回汉地主的罪恶，才彻底弄清了过去的团结是地主阶级挑撥造成的。俺对这件事情自然体会得更深。有人说：“天下穷人是一家，世上地主一个妈。”这句话说得对，说得好。俺家在被诬为偷干草的时候，是黄龙潭汉族老乡张顿不受汉族地主的利诱说了公

正話；俺在县城里听父亲案子的消息，也是汉族老乡帮了俺的忙。可是这场官司呢？是回族地主刘献曾“替”俺家打起来的；打官司中间，刘献曾和黄金榜是互相勾结的。结果也很明白，俺弄了个倾家荡产，全村群众也跟着花了很多钱，听说黄龙潭的群众也是这样；而两村的地主却一文也没有拿，当年刘献曾还买了二十八亩好地！地主的手段多毒，地主的心多狠！

地主阶级被打倒了，不团结的根子就挖掉了，咱们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关系。因此，现在咱们两村回汉民特别团结，有事互相帮助，往来也很密切。至于俺家的生活，随着生产的发展，也一天比一天好。去年，俺家五口人分了两千四百斤粮食；今年，俺儿子又结了婚，一家人欢欢喜喜，过着幸福的日子。这些，当然都是共产党和毛主席给带来的。但是当咱们过着幸福生活的时候，可不要忘了过去的苦，更不要忘了阶级斗争，因为这些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是不甘心死亡的，他们还可能在“民族”招牌下玩弄什么新花样。咱们要翻身不忘过去苦，永远跟党走！

吳 章记录整理

他沒有等到这一天

——小凉山彝族奴隶家史

李 乔

我的汉子布火是云南大理县人。他才有一張桌子高时，不知怎么被奴隶主搶来小凉山，当了賈巴家的娃子。

我原是四川大凉山莫西馬都家的娃子，四十年前，奴隶主把我一家人網来云南，卖给小凉山的賈巴家。我长大了，賈巴家便把我配給布火，让我们替他生小奴隶，他好出卖。

布火同我很合心，沒有几年就生下三四个孩子。眼看孩子一天比一天长大，奴隶主不知什么时候会来拉去拍卖，布火和我很担心。我們舍不得吃，把奴隶主給我們吃的火草巴巴給孩子吃。只是孩子們沒有穿的，他們一年到头，不管下雨下雪，都是赤条条的光着身子，我和布火非常心疼。

布火心思很灵，他替奴隶主干活完了的时候，便到松树林里去挖茯苓。他一看那棵松树，就知道它們根下有沒有茯苓；他靠着这本事挖得了許多茯苓，然后背到一两

百里外的汉族地区去出卖。

一天，他高高兴兴的回来了，流着汗水的臉上带着微笑。我一見他那样子，猜到他一定換得我們需要的东西了，心里也乐哈哈的，赶忙燒火做飯給他吃。孩子們几天不見他，喜欢的跑来他的身边，一个拉住他的手，一个拉住他的褲脚，亲热的向他叫：“阿达！”布火忙得来不及揩一揩臉上的汗水，就抱起孩子来向他們逗乐。

“衣海，你要不要新衣裳？”

“阿达，要。”

“补海，你呢？”

“我也要！阿达，人家笑我露着光屁股！”

“好，阿达縫給你們，让你们第一次穿一穿新衣裳。还有你媽也要縫一件，她活到这个年紀，还没有穿过新衣裳哩！”

我听着布火的話，心头甜蜜蜜的。实在，我活到这个年紀还没有穿过新衣裳，天天穿的都是奴隶主婆娘穿烂了不要的破衣裳。我多么希望穿到一件新衣裳呵！

我們那間破木板房內平常很阴冷，今天却怪温暖的。布火同孩子們正在逗玩，忽然，那扇篾笆門被推开了，一个拉着黑披毡的大汉弯着腰走了进来；孩子們一見他，生仿小鸡見到餓老鷹，吓得变了臉色，跑到我背后来躲着，不停的在发抖。布火見了他，剛才一臉的笑容不知哪里去了，忙从火塘边站了起来，恭恭敬敬的向他招呼：

“色坡，請坐。”

奴隶主賈巴烏可高傲的站在屋里，臉孔拉得很長，那烟容象滿天烏云，两只眼睛里噴出两道怒火对着我汉子，好象要把他一口吞去。我一見他，心里就发抖，知道今天他进来不会有好事。果然，他站了一会，悶声悶气的向我汉子开口問道：

“这几天，你到哪里去？”

“我一处沒有去。”布火从来不說假話，今天見了奴隶主那样子，心里有些怕，不得不撒謊。

“你一处沒有去？你媽的，你还哄我！”賈巴烏可放下臉，一陣暴風雨发作了。他走到布火的身边，从布火背来的那只篾籬里用力一拉，拉出了一匹用羊皮包着的土藍布。

“这是啥子？你一处沒有去，哪里来的？”

布火沉着臉，一句話也不說；肚子里裝滿了气憤，胸脯一起一伏的。

“我問你：这是哪里来的？你是不是偷来的？”

布火的胸膛要气炸了，只得老实的回答道：

“我挖茯苓换来的。”

“你还换得了什么？”

“別的沒有了。”

賈巴烏可不相信，在篾籬里搜了一会，搜不出什么东西，他又来搜布火的身上。这一搜，把布火藏在身上的一

个銀子搜到了，他啪的順手打了布火一个耳光。

“你說沒有，这是啥子？入你媽的，你这个死娃子心大了，你不要主子了！”

我知道这只吃人的豹子眼睛一紅，不会有好事，忙向他乞求道：

“色坡，他咋个敢这样，請你……”

賈巴烏可不做声，拿起那匹土藍布和那个銀子，气冲冲的轉身走出去。布火辛辛苦苦的挖了几天茯苓，又辛辛苦苦的背去卖了几天，想不到所得到的結果是这样，气得抱住两手在发抖。我心里又是难过，又是气愤，对布火說道：

“唉，你想弄点錢，哪里想到討了大禍啦，咋个办？”

布火糊着臉，站在屋子里：

“他要咋个，随他！”

我料到賈巴烏可拿了銀子和布匹去，不会就了事，他回头就会来泡炙布火。忙走过去推着布火：

“他是一只吃人的豹子，布火，你赶快跑！”

布火望着那几个孩子，孩子們也呆呆的盯住他。

“我咋个忍心丟下你們？我死也要同你們死在一起……”

布火的話沒說完，賈巴烏可領着两个狗腿子冲进来，拉着布火的衣領就走。我撒开腿，跟在后面求饒道：

“色坡，請你饒饒他！……”

賈巴烏可一臉的怒容，两只大褲脚蓬鬆蓬鬆的在发响，一会，轉过头来瞪了我一眼，

“饒他？媽的，他的心比老虎的还大，不曉得主子了，老子非治他一下不可！”

我当时苦苦向他求情，他也不答应。布火一句話也不說，被他們拉进牛圈里，綁住两只脚倒吊起来。他不住的掙扎，汗水象雨滴一般的落下。……

“色坡，他不敢了，請你饒饒他。”我望着布火，心里疼得要命，眼泪不觉也滾出来了。我恨不得一口咬死賈巴烏可；可是，娃子咋个能碰一下黑彝？我只得着急的向他哀求。

这个一点心肝也沒有的奴隶主，哪里管我的哀求，他被我纏得有些討厭，便把我拉出牛圈，关起門来。我靠在牛圈牆上，只听到牛圈里响起一陣嗚嗚的皮鞭声，和布火痛苦的掙扎声，我不觉打了一个冷噤，两脚站也站不穩，一跤栽倒在地上。

那可怕的皮鞭不知抽去了布火身上的多少血肉；皮鞭声响一下，我的心跳一下。我的泪水已把衣裳淋湿了，硬骨头的布火却不向奴隶主討饒。奴隶主看他这样强硬，把他的衣服剝去，抬进一籬松香来，用明子将松香燒化，松香象滾油一般滴在他的背上。哎哟，他的背脊一下紅肿起来，象一个烤熟的巴巴一般；皮肤也燙烂了，露出一层鮮紅的肉，松香仍然不停的滴下去。硬骨头的布火咬住

牙根，还是不向奴隶主討饒。

“你曉得主子，曉不得主子？”

布火一句回答也沒有，他快要气炸了，我只听到他的喘气声，掙扎声。这时，我想：你是什么主子？你不过是一只吃人的豹子，你吃了多少娃子，連骨头也不剩一根，你还要再吃我的布火。我生气的站了起来，想冲进牛圈里去，剛剛站起，眼睛一黑，便昏了过去。……

布火被吊了两天，只差一口气就要死了，奴隶主不願意让他白白死去，把他放了出來。我的天，才不过两天，布火已經被折磨得不象个人了——他的两只眼睛凹了下去，两个颧骨凸得很高，臉皮黃得象蜡一般；身上尽是一条一条的鞭痕，一个背脊烂得叫人不忍心看。孩子們一見非常害怕，赶忙縮着头躲在一边。

“我叫你跑，你为甚么不跑？你看看，还象个人？”我哭着对他抱怨。

“我舍不得孩子，舍不得你……”布火躺在地上有气无力的說。

布火的心，我知道。他实在舍不得孩子和我。但奴隶主这样毒辣，怎么生活下去？

布火的伤慢慢的好了后，他跟我悄悄的商量逃走。我說，这几个小孩怎么带走？他想不出主意来，便下决心帶着大儿子衣海先走，并答应以后想办法来接我們。我舍不得他父子二人走，但想到他們逃出去才是一条生路，便忍

着挖心割肝般的难过，让他们赶紧走。

那天晚上，我睡也睡不着；布火同衣海睡在一起，也在翻来复去。村子里的狗一会在叫，一会又静了下去。布火怕奴隶主没有睡，不敢起去。直挨到鸡叫，才背着衣海轻轻地开脱门，闪了出去。我明白他走了，也许从此一去不来了，我对他不敢说一句话，眼泪只是不停的淌。……

布火背着衣海走了后，贾巴乌可知道了，派人到处去找。我为他们父子二人担心得饭也吃不下去，水也不想喝，一天心惊胆战的。要是被找回来，他们父子二人一定是没有活下去的指望了！幸得天菩萨保佑，贾巴乌可没有把他们找到。可是，从此他对我们一家人管得很严，我们走远一步，他也不准。

日子慢腾腾的过了一年，我多少次在梦里见到布火和衣海呵！仿佛他们还在家里烤火，有时在山上砍柴，有时在山地上为奴隶主干活，一切就象过去一般。我睁开眼睛，不见他们，心里又难过得很！他们到底跑到哪里去？日子过得好不好？

一天，我正在焦急，忽然，村子里的人跑来对我说：布火和衣海被马海家抓到了！

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布火领着衣海跑到永胜县的金官镇（一个汉族聚居区）住了一年多，当帮工过日子，还可以马马虎虎的混下去。想到我们在这里受苦，父

子二人又跑了回来，躲在村子对面的那些老林里，天天在望我們，想把我們接到金官鎮去。誰知馬海家这家奴隶主到老林里去打斃子，布火和衣海就被他家看到了，他家搜去了他們身上的东西，还把他們捆起拉回去，然后带信給賈巴烏可，叫賈巴烏可拿銀子去贖。賈巴烏可回信說：“我家的娃子象麻雀一般飞出去，你家拿住，尽管打死好了，我不怪你們！”我听了这些消息，站也站不稳，身子一晃，差点就昏死过去。唉，布火呵，布火，你跑出去了为甚么又回来找死？凉山到处都有吃人的奴隶主，你提防了賈巴家，为甚么不提防馬海家？这次不单你遭殃，連年輕輕的衣海也沒好結果了！

我的眼泪不停的只是往下流。突然，馬海家带信来給我，他家不願意打死布火和衣海，叫我拿銀子去贖。我絕望的心里又有一綫希望，只要可以贖，我不管死活一定要去贖他們父子二人。我連忙到亲戚朋友家里去張罗銀子、牲口。跑了几天，算是湊合得了六个銀子，十七只羊，一口猪。馬海家已答应让我去贖。这时，我想到那只吃人的豹子——賈巴烏可，我把人贖回来，他是不是会将他們打死？我不得不去問問他。

“阿葛，你贖回来，我不打他們，仍然讓他們替我干活，你放心！”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賈巴烏可今天表現得很仁慈，一点也沒有平常的那凶惡样子。

我不放心，对他請求道：

“色坡，你說，你不打他們，你可不可以打一只雞，賭個咒？”

“有啥子不可？你拿雞來！”他說着，伸出一只大手向我要雞。

我即回家捉了一只雞給他，他拿出菜刀用刀背在雞腦殼上狠狠的砍了一下，那只雞猛然掙了一掙，便垂下腦殼。

“天菩薩，地菩薩，我不打我的娃子布火和衣海，如果我打着，給我就象这只雞一樣的死……”

他的咒賭完，我放心了。就帶着銀子，趕着羊和豬到馬海家去贖布火和衣海。

馬海家沒有刁難，解開了緊緊的勒在布火和衣海身上的繩子，讓他們同我轉回家。他們走路也不會走，由我扶着走。幾個孩子見了他們的阿達和哥哥，喜歡得眼淚也流出來了。誰料這時賈巴烏可起了黑心，不管他賭過的咒，領着兩個狗腿子，一脚踢開我家的門，拉起他父子二人走出去。

“色坡，你不是答應過不打他們，怎麼又？——”我驚惶的質問他。

他板着臉，一聲不吭，將布火和衣海拉到曠地上，抱起一個個石頭來砸他們，那樣子好象瘋了一般。那兩個狗腿子也動手幫着打，一眨眼，布火和衣海父子二人被打得頭破血流，身上穿的那套破衣服也被血染紅了。我趕

忙跑过去救他们，我的身上也挨了几个石头。我不顾一切扑在布火的身上，那两个狗腿子把我拉开，无情的石头仍象雨一般的向他们父子二人的身上砸下去。

这时，村子里有不少的百姓和娃子跑来看，有的人看了直叹气，有的人看了在淌眼泪。但谁敢劝一劝贾巴乌可？天哪，奴隶主要打死人就打死人，世间还有什么王法？天菩萨，地菩萨，你们为什么不让赌了咒的奴隶主死去？看来你们也护着奴隶主了。我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坐在地上只是哭。

奴隶主打了一阵，大概打乏了，他们回去休息了。我走过去一看，只见布火满身是血，闭了眼睛，直挺挺的躺着。衣海睡在地上手脚还在动。我赶紧把衣海背回去，然后走出来坐在布火的身边，我想他昏过去了，不忍心叫他，免得他醒来身上的那些伤太疼痛。不想，一个邻人走来摸了摸他的手脚，对我说道：

“大嫂，他已经死了，你还守着他干什么？赶快抬开烧了吧！”

“不，他还会活转来的，他身上的伤太疼了，让他静静的睡一睡。”

“他的手脚已冷了，嘴里一点气也没有，怎么还会活？大嫂，不会有望头了！你没有人帮忙，我帮你把他抬出村子去！”

我摸一摸布火的手脚，真的已冰冷了。我忍不住放

声哭了起来。两个邻人把他抬到村子外边，准备第二天背柴去烧。到了第二天，谁知布火又活转来了。賈巴烏可还不饶他，派狗腿子又来将布火拉进牛圈里。

他们怎么泡炙他，我不知道。过了一天，他们把他从牛圈里拉出来，只见他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了，他睁开眼睛望了望那几个孩子，吃力的喘着气说道：

“我……不……行……了！你们……为我……报仇！……”

说完，他就闭起眼睛，一动也不动了。尽孩子们哭喊，他也不再睁开眼睛，他带着满腔愤怒，带着一身痛苦，离开那个可怕的世界，离开那些吃人的奴隶主了！

一九五六年，小凉山解放娃子时，那些吃人的奴隶主不愿意娃子解放，反对改革，去当土匪。我的大儿子就去当民兵，后来又当解放军，天天爬高山，钻老林，打土匪，立了三等功，升为副排长。土匪消灭后，我的二儿子补海到丽江民族干训班学习，毕业回来当了大瓜坪农场场长。他的媳妇是他的同学（两人自由对象结婚），当了农场的畜牧员。三儿子克海，在解放军里当副班长。三个儿子都是共产党员，二媳妇是青年团员，现在我们一家人靠着共产党毛主席，过上好日子了，只是我的布火，他没有等到这一天……

永远跟着党

傣侬族 克 坡

我是穷苦人家的娃娃，七岁多就死了阿妈、阿爹。我做过领主家的长工，受的苦九天九夜也诉不完。现在，先嗷嗷被头人瓢者赶到荒山老林的那一段生活。

那是二十七、八年以前的事了。六月间，南糯山到处闹粮荒，两块半开（解放前云南省自制的一种银币，两个“半开”相当于一块大洋），还买不到一斤谷子。没有饭吃的人太多了，房子周围和寨子附近的多衣果、芭蕉根、苦竹笋早就摘光了！娃娃他爹砍了一挑柴，好不容易到车里街换到了几包包谷，整天哭着要吃饭的三个娃娃喜欢得像小鹿子儿一样，一个抢了一包就跑到火塘边烧着吃。

正当一家人吃着包谷的时候，头人瓢者来了。

“这个月你们家的门户钱是三块，和上个月的加在一起是六块。快送来！”

我小声地哀求他：“实在没有办法呀。再缓几天吧！”瓢者朝天看了一眼，接着对娃娃他爹说：“好吧，我先替你们垫出来，两个月后还我！”说完，就走了。

怪啦，飄者的良心为什么变好起来呢？我們的心象棉竹的根根，任撬也撬不通。我着急地对娃娃他爹說：“盐巴也不用吃啦！快把这几块钱还了，省得惹出禍来。”

“你說得对，”娃娃他爹也很願意这样做，“豹子对小鸡是不会怜悯的，應該还清。”可是那时候，积一块半开比摘一顆星星还难，两个月过去了，我們也找不到一块半开。

到了日期，飄者一搖一摆地来了，他气汹汹地說：“你們欠我的債今天合五十元，快还！还不清就給我帮工去！”他又到房后抱了我們的一口猪就象黑云一样飄走了！

“从今再也不养猪啦，养了几个都着豹子吃掉！”我气愤极了，几下就把猪厩推倒。

娃娃他爹是个老老实实的茶奴，他不吭气，把还没吃完的一包包谷放在門板上，就低着头往外走。

“你要去哪里？”

他气鼓鼓地回答說：“剛才飄者的臉色你沒有看見嗎？不去帮他們做工，那还得了！”

从这一天起，娃娃他爹就成了飄者家的长工，整天苦到晚，身体象干树枝一样瘦。一連帮了三年，才算把这冤枉債还清。

这个时期，我們的孩子已經有好大了，但个个都光着屁股，在火塘边滾来滾去。最小的那个，还不滿一岁，还吃着奶，只得放在籬筐里背着上山去做活。今天雨淋，明天日晒，生病了，一天只是哭，奶也不吃，水也不喝。当时

哪里請得起医生，娃娃就这样病死了！刚把这个娃娃安葬好，他姐姐又抖得象一只小猫。脑門头比露水还冷，嘴皮也变成了紫瓜皮。我連忙喊她爹：“娃娃又生病啦！”他爹两天沒有睡觉，已經一点精力也沒有了。他是很爱这个娃娃的，但他沒办法，只是呆呆坐着。我急了，对他說：“坐着做哪样，快去請师娘来！”他去請来了，送了鬼，娃娃的病仍然不好，愈来愈重，喘气都有些困难。我急昏了，抱起娃娃喊天喊地：“大爹啊，救救我的娃娃！大媽啊，救救我的娃娃！”象在荒山野林一样，叫死叫活也沒人答应，当天晚上，这个娃娃又死了！

我一連死了两个娃娃，眼睛哭肿了。寨里的人都怕碰着鬼，不敢跟我們說話。我們认为这些都是命中注定的，总是忍气吞声地过日子，从来不敢得罪人。

我們想躲开灾难，灾难却硬要来找我們。到年底，飄者又来要款了，他說車里土司来人啦，要收錢收粮，你家摊着十二块花錢，十挑谷子。这多的錢哪来呢，就是把我們全家的东西卖完了也不够。我只得又象以前一样哀求他：“緩几个月吧！我家剛抱了一窝小鸡，等长大了拿到街上卖了就給。”他說：“誰等得你的小鸡长大！先拿母鸡去！”我再求也沒用，他闖过房去捉鸡，把小鸡打得四处乱飞。这时娃娃他爹剛巧从地里回来，他不知道捉鸡的是头人飄者，很生气地喊：“咋个把小鸡打得滿屋乱飞！”飄者听見有人喊，走出門来，冷冷地說：“叫什么！一只鸡值

几块钱？”把鸡往房里一丢，走了。

第二天，飄者領着各寨的头人，提着刀，拿着绳子，把我們家圍住，硬說我們反抗土司，把我們的破鍋土碗、背水竹筒和其他家具打得七零八碎的，房子也拆毀了，捏着刀枪把我們赶出了寨子。

我背着娃娃，娃娃他爹挑着破烂的家具，就这样离开了半坡寨；娃娃又哭，烏鴉又叫，路上真是慘透了！我們走到挨近車里的大山上，搭了一間棚子住下來。沒有吃的，也沒有穿的和蓋的；白天我們去找野菜，晚上就圍着火塘边叹气。后来，我們开了一块山地，又割了些茅草重新修了棚子，长期在山上安家。我丈夫常常到車里去帮工，換几件人家穿破的旧衣服回来。

一家人孤孤单单地在山上住是不好受的，太阳一落，除了虫叫，靜得怕人。天还没黑，老虎、豹子就在四周嚎叫，吓得娃娃縮成一团。我們又没有火枪，无法赶走这些野兽，只有整夜燒着火，用火来防老虎。要是沒有火啊，我們一家人早就被老虎吃掉了！到了雨水天，風又大，雨又多，生活更加困难。有一次一連刮了几天大風，把我們棚子上的茅草吹走了，又是下大雨，大人小娃淋得象落水的鸡，蹲在火塘边还冷得发抖。娃娃紧紧抱着我說：“阿媽，回寨子去吧，这里又黑又冷，多害怕啊！”我也跟娃娃一样，常常想到回寨子，但只要想到头人来催款，我又宁愿在山上淋雨了。我对娃娃說：“我們沒有錢給头人，不

能回寨子啊，明年叫阿爹去捉个野鸡来，你就有伴了。”

就这样，我們在山上住了五年。我又生了一个孩子，这当然又增加了很大困难，娃娃他爹在飄者家当长工时，就患了心口疼的病，这几年在山上淋雨、踏露水，病越发加重了。我常常对他說：“少做些活啦，找些野菜吃些日子，身体好些再做。”他哪里忍心让孩子挨餓，隔不上几天就去車里帮工，換几斤米来煮稀飯。这样，他的病更重了。有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他一連去了四天，背回两斤糯米，一到家就躺在地上，身子热得象一团火。我把他帶回来的米煮了一点稀飯去喂他，他一口也吃不下，第二天就死去了。

他死了，我哭得昏死过去，哪有力气安葬啊！幸得对門山上也有一家被地主赶出来的僂侏族，他們听見我整天整夜地痛哭，連忙赶来看，才帮我把尸首埋到山后去。

沒有男人，单我們母子三个住在山上是沒法过日子的，不是冷死也要餓死，于是我又領着娃娃回到半坡寨。五年的大風大雨，又死了娃娃和丈夫，这些灾难把我折磨得不象人样了。可是，一回到寨子，头人又来耍款了，他們把我的破鍋烂碗打得粉碎，我沒有办法，任他們打，我也在寨边盖了一間小棚子住下来。沒有鍋了，只能用竹筒煮野菜吃。

过了几个月，我七岁的那个小男孩又病了，我跑了几个寨子都借不来一碗米，孩子病的很瘦，臉象干菜一样黄，整天都在小声叫喊：“阿媽，我想吃飯！”他叫一声，我的心

就象給針刺了一下。實在沒有辦法了，有一天，我向最小那個孩子說：“好好看着阿哥，別出去亂走，阿媽去一下就回來。”娃娃很聽話，靜靜地坐着。我離開寨，一口氣跑到車里，恰巧那裡的傣族正在栽秧，我給他們栽了半天，他們給我一斤米。我高興極了，回家時，一路上心想：“吃了這點飯，孩子一定會好起來啦！”我飛一樣走着，在離寨子只有幾百步的時候，聽見一個女孩子的哭聲，哭得很悲慘；我站住仔細一聽，有點象我娃娃的聲音，慌忙向家裡跑去。進家時，天呀，我的孩子已經死了，他妹妹在旁邊哭着。

我把兒子安葬後，本想去尋死，但我沒有死。我決心要把剩下的一个女兒養大，看看窮人的痛苦有沒有盡頭。

等啊，等啊，從早上盼到黃昏，從黃昏又盼到天亮，終於盼來了共產黨和毛主席。從此，窮人的痛苦結束了！毛主席派來了工作隊，幫助我們發展生產。頭人飄者見換了天地，當面再也不敢打人，暗地里却又在搗鬼，說共產黨的壞話，有一天他對我說：“克坡，你們不要聽工作隊的話，他們在不長久；漢人靠不得；只有僂僂人靠僂僂人。”我不理他，因為我知道飄者是會可憐窮人的。但我也不能接近工作隊，怕他們走後，頭人飄者又把我趕出寨子。後來，我看見工作隊的同志天天都幫我們鋤茶園，不象要走的樣子，心也就更亮了。有一天，一個年輕的工作同志到我家來玩，還送我一把鋤頭：“拿去鋤茶地去吧，共產黨要幫助僂僂人發展生產，過好生活。”我回答說：“不鋤了，

鉤了头人也不給采。”他笑了笑又說：“鉤去吧。将来所有的茶树都会是人民的！”我很奇怪，难道真的会这样嗎？几十年来我是多么希望有一丘稻田，有一块茶地啊！

在毛主席的光輝照耀下，好日子终于来到了，一九五六年自治州政府根据广大人民的迫切要求，宣布了土改的法令！土地和茶园真的要回家了！

土改刚刚开始，飄者就悄悄地到我家来：“克坡，过去的事已过去啦，你欠我的債我也不要啦，共产党讲团结，我们要一个顾一个。”他想拉住我的脚，不让我参加大家的活动。但是，解放前的痛苦已使我深深晓得了这个坏蛋的心。他的话反使我记起了以前的仇恨。我在会上痛痛快快地控诉了过去飄者对我家的压迫、剝削，以及把我们赶到山上的罪恶。人们愤怒极了，他们大声地问飄者：“这些罪恶是不是事实！”“是，是，”飄者低头承认。当时，我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啊！我们的苦根，共产党给挖掉了；我们头上的石头，共产党给掀走了！头上的大石板掀掉后，我好像更年轻起来了，我一个妇人家也敢参加站岗放哨、斗争违法的地主。在党的领导下，土改终于胜利了，我们分得了茶园、田地，大家还给我盖了一间竹楼！我过去痛苦的日子和我们的眼泪一起淌走了。共产党是我的救命恩人，要是没有党，我们全家人一定都死光了。我要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傣族岩峰记录

老貧农的話

觉 非

在新疆喀什市郊区的一排綠楊掩映下的水渠边上，我遇到了一位放水的維吾尔族老汉，他就是色滿区的人民委員、夏瑪里巴克公社前途大队的大队委員、老貧农阿不拉·伊明。他一边放着水，一边跟我讲了一席話，使我很受感动，也使我受到了一次深刻而又生动的階級教育，使我更加明确了应该怎样去爱，怎样去恨和怎样的去工作。現在，我把他讲的这一席話，都原原本本地記述下来，以便使更多的讀者也能从里面得到一些裨益：

你是从北京来的？毛主席他老人家可好啊？

去年，有个作家来，我說請他給毛主席带点瓜果去，以后他到别处去了，沒有带成。

一九五八年朱德委員长到我們这儿来，我見到了。我这一輩子，还有一件感到不足的事，就是沒有見到过毛主席。若不是共产党、毛主席，我們穷人哪能翻身、哪能有今天这样的好生活？

我常跟孩子們讲，別生活在福中就忘了过去的苦，忘了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恩情。要知道，那些反动派，巴依

(地主、老財)們是仇恨咱們的公社，仇恨咱們的社會主義，仇恨咱們翻身人民的。咱們挖掉了他們剝削人、壓迫人的老根，分回了他們剝削咱們的血汗蓋的房子和土地，又眼看着咱們一天天過上了好生活，不愁吃，不愁穿，年年還有富餘，社會主義和人民公社也越來越鞏固了，你說，他們能甘心嗎？

他們不會甘心的。所以，不光咱們要好好的干，不能放鬆警惕，也得教育子孫後代別忘了本，別放鬆警惕。

現在的孩子們都是生在福窩子裡，沒有受過舊社會的苦，衣來伸手，飯來張口；高興了就唱，不如意有時還要跟你鬧別扭，任啥不懂。這樣下去，怎能做紅色接班人呢？

去年，我那大孩子初中畢了業，我就讓他回公社來勞動了。不讓他們磨練磨練，他們又怎能體會得到咱勞動人民的甘苦？其實，這算啥苦，比起我過去強上萬倍了！

過去，我小的時候……唉！一提起過去，我就忍不住要掉眼淚。

我家兒代都是當長工的，從來沒有過自己的房子、地，都是住在巴依家的草棚子裡。

上兒代的光景，我就不大清楚了。我爹是因為我爺欠了巴依家的債，從小抵給巴依當長工，直到有了我們還在當長工。那時候，我爹當長工，我媽給巴依家裡打雜、烤饅（一種烤餅），可是我們卻沒有飯吃。從我記事起，就

跟我媽到外村去討飯。我長到八九歲，沒有穿過一件衣服、一雙鞋，沒有吃過一塊白面饅頭。到我十二歲那年，我爹感到日子實在不好過，就想佃種阿迪爾·瓦依提巴依家十畝沙碱地。可是巴依硬要每畝地十二稱子小麥（一稱子合二十市斤）。我爹咬了咬牙答應下來，尋思：萬一趕上個好年景，不就可以剩把麸皮吃嗎！巴依把卡孜（法官）找來，叫他作證給立了契，我爹給人家按了手印，這就算講定了。

那一年，我領着弟弟妹妹在大道上，追着驢屁股拾了幾個月的大糞，一家人沒日沒夜地忙了整整一年，到麥收的時候一打場，除去六稱子稅，顆粒麥子都被巴依拉走，連麥秆都折合上，還淨欠了他十二稱麥子。阿迪爾·瓦依提硬逼着我們當場就得把糧食交清了。卡孜也拍着契紙說：“契上寫的多少，你就得交多少！”

我爹說：“連麥秆都給了你們，我還到哪儿去找糧食去？”

阿迪爾·瓦依提一把把我爹的褂子領子揪住，掄起棒子就毒打了一頓。我爹難過地哭了一場，想想還是沒辦法，就丟下我們逃跑了。

我爹一跑，巴依就要抓我去抵債。我思忖着：我要是去抵債，家里還剩我媽和弟妹五口，他們怎么活命呢？我也就拔腿跑了。

那年月，哪儿有我們窮人的出路？天下老鴉一般黑。我信步跑到天黑，到了牙魯古孜卡別勒村，坐在一家門

口。当时我肚子又饿，心里又难过。想一想跑是跑出来了，以后可怎么办呢？正在这个时候，出来一个巴依——就是阿吉·阿洪。他说：“你是逃荒的？”

我说：“是。”

他把我拉起来，上下打量了一会，说：“你就在我这儿干吧，一年我给你四百斤玉米。”

在那个时候，我不干也得干了，家里还有五口人等着吃呢。

跟他说好，先借给我二百斤，剩下的一半到明年秋收才给。我把这二百斤粮食偷偷送回家去，跟我妈说：“这是一年的粮食，家里就凑合着吃吧。”

你想，二百斤粮食，娘儿五个吃，能吃得了一年吗？我妈讨着饭，再采些树叶野菜，总算对付了半年。以后，饿得实在支持不住了，才去找我。我只好硬着头皮一称子一称子地向巴依借。有一回，我妈又来了。阿吉·阿洪说：“你脖子上已经驮了我这么多债了，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说：“你就从我下余的那二百斤里面扣吧！”

没想到，这个黑了心的巴依，他把牛眼珠子一瞪：“你这个穷鬼，我什么时候拖欠过你二百斤粮食？以后，干一年给二百斤粮食，爱干不干，不干就还我的债！”

我真恨不得上去打他两个耳光子，可是又一想：“我打了他，使啥还他的债呢？”只好忍了口气，含着眼泪跟他立了契。谁知，这就是我的卖身契。从此，就象在我的脖

子上鎖了一條鎖鏈，年年向他借糧，年年減我工錢；一年套一年，一直給他干了十八年。

這十八年，我怎麼過來的呢？

我住的是他家的馬圈，吃的是麸皮饅，而且是一天才給半斤。他家的麸皮饅，是一個月才叫人烤一次，等發到我們長工手里，干硬的象石頭，我們咬不動，只好用石頭砸着吃。半斤麸皮饅，放在我們肚子里，你說能吃得飽嗎？一天餓得人眼發藍。我們實在挺不住，看着沒人的時候，跟狗搶把食吃。

你猜巴依怎麼說？他說：“這些窮鬼，就不能給他們吃飽，吃飽了肚子就不聽話了。”他把我們看得比狗還不如。養狗他還得喂飽它肚子哩。

我們三個長工，給他種着三百五十畝地，十五畝果菜園子，還經管着六匹馬、十七頭牛、十條驢、七十來隻羊，外加給他家里挑水、劈柴、打雜。天天是頂着星星起，披着星星睡，夜里還得起來挑六七趟水飲牲口。一年三百六十天，沒有個假也沒放過節。一天由早干到晚，他還常提着根鞭子監督着你；一不順心，不是打便是罵。一年之中，我們挨他的打，數都數不過數來。

現在不是有人說：“那時候，你們不會跑嗎？”

我的天！那社會，我上哪兒跑呢？我從阿迪爾·瓦依提家里跑到阿吉·阿洪家里，還不是由屎窩掉進了尿窩？況且哪兒都是人家的天下。阿吉·阿洪告訴拜格（偽保

长)、百户长、十户长說：“出了我的地界以外，你們見到我的长工就狠狠地打，打完了給我綁回来。”

在这十八年里面，我逃跑过三次，三次都是被人家打完又綁回来了。最后一次，那是我三十岁那一年。有一天夜里发洪水，把巴依的菜园子淹了。他心疼他的菜，一肚子的气恼沒处出，就把我给叫去了。进了屋，他把門鎖上，拿起鞭子把我毒打了一頓。渾身上下把我打的沒有一处好地方了。我心想：“照这样混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出头之日呢？”我又逃跑了。这一次，我是向着疏附县城（今喀什市）跑的。可是，沒等我进城，就被巴依骑着馬追上了。他又把我抽打了一頓，然后拴在馬屁股后边拖回来了。他用鞭子指着我說：“穷鬼，你想往哪儿跑？哪儿都是我們的天下。你飞上天，我拖着腿把你拉下来；你钻入地，我揪着毛盖子（头发）把你拔出来。”最后他把我交給了拜格，說：“他不是想往城里跑嗎，那就把他交給城里衙門修城牆去！”

国民党兵押着我們修城牆，只干活不給飯吃。我因为是被綁着送来的，沒有人給我送飯。一起修城牆的，都是穷苦人，即便有的有人給送飯，也是吃不飽。大家分給我一点吃，也抵不住餓。我气极了，就問国民党兵，“巴依把我送来修城牆不給飯，你們又押着不放，你是他家的狗？餓死人怎么办？”

他举起枪托把我打了一个滚，罵道：“你們这些牲口，

餓死几个算啥？死几百也就是填一个坑子！”

过去，有人說汉族来压迫我們。其实，那是胡說。你看，这不明明是巴依、卡孜、拜格和国民党連成一气，来压迫咱們穷人嗎！

我們修了二十八天的城墙。等城墙修好了我也不成人样子了。同伴們把我扶出来，他們給我媽捎了个信，才把我接回去。一病就是一个多月。

病好了以后，到了四月間，家里一顆粮食都沒有。这时候，一个叫卡迪的巴依，让我給他干十五天活，給我四十斤玉米。当我給他干到十五天头上，他反悔了。一定得叫我給他干一个月，不然，就得还他那四十斤粮食。我說：“咱們讲好的是干半个月，要再干十五天，你还得再給我四十斤玉米。”

他掀起那把山羊胡子，想了想說：“算了吧！你就再給我看一天苜蓿。”

我心想：“咱一个庄稼人，出把子力，少生点气，給他多干一天算了。”誰料想他这是一个圈套呵！

第二天清早，剛吃过飯，他就拿着根绳子来了，先在地里轉了一圈，眨了眨眼睛說：“哎呀，我这苜蓿丢了！”

我說：“这哪有的事！你看，整整齐齐，一点也沒有丢。”

他忽然把臉一变，嚷道：“你这賊娃子，明明偷了我的苜蓿，还說沒有丢？”說着就把我倒背着手綁起来，吊在一

棵樹上就走了。

把我痛的呵，暈過去又醒過來，醒過來再暈過去，一直到傍黑的時候，托合特、烏斯滿他們從地里回來路過看見，才用砍土鋤（鋤頭）把繩子砍斷把我放下來。他一看，我這兩只胳膊腫的，把繩子都給包在里面了，他就哭起來了：“巴依太欺負人了，幾時咱們窮人才能報這個仇呵！”

司馬意·西拉木大爺氣憤地指着年輕人說：“你們都來看看，巴依就是這樣壓迫咱們的。我們這輩子報不了仇，將來你們也要記住報仇。”

他們把我背回家，我媽一定要扶着我去找拜格告狀。那個時代，拜格和巴依是穿一條褲子的，哪兒有我們講理的地方？

拜格听了，不問青紅皂白，硬說我們是說謊，拿了巴依四十斤糧食還偷人家的首蓓，吩咐狗腿子就打。我忍着痛起來就跑掉了。可是，他們把我媽給抓住了，讓她賠巴依首蓓。我媽說：“我兒子給他苦了十五天，還不夠嗎？”

拜格吓唬說：“你再說就打死你！有錢就賠，沒有錢就扒你的衣服！”

狀沒有告成，挨了吊、挨了打，我媽的衣服還被扒去了。

我恨的起了誓：從此，再不登巴依們的地邊。

那時候，我已經結了婚。我岳母在烏魯木齊。我老

婆給她捎了個信，叫她想神法也得給我們捎點錢來。後來果真把錢給捎來了。我們買了幾隻羊，也搬到一個窮鄉親賽買提·克里木家裏去住了。我老婆放着羊，我給人家幫幫工，慢慢地竟發展到了十五隻羊，眼看着日子也就能湊合着過了。這回，總該可以躲的開那些巴依們了吧？嘿，不行！你躲他，他不躲你。

有一天，吐迪巴依——就是把我爹被逼跑了的那個阿迪爾·瓦依提的女婿，派人來找我五次，說是他們巴依“請”我。我心里捉摸：“狼披上羊皮還是狼。他請我，能有好事嗎？”我不去。後來，他自己來了。我說：“我不欠你的糧，不欠你的錢，找我干啥？”

他嘻皮笑臉地說：“哎！別誤會。以前咱們挺好嘛，走，到我家里去坐坐。”

他連拉帶扯地把我推到他家里。進屋一看，拜格、百戶長、十戶長、卡孜都在那兒，抓飯也早擺好了，看樣子是專等着我開飯哩。我一看這架勢，是一定有事呵。炕我也沒有上，就說了：“你們找我有啥事，就干脆說吧！”

拜格嘿嘿地笑着拿出了一張紙，他們給我念了念——那是用我的名義寫的，大體的意思是：我願租種吐迪巴依十二畝果園（只有幾棵沙棗樹，都是沙碱地），議定年終交二十口袋、即四千斤小麥，如交不出，情願受法律制裁。我一聽，就火了。這不是成心想要我那十五隻羊嗎？我說：“我起過誓，再不登你們巴依家的地邊。”說

完我甩袖子就走了。

唉！胳膊終究擰不过大腿去。三天以后，拜格还是硬逼着我接受下来了。那时候早已經過了播种的季节，我只好强种上了晚玉米。但到秋收的时节，玉米沒有熟，我交不起租子。于是，巴依帶着狗腿子，杀气騰騰地赶到我家，把我那十五只羊搶去了不算，把我的东西全扔出屋，临走还把我那四岁的孩子从炕上拎着一条腿摔到街上。我跑出去抱起孩子一看，脑袋已經摔出了血。我憤恨地說：“事情不要做絕，以后也許有我們說話的时候！”

可怜我那孩子，几天以后就死了！

那个社会，就是个吃人的社会。为了錢，啥丧尽天良的事他們都干得出。穷人好比掉进了油鍋里，任他們煎油、吸髓。可是呵，他們万沒有想到，他們的目头也有落的时候。

以后共产党、解放軍就真的来了。我們的太阳升起来了，我們穷人說話的时候真到了。把我高兴的，簡直就想唱、想跳。后来工作组到了苦木台，我跑去跟他們說：“你們可来啦！我向你們道一万声謝謝。我什么都不要，只要让我跟你干就行！”当时有个伍部长，他說：“老大爷，你就帮我們工作吧！”

到开群众大会的时候，过去那些巴依、拜格、百戶长、十戶长……都在路上等着我，跟我悄悄地說：“过去你說的話真灵驗了。以前怪我們无知，叫你受了苦，別記我

們……”我一眼也沒有看他們，揚長就去開會。我心里那個痛快呵，就別提了。感到揚眉吐氣！

土改把那些反動派、巴依都打倒了，給咱們窮人弟兄報了大仇。

後來，工作組在苦木台給我分回了六畝地、兩間房子。我說：“我有言在先，啥也不要。只要看着咱們窮人翻了身，我就高興。”可是那個伍部長，最後背着我在色滿還是給我分了。他說：“這是在黨的領導下咱們農民進行土地改革鬥爭的勝利果實，你就收下吧！以後好好搞生產，把咱新中國建設好就對啦！”

我一想：“這話也對。這是共產黨和毛主席的恩情嘛！”

到搬家的時候，他們都敲鑼打鼓來接我們。這時我老婆激動得哭起來了。

我說：“這是咱們窮人的大喜事，哭啥呢？走！”我們就這樣高高兴兴地搬進了新房子。

到一九五六年，合作社修水渠，正好挨到我那房子。他們跟我商量，我說：“行！這本來就是在共產黨領導下才分得的，用在咱們社會主義建設上還能不行？”

他們說：“也不能讓你白交出來，給你一千塊錢，你再去蓋兩間。”

我一聽，吓了一跳。怎麼一張口就給一千塊？我說：“不用浪費，有二百塊錢就足夠了。”

以后有人在背后跟我說：“你怎么这样傻？你把一千块钱要下来，不会留以后花！”

你說，我这是傻？公家的錢，不就是咱們自己的錢嘛！好比我放的这水，大渠里有了水，小渠里才能常滿；社会主义要建設不成，你个人有几个錢也是沒用；如果跌回到旧社会的道上去，不是你剝削人，就是人家剝削你。我們不能再走那条道，决不能忘記过去！

現在，你看看，我們这人民公社建設的，……哎，你到村里看看，都是象我家一样的一色新房；除了口粮以外，一年拿个二百元左右的人家还算是平常的哩。我跟我儿子說：“你就照着共产党、毛主席指引的道走，把咱們人民公社、社会主义建設得好好的！”

春風吹拂換人間

華羅庚

我非常愛聽侯寶林同志說的相聲《昨天》。它描寫了一個在舊社會中受盡折磨、失去知覺的精神病患者，經過治療，在解放後十年突然醒來，舊社會的一切慘況猶如昨日；在接觸到新事物時，覺得樣樣好——好到了不可思議，件件奇——奇到了出人意料。實際講來，這種體會，在新中國，人皆有之；只不過我們看見的是連續變化的“電影”，而相聲中的主人翁所看的是影片中兩個分隔較久的“鏡頭”而已。

* * *

想到了四十年代的前半葉，在昆明城外二十里的一個小村莊里，全家住在兩間小廂樓（還沒有現在我的辦公室大）里，食于斯，寢于斯，讀書于斯，做研究于斯。晚上一燈如豆——所謂燈，乃是一個破香煙罐子，放上一個油盞，摘些破棉花做燈芯；為了節省菜油，芯子捻得小小的。晚上牛擦痒，擦得地動山搖，危樓欲倒，豬馬同圈，馬誤踩豬身，發出尖叫，而我則與之同作息。那時，我的身份

是清高教授。嗚呼！清則有之，清者清湯之清；而高則未也，高者，高而不危之高也。

在这样的环境中，埋头讀書，苦心钻研，偶有所得，便怡然自乐，自以为与世无爭也！哪知却有那不辞道远，甘冒髒臭而来的朋友，說是非，讲长短，我辛苦研究的成果反而成为生气包。挑撥者不是說这人怎样鄙薄你的成果，便是說那人怎样譏諷你的研究。兴辞而去之后，留下憎恨，为之不欢者竟夕。老实說，我那时恨透了这种口是心非，当面捧，背后罵的知識分子。解放后才开始知道，应当詛咒的是旧社会，而不是个人。

正是：寄旅昆明日，金甌半缺时，狐虎滿街走，鷹鷂扑地飞。

* * *

把镜头移到四十年代的后半叶，到了美国。生活是有所改善了，但是社会关系却是道道地地的买卖关系。金錢第一，什么第二，我却說不上来。歧視黑人，固为人所共知，但黄人、犹太人、希腊人、意大利人，也都在被歧視之列。上鋪子去买条褲子，店員拿出粗貨，当你請他拿細料的时候，他会悻悻然地对你說：你們黄人穿这种料子正合适，在洗衣作里耐磨經穿。是的，在他們心目中的黄人，不是洗衣作的佣工，就是中国飯鋪的廚師。这是美国恩賜給黄人們的两条活路。

人老珠黄不值錢，教授也不例外。老教授的下場也

是老境淒涼，拿些極為菲薄的退休金，出賣藏書，孤苦伶仃地度日。不要說學生，早如路人；就是兒女也不常來看你，如果你要去看他們，還得請帶飯錢來。師生關係當然也是買賣關係，入學就為將本求利而來的。現在說來可羞，我那時也在这染缸中掙扎，對學生，來者不拒，花上十分、二十分鐘的時間，點他兩點，使他得些便宜，販些貨品而去；不來者，不追不逼，維持個“買賣不成仁義在”。對學生的成績更是好話多說，缺點少言，一來學生高興，二來也為自己爭光。

正是：資本制度已斜陽，走入昏黃，為了金洋，哪管親娘。

* * *

今天，我且不說人民生活的好轉，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最值得注意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了：既不是封建主義式的從屬關係，又不是資本主義式的金錢關係，而真是一個互相關心、互相促進的平等關係。文人相輕自古已然，于今不確了，人與人之間相重起來了。當然，我說的相重，不是無原則的互相吹噓，而是開始以社會主義原則相互要求，相互鼓勵，肯定成績，指出缺點，實事求是，有啥說啥的風氣。去年我去廣州，就深得切磋琢磨之益，在學術會議上，講詞講稿一處不明，就大家提出討論，共同研究。

毛主席的“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后”的名言，

“必須善于学习”的指示，都已深入人心，成为風尚。即以我这个从不虛心的粗人來說，也开始多方求教了！最令人感动的是：不管識与不識，同行与不同行，問无不答，求无不应，誨人不倦，有时还送貨上門，移樽就教呢！我受了益，当然感謝他們。而更感激的是党、是毛主席創造了这样的好条件，使人与人之间肯无保留地交流學問，比比以往“不談學問談天气，閑話他人是与非”的情况，其相距岂啻霄壤！

讲到学生，讲到年輕人，更是一番新气象。政治热情之高，学习勁头之足，固不必說，而且往往推着老師們前进。五年前，一年級的新生給我提了个終身受用不尽的意見，他們建議我：老师，你能不能再多讲些“怎样想出来的过程”。这个意見好。如果已有的发明創造，我們还不能設想出他們所以能获得这发明創造的过程，我們还能有什么自己发明、自己創造的可能性呢？这一問題五年来一直貫穿在我的讲课之中，在我的学习之中。更具体的例子是：我对蒙脫卡罗方法的一知半解，就是在年輕人帮助之下学来的。真是“多年师生成兄弟，共同学习共钻研”，这样的例子是說不完的。同學們、青年們愈关心我，我的勁头也就愈高，愈想把所有的虽然很少的知識都又快又好地教給他們，这和“沒奈何教书为吃飯”，如果不留一手則“教会了徒弟，气(餓)死了师父”的旧社会比，其相去岂止十万八千里了！

劳动成果之被重视更不必说，今年出版有我劳动在内的有七卷书；这些书都是解放后开始写作的，这是我一生收获最丰富的一年。为中學生写了兩本，为大学生写了兩册，为搞数学及用数学的写了一卷，专门著作一部，連我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数学百科全书所写的一册都翻译出来了。这些成绩当然不是我个人的，有些是和青年們合作写的。更重要的是，我获得了几十个青年的帮助，其中包括其他院校同志的帮助，这样大的帮助是旧社会中能梦想得到的嗎？不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党组织的帮助能如此嗎？不仅如此，組織上还經常地关心我鼓励我：写出来！拿出来！这增加了我的勇气，提高了我的工作积极性。出版社登門組稿，細心加工、排印、校对、发行，这都是旧社会不可能有的。回忆旧社会，写书时没人帮助。写好后沒处出版，在輾轉拜求出版的过程中，有时还搞了个原稿不知去向；出版后还說不定来个“文人相輕”，书不看，嘮一撇，讲上几句挖苦話。新社会情况大不相同了。解放后，我出版过几本书，写得当然很不好，但大家总是鼓励我，更宝贵的是收到了不少宝贵意見，从个别的錯字，到論证的錯誤，都給我寄来。这种与人为善的精神，使我深深感动，使我更加感受到新社会的温暖，干劲更足，更想把一絲絲的力，一滴滴的汗都貢獻給社会主义事业。

* * *

真的，感受实在太多。如果把镜头更撥前些，看看二十年代，那正是我应当受教育的年月；但一个“穷”字，剝夺掉我的梦想；在西北風口，擦着清水鼻涕，一双草鞋一支烟，一卷灯草一根針地为了活命而掙扎，这怎能不羡慕生长在毛澤东时代的青年呢？

当然与工人农民的血泪史比起来，这是算不了什么的，这仅仅有些酸辛而已。但忆苦知甜，聞香識臭，使我自己知所奋发，使我自己更坚定地听党的話，更坚定地跟着毛主席走，永远和青年人共同提高，为社会主义鞠躬尽瘁，学到老，干到老，一息尚存，此志不渝。

十四年来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彻底变了样。在光明里想想黑暗，在春風里想想严冬，就更会对未来充满信心。现在还仅仅是开始，东方的太阳刚刚升起来，射出万丈光芒，照亮了我們的灿烂前程，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个乡村教师的遭遇

上海市青浦县赵屯人民公社 叶泮芹
南 勛 小 学 教 师

我今年六十二岁，屈指一算，已经整整做了四十一年
的乡村小学教师了。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我深深感到：
旧社会乡村教师的生活比黄连还苦，新社会乡村教师的
生活比蜂蜜还甜。

我是在一九二二年从一所速成师范学校——青浦师
范讲习所毕业的。当时，中国的社会正处在所谓“国事日
非”的年代，社会上有些人在高唱所谓“教育救国”的论
调，反动统治当局也口口声声说什么要“普及义务教育”，
而小学师资又很缺少。因此，刚从学校里毕业的时候，我
满以为找个乡村小学教师的职位是不成问题的；在学校
当局把毕业生名单抄送给伪青浦县教育局之后，我就一
直在家等候聘书。可是，等呀，等呀，一直等到八月底，眼
看人家都在忙着准备开学了，我还是没有等着聘书。这
是怎么回事呢？我心慌了，就到老教师那里去打听。一
打听，才知道聘书是不会自动送上门来的，得自己托人去
说情；照我这样呆在家里等，一辈子也不会有人来聘请。

听了老教师的话，我心里非常气愤。可是，为了实现我那“挽救国运，复兴民族”的抱负，同时也为了解决全家的吃饭问题，只得低声下气地求人。后来总算找到一个介绍人，替我去向一个姓沈的伪“教育委员”说情。“礼”在“人情”在；说“情”是名，要“财礼”是实。但是，自从我的父兄相继去世以后，我家真是一贫如洗，全靠母亲替人家做针线、洗衣服得到的几个钱过日子。哪里有钱送礼呢？还是母亲想出了一个主意。她指着家里仅有的那只下蛋的老母鸡，说：“这样吧，就把这只鸡送掉吧。”我看看这只正在下蛋的母鸡，心里有些舍不得。可是，介绍人却说：“送礼要凑双，单单一只鸡，‘教育委员’怕不会收吧！”怎么，一只母鸡还不够？母亲听了，无可奈何地对我说：“好吧，王家婆婆已经答应借给我们三块银洋，说等你领到第一次薪水就归还。我本来是打算替你买只面盆、买双套鞋的。既然要送礼，我就去借来先买点礼物再说吧。……”说着，她就出去借钱。等拿到钱，我就去买了四瓶高粱酒，连母鸡一起交给了介绍人。

旧社会真是“钱能通神”啊！四瓶高粱酒、一只老母鸡，终于换来了一张“苦缺”的聘书。事后介绍人说，这份“礼”太薄了，要不还可能弄到个“中缺”哩。什么叫“苦缺”、“中缺”呢？原来，当时伪青浦县教育局所辖各校，分三等。一等学校设在镇上，学校大，学生多，学费收得齐；在这种学校里教书，算是“肥缺”。要弄到个“肥缺”，不但

要財礼多，而且要有靠山。二等学校虽然設在乡村里，但是村庄大，学生也还算多，学費也容易收得齐；在这种学校里教书，就叫做“中缺”。“中缺”也要有靠山，不过，財礼多送一点，沒有靠山也有可能得到。三等学校設在比較偏僻的乡村，規模小，学生少，学費也难收齐；在这种学校里教书，就是“苦缺”。沒有靠山，財礼又不丰富的，就只能到这种学校里去教书。“苦缺”虽然苦，但是，对我这个一无錢財、二无靠山的穷学生來說，当时能弄到这样一个职位，已經喜出望外了。我想，只要自己勤勤恳恳地教书，这只“飯碗”总能保牢的。再說，“教育救国”嘛，在偏僻的乡村教书，不也同样是“救国”嗎？

哪知道，这只“飯碗”并不牢靠，“教育救国”也只是反动統治階級騙人的幌子。那时候，反动統治当局借办“义务教育”之名，在田賦上搜刮了一笔附加費。可是，这笔經費並沒有真正花在办学校上，而是大部分进了官吏們的腰包。我初当小学教师的时候，月薪很低，每年只发十个月的薪，而且，发薪还没有定期。这还不算。那些伪“教育局长”、“督学”、“委員”們，每逢暑假、寒假，总要乘机把教师調动一下，捞一票財礼。因此，我們这些沒有靠山的穷教师，每逢假期，总是忧心忡忡，天天伸长头頸盼聘书；而你要得到聘书，还是多少得送点礼。我因为財礼送得少，从当小学教师起，八年內先后調了七个学校，最后調到現在的南助小学。由于这里位于昆山和青浦交界

的地方，离县城较远，交通也不方便，稍稍有点办法的人都不愿到这里来当教师，这样，我才得在这里耽下来。

穷教师最怕生病。一九三〇年下半年，我在黄渡三官堂小学教书的时候，生了一场病，几乎送了命。起初，我得的是疟疾，三天两头发冷发热。由于这个小学只有我一个教师，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伪县教育局，请求他们派一个代课教师来代我上几天课。哪知道，这封信寄出后，就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我抱病坚持了一个星期之后，实在支撑不住了，就卧倒在一所孤庙里。看庙的老人虽然同情我，常常来给我一点汤水喝。可是，毛病不医，怎么会好呢？又拖了两个星期，病不但不见好，反而更重了，整天昏迷不醒，汤水不入。庙董——一个姓张的地主知道了，怕我死在庙里，要连累他，就叫看庙老人雇了一条小船，连夜送我回到青浦家里。母亲事前一点也不知道，突然见我病成这样，泪如雨下，接着就赶快去借钱请医生。

事真凑巧。在我离校的第二天，伪青浦县教育局的“教育委员”刚好到三官堂小学来“视察”；名说是来“视察”，实则想来敲榨。当时，我生病回家，学校里没有人接待他，他扑了一个空，心中大为恼火。他要离校时，正好有群小学生来校。他就问起我，学生们说：先生生病，看庙老公公送他回家去了。这个“教育委员”回到局里，大发雷霆，随即叫人给我送来一张条子。条子上写着：“三官堂小学停课，着即请代前往复课，否则停职处分。”这时

我病得神志不清，母亲只得拿了条子叫人去看。她吓坏了，赶到局里去向伪“教育委员”恳求，说：“我们实在没处请到代课先生，还是局里去请罢。”谁知他神气活现地说：“一个村角落里的小学，也要局里找代课先生，局里哪里来这许多代课先生？”经我母亲苦苦哀求，他才答应宽限一个星期，说一星期内必须有人去复课。天哪！叫我们到哪里去请代课先生？我的病又这样重，怎能去呢？我病了二十多天，病势渐渐好转，勉强能起床了。伪“教育委员”连连催逼，不得已，我只得抱病返校复课。病后头晕眼花，瘦得皮包骨头。人家都说应当休养调理。我拿什么来调理呢？六十开外的老母亲，为了替我付医药费，把自己的棉衣送进了“长生库”（当铺）。这时已是十月天气，我母亲的寒衣还没法贖回来。而且，我又受到伪教育局“申斥罚俸一月”的处分。当时，我真有生不如死之感啊！为了活命，我只得挺下去。挺呀挺呀，好容易挺到寒假。

抗日战争胜利了。我想，生活也许会变好些。谁知道，国民党反动派只知压榨人民，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物价就一日数跳。我们小学教师发薪日期是不规定的。伪县政府财政科把款子扣发了一段时期再拨到教育科，教育科又瞞着教师，拿我们的血汗钱去做投机生意。过了几天，物价又上涨了，他们才把货物脱手，通知我们去领薪。我们领到的钞票，虽然票面数字依旧，然币值已非。记得在解放前夕，有一次发薪的时

候，我正臥病在床，隔了兩天去領薪時，一個月的薪金只能買幾包香煙了。

一九四九年五月，一聲炮響，青浦解放了。我們小學教師和廣大勞動人民一樣，政治上、經濟上都翻了身。過去被稱為“坐冷板凳”的“教書匠”、“孩子王”，變成了人民教師，受到了社會上的普遍尊敬。生活不但安定，而且逐步有了提高。生了病，不用說有人會替你代課，還享受公費醫療的待遇。一九五五年，我左手患嚴重的關節炎，不能動彈。領導上曉得後，馬上來慰問，還送我到医院去治療。醫師和護士都熱心地為我治理，服藥、打針、電療，連續二十多天，終於把病治好，醫藥費全部報銷。

想想當年我在三官堂小學教書時生病的遭遇，看看今天黨和政府對我的百般關懷，我真感動得熱淚盈眶。黨啊，親愛的黨，要不是你，我哪能有今天啊！

我已經年逾花甲了。如果在舊社會，象我這樣年紀的早就被一脚踢開了。可是，如今在新社會，黨和人民不但不以為老，反而給了我更大的信任和尊敬。在一九五六年，我被評選為江蘇省優秀教師，光榮地出席了在南京召開的省優秀教師代表會議。青浦縣劃歸上海市領導以後，一九六〇年，我又被評選為青浦縣文教先進工作者，出席了上海市文教群英大會。這年暑假，市教育局和市教育工會又讓我到江西廬山休養所去休養。從一九五六年到現在，我連續四次被選為青浦縣人民代表、人民委

員会委員。在旧社会里被人瞧不起的“坐冷板凳”的乡村教师，今天居然也能和县的领导同志一起管理起国家大事来。这是多么叫人高兴啊！

最叫我感到高兴的，是我亲眼看到了新中国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看到了我自己的劳动成果。解放前，我們南助小学只有一个班、三十二个学生；現在，却已經发展到三个班、一百二十个学生。解放后，我們学校里出来的学生，大多数活跃在农业第一綫上，有的已当上了公社和生产队的干部；有的在祖国边疆从事社会主义建設事业；有的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了捍卫祖国的战士。他們中間，有的已經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有的参加了共青团，有的被評选为先进生产（工作）者、五好战士。每当接到他們的信，每当他們来訪問我的时候，我心中的快乐和安慰，真是难以言傳！

我已經整整做了四十一年乡村小学教师。可是，只是解放后，我才体会到做一个乡村小学教师的光荣和幸福。我虽然头发斑白了，但是，我并不感到自己老，相反的，感到自己更年輕了。我决心在党的领导下，在党的教育工作的方針的指引下，和同志們手携着手，肩并着肩，前进，再前进！

苦难的回忆

长春市京剧团演员 李筠秋

童年，誰还没有个童年呢！可是我的童年和今天的孩子们比较起来，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啊！每当清晨起来练功，看到我们团里的小学员在老师的亲切教导下，踢腿、下腰、吊嗓，都不由引起我对今天孩子们的羡慕，对自己童年苦难的回忆。

第一次出卖

我虽然赶上了个旧社会的尾巴，比这些孩子们仅仅早出生了二十几年，却也尝尽了那人类的辛酸滋味。人们常说：天亮之前最黑。我小的时候，正是敌伪统治最残酷的年代。那时我家住在河南开封，父亲在南徐州邮局当小职员，爷爷领着我們母女五个人在一起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我六岁那年，河南連年鬧災荒，人們实在活不下去了。为了活命，爷爷把我們姊妹几个又送到父亲那里。災荒之年，那些象狼一样的粮商富戶，又趁火打劫。穷

人一步一个坎。不久，父亲被裁职了，生活就更加艰难。父亲看我们姊妹几个顶数我长的机灵，便一狠心把我卖给一家姓李的当丫头。

六岁的孩子能知道什么呢？真是“买来的女，使唤的腿”，离开亲娘落到后娘手里，我真是哭不敢哭，乐不敢乐，看见人家孩子玩，我只有在一边掉眼泪。整天象个避猫鼠，人家吭一声，就把我吓得直哆嗦，总是看着人家眼色行事。一天爹妈叫个不离嘴，还是非打即骂，一有不顺心的事就拿我撒气，身上的伤一块连一块。有一次，我忙活一天没住脚，刚在外屋站着歇歇腿，李家的老太婆在屋里喊我，我动作稍慢了些。她便从炕底下抽出一块劈柴片子，一下子砍在我的头上。血立时淌了下来，我喊声妈，就啥也不知道了。醒过来时，我捂着脑袋暗暗地喊着亲娘：“有钱人的心怎么这样狠，娘啊，你怎么不来救救我呀。”那时真是呼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谁能可怜可怜这孤苦的孩子呢！头肿的象柳罐斗，一连几天吃不进一点东西，李家怕我死掉白花了钱，才给我买了点药治治伤口。直到现在，一阴天下雨，我脑袋上的伤疤还发痒。所以我始终记着：“我们这一代人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啊！”

二次被卖

我九岁那年，李家看我没多大用处，又把我卖给一家

姓吕的做童养媳。吕家是唱京戏的艺人，看我模样长的不错，干起活来也灵巧，把我买到他家，一方面是给他家做零活，一方面让我跟他们学戏，将来会唱戏了，好变成他家的“摇钱树”。因此，对我练功、学戏也就下了一番功夫。打戏，打戏，我是个啥也不懂的孩子，刚学戏，腿、脚、身子都硬，可是稍错一步，就是一顿鞭子，还不准你哭。一天不知挨了多少打，身上总是带着伤痕。卖身契象个捆身索，我连个出大气的自由都没有。每天当全家人还没有起来的时候，我就得悄悄地爬起来，练功、吊嗓、倒便盆、收拾屋子。别人都起来以后，伺候人家吃饭、哄孩子、洗衣服、跑街。晚上公婆唱戏回来，再伺候他们吃饭、洗脸。一切活都干完了，别人都睡了，我才能去睡觉。我受不了折磨而想妈妈时，还得找个背人的地方偷偷地哭；不然，被人看见又得挨打。有一次，我挨打后，躺在被窝里偷偷地哭，在梦中看见了自己的妈妈，就哭出声来了。婆婆发觉后就一顿狠打，打的我懵头转向，钻到床底下不敢出来。我是河南人，学唱时，总不免带点河南味儿。一次我刚一张嘴唱，婆婆听到后，就用两根筷子插到我的嘴里，夹住我的舌头狠劲搅起来，一边搅一边说：“死丫头，我把你的舌头搅烂了，看你能不能改这河南味儿。”舌头被搅的真象掉了一样，鲜血从嘴里直往外淌，好几天连饭都不敢吃。那时候我真想死，死了离开这罪恶的世界总比活受罪强。在我十四岁那年，正式登台演戏，心里想：这回给他们挣

了錢，還了債，我總該有個出頭之日了吧！誰曾想掙了多少錢也填不滿這個無底坑。一個十四歲的孩子，身子骨又被他們折磨得瘦弱不堪，那次主演的戲又是《梁紅玉》，我身上扎着軟靠，“涮腰子”用力過猛，一下子沒站住就摔在台上了。狠毒的公公像餓狼似的，在我的後肩膀上，狠狠的咬了一口，當時痛的我從二樓的樓梯口，一直滾到樓底下，血把兩層衣服都濕透了。搭班演戲的師傅看我實在可憐，抹着眼淚把我扶起來說：“孩子爭口氣吧！”當時我想，離開這個家，也許就好了。豈不知天下烏鴉一般黑，那個社會把唱戲的藝人叫“戲子”，看成是“下九流”，到處受欺負，受壓迫，簡直就不把你當人看。到哪演出得先請客送禮，到處拜客，一處沒拜好就休想演戲。有些地方官吏和流氓、地痞，當面調戲侮辱你，也不敢出個大氣。有一次，我隨戲班到常德去演出，下車後還沒來及喘氣，就到處去拜客，送戲票。可是，因為忘記給國民黨某營送票，被砸了園子。

母女對面不相逢

離開親娘的孩子，遭到這樣的苦難，誰不想媽媽呢？七八年的時間，我眼淚不知流了多少。十五歲那年我們來到了開封演戲。知道已經來到媽媽的身邊，我簡直什麼也干不下去了，心急的象熱鍋上的螞蟻，可又不敢說。因

为我明知道，說了又得挨頓毒打，反而更看不成了。后来我偷偷地哀求看我练功的尹老师；他看我实在可怜，一狠心就答应了。但他对我說：“我帶你去，只許你看一眼，不許說一句話。”这是多么无情啊！但在我來說，已經知足了。总比近在身边看不見强啊。

在一个清早，借着“吊嗓子”的机会，尹老师偷偷地領我奔我們家走去。我就象个剛出籠的小鳥，但又被一条綫牵着往家走。到了我記憶里还殘留着的、梦里不知走过几次的家門口，我心跳的厉害。师傅假借找某某人叫开了門，出来開門的正是我的亲姐姐。我两眼直勾勾地看着她，嘴張了几張，也沒敢叫一声姐姐。可是她沒看出这賣出家門、一別八年的苦妹子，只說：“沒这个人，你找錯門了。”

“沒錯呀！狠心的姐姐你怎不认我啊！”我含着泪望着她那張忧愁的臉，心里翻騰着这句话。隔着門我望見了媽媽正坐在炕上。苦难的日月，使她的头发变白了。我当时是那么緊張，心里說不出什么滋味，我站在那里連动都动不了一下，泪順着臉往下流，咬着牙不敢哭出声来。我恨不能一下迈进門去，趴到媽媽的怀里大哭一場，可我沒有这个自由。還沒来得及看上第二眼，师傅就拉起我的胳膊，叫我快走，門也就格登一下关上了。我的心就象插进一把刀子，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苦命的媽媽万万也沒有想到亲生的女儿会在門外看她一眼。万恶的旧社

会，就是这样残酷无情，母女对面不能相逢。我不知道我当时是怎么走回来的。后来公公可能从情緒上看出来了，演出合同还没有到期，就忙着带着戏班到另一个地方去了。从那以后，狠毒的公公常常威胁着我說：“你想走啊，想走也不能叫你囫圇着走，不打折了你的腿，也打断了你的胳膊，殘廢了看你还走不走！”

党 救 了 我

一九四五年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反动派，又发动了内战，艺人们仍然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我随着吕家到各地流动演出，给他们挣钱。一九四九年秋天，我们正在宜昌演出，宜昌解放了。因为我当时已经是个主角了，吕家看我是块肉，想带我往当时未解放的重庆跑。没等实现，这个戏班就在部队领导的动员和教育下全部参军了，变成一支部队文工团。从此，我算脱离了苦海，获得了新生。参加部队不久，吕家还是想尽各种办法，叫我退出剧团，继续为他们卖命。部队的领导和同志们，关心我们都象关心自己的孩子一样。尽管当时还是供给制，生活水平比较低，我也不愿意离开这温暖的革命大家庭。后来在部队首长和同志们的教育帮助下，我的觉悟逐步地提高了，懂得了十四年的生离死别，都是旧社会的不合理制度所造成的。

一九五一年的夏天，我在組織的幫助下，正式和呂家脫離了關係，得到了完全的自由，並恢復了“李筠秋”這個名字。沒有共產黨，我這無邊的苦難哪能結束呢！不久組織上給了我二十六天探親假，我回到了開封老家，一家人在黨的陽光照耀下團聚了。媽媽一邊流著淚一邊說：“沒有黨和毛主席，我的姑娘一輩子也不會回來！”親戚朋友們，也都象辦喜事一樣來看我，所有的人那個高興勁，我就是用三張嘴也形容不出來。回家後我才知道，父親被生活所迫，在我第二次被賣不久，也去給別人家頂勞工去了。由於過度的勞累和精神上的痛苦，不久就死了。家裡只有母親、哥哥、姐姐、弟弟，但是他們生活得很好。哥哥、姐姐、弟弟都有了工作。我想若是不解放，這孤兒寡母，就是要飯也找不上門。現在，我還常常接到媽媽的來信，她老人家總是告訴我：“要好好工作，聽黨的話，我今天的幸福，是共產黨和毛主席給的，孩子，千萬不能忘本哪！”媽媽說的很對，黨不僅給了我幸福生活，更主要的是給了我新的生命。演戲再不是為了個人名利，而是為革命為人民服務。在黨的教育下，我成了一名光榮的共產黨員。今後只有老老實實地聽黨的話，堅決貫徹黨的藝術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把我整個一生，獻給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

陳英杰整理

科学工作者的苦和甜

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副所长 黄耀曾

一九三四年，我快大学毕业了，心情很矛盾。一方面，想到大学毕业了，可以做一番事业，不禁感到意气轩昂；另一方面，那时的社会，“毕业即失业”，不禁感到前途茫茫。毕业时总算幸运，凑巧指导我做毕业论文的庄长恭老师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所长。由他介绍，我进入中央研究院。心想，只要自己努力，就可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做一番事业了。

誰知跨进中央研究院大门以后，就不得不对我那原先的“做一番事业”的想法怀疑起来。研究院的人员、经费都紧得要命，有些研究工作根本无法开展。当时我担任的是有机微量分析和有机合成研究。根据实践经验和按照国外文献报道，夏天做微量分析，室内应该用冷气机降温，否则往往得不到可靠的结果。可是，我们的实验室内，却连一架电风扇也没有。我想，要添置冷气机办不到，但添一架电风扇总还可以吧！誰知我提出了添置电风扇的要求以后，一天，一位负责人跑来声色俱厉地对我

說：“經費有限，將就點吧！”我除了担負微量分析以外，还担任有机合成的研究。可是却没有一个輔助人員。一次我請求所方招請一位輔助人員，由我訓練做日常的例行分析。結果，又是“編制有限，將就點吧！”

一九三七年，我因病回家鄉休養。芦溝橋事變發生了。院里下達了一紙緊急公文，凡不在上海的人員一律停薪留職。過了些時候，我趕回上海；可是，研究院已經遷往昆明。當時，我對內地的研究工作情況還不很了解，曾考慮帶病到昆明去復職。正在這時，同學高怡生由重慶來信，訴說他在內地顛沛流離不能施展所長的苦悶。接着，他又來信說：同學羅永銳到達內地以後，郁郁不得志，又為生活所迫，竟投江自殺了。羅永銳的身世，正是當年國民黨反動統治下的青年科學工作者的寫照呵！我曾含着眼淚填了一首〔漁家傲〕挽他，其中半闕是：

自古男兒夙有志，而今有志翻無計。含恨毋寧身玉碎。長已矣，可憐熱血隨波逝！

想想高怡生的處境，想想羅永銳的遭遇，我打消了去昆明的念頭。我在上海困居了一個時期以後，經友人介紹，到上海醫學院教了幾年書。我的理想是要在有機化學方面研究出一些成果，所以在教書期間也曾拼湊了一些儀器藥品，做些研究。可是不但得不到支持，還要看學校事務先生的臉色。他一看到我們做研究，就說我們耗

費了学校的水电煤气，嚙嚙不已。在这种条件下，我哪能做出什么出色的成果呢？

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战事爆发了，上海医学院停办。我又失业了。后来有一位朋友的亲戚（资本家），拟出資创办一个研究所，要我襄助。当然，做研究工作，是我“心向往焉”的宿願。因此，听了这话，电影故事片中欧立希发明“六〇六”的一个个镜头，又重新浮现在我眼前。欧立希想应用有机砷化合物治疗梅毒遭到許多朋友的白眼，湊巧一个资本家資助了他，终于发明了“六〇六”。我想，我是否也会碰到象这部电影中那样“好心”的资本家呢？一天，我来到这个研究所筹备处。进去一看，我的心就冷了半截。这里除了几間灰尘堆积的破厂房外，什么也沒有。我把几間空屋打扫干净以后，約期和这个资本家面談。隔了一个月他才同我談了一次話。从他的談吐中可以看出他关心的是如何可以获得高额利潤的化工原料的小型生产和药品配方；至于科学研究，他并不感到兴趣。“研究所”的招牌挂出来了，资本家的真面目也露出来了。他关心的只是哪样药物合成可賺多少錢，对工人的死活，一点也不放在心上。当我看到工人把很容易燃燒的有机化合物装到玻璃瓶里去，放在煤球炉上加热时，我真急坏了。我警告这个资本家說，这样做要发生严重事故的，要求他尽快找一所有煤气设备的房屋，或是装置安全设备。他置之不理。果然不久，一个工人因为鍋炉

爆炸受了重伤。我在气愤之下，便离开了这个“研究所”。在我离开这个研究所不久，又听说这个资本家创办的另一个小厂发生了爆炸事故，一次死了三个人！

我第四次失业的时候，又听说另一个资本家也要创办一个研究所。这个资本家见我年轻，穿著朴素，便录用了我。这个资本家的“研究所”是专门搞合成药物的小型生产的，房子小，设备简陋不堪，很不安全。看看这种情景，我劝这个资本家另找房子，改进设备条件。哪知，他很狡猾：为了利用我的技术，为他攫取利润，他装出很有远见的样子，满口答应我的要求，并且叫一个副经理出去找房子，还要我陪着他一起去。这个副经理三日两日陪着我坐了三轮车出去看房子，前后看了二十多处，都说不理想。一次，在一家殡仪馆隔壁找到了一幢合式的房子。回到所里和那个资本家一谈，他冷冷地说：“好是好，可惜隔壁是个殡仪馆，以后要顶出去啥人要呢？”至此，我才如梦初醒：啊，他要我陪副经理找房子，是在骗我！把科学事业寄托在资本家身上，本来是一个荒唐的幻想，这种幻想终于在冷酷的事实面前，象肥皂泡那样很快地破灭了。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费了一些周折，我总算回到了前中央研究院来。这时的中央研究院比过去还要糟。化学研究所全所人员包括工友在内，只有二十多人；我是个副研究员，却连个辅助人员也没有。仪器药品吧，只能挖库存；要新添没有经费。当时研究人员的研究题目是怎样

确定的呢？先到药品庫房中去看，有什么药品，就定什么研究題目。一次，我好不容易从灰尘堆积的庫房里发现了一瓶氰基醋酸酯和几种醇，喜不自胜，定下了研究題目。但要进行研究，还缺少一百多克的桂皮酸。怎么办？便鼓足勇气向办公室申請购买。謝天謝地，这次总算同意了我的要求，但据說一个月的經費就此全部用完了。堂堂的中央研究院，为啥这样穷？誰都知道，国民党反动派办研究院不过是挂块牌子装装門面，它把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全都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当时，研究人員都掙扎在饥饿綫上，牛衣对泣，朝不保夕，还談什么研究工作呢？我抑郁終日，逐漸消瘦，終于又病倒了。

在国民党反动統治下，一个正直的人，即使有真才实学，也沒有用武之地。那时，感輦的噩耗一个接着一个地傳來。又一位同学汪盛年自杀了。汪盛年原来是学物理化学的，后来又学冶金。抗战胜利后，他怀着一股热情，从海外归来，准备为国效力，进入了国民党軍事委员会的一个机构。进去以后，才发现自己上了当。他眼看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种种罪恶行为，忧憤交集，一切理想付諸东流，終于被迫自杀。他的死，是对旧社会的控訴啊！他的死，曾引起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同事們无限的震惊和同情。我也曾写了一首挽詩挽他：

前年罗子沉江歿，

今日聞君又自裁。
忍見故人投鬼籙，
可憐金劍沒蒿萊。
秋風瑟瑟玄云惡，
長夜漫漫百感哀。
搔首問天天不語，
佇看雲散月華開。

烏雲驅散了，陽光普照大地。解放後，科學事業逐年發展。研究人員不是成倍地發展，而是幾十倍地增長；經費的增加不是幾十倍而是幾百倍、幾千倍乃至幾萬倍。回想起過去的科學事業和科學工作者的遭遇，真有不勝今昔之感了。

值得提起的是：過去的研究院，有人比之為“花瓶”，擺擺樣子的；有人認為還不如花瓶，因為花瓶里的花，還得有人及時護持它。解放前的科學，有誰來維護呢？科學工作者有誰來培育呢？相反地，卻受到不斷的摧殘。還值得提起的是解放前的有些研究工作，有人比之為根生在鄰人院子裡的紫藤，縱然有幾朵花長入自己的庭園，但畢竟是无根之木。單就解放前研究工作中所用的藥品來說吧，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仰賴國外進口，即使搞出了一些成果，對發展自己的科學也沒有什麼實際意義。

解放後，特別在一九五八年以後，祖國的科學事業有

了巨大的发展。它已不是根生在人家院子里的紫藤花，而是一棵植根在自己土地上的万古长青的松柏。我深深地体会到，只有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祖国的科学事业才能得到发展。至于我自己，也只有在党的教育下，才能做出一些成绩。在党的教育下，我的阶级觉悟不断提高，一九五六年，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且开始担任研究所的领导工作。说也奇怪，过去我常常生病，解放后身体却变得结实起来。抚今追昔，感慨万状，填了一首〔浪淘沙〕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忆苦复思甜，忍话科研。当年寥落有谁怜？更著狂风和暴雨，历尽摧残！

春到百花妍，美景空前。好将心血赴辛艰，众志成城收硕果，红遍人间！

旧 恨

——老运动员黄亨的叙谈

承 志

在杭州举行的全国排球联赛结束之后，来自祖国各个角落的运动员，成群结伴，像大家庭里的亲姊妹亲兄弟，有说有笑地到西子湖上去游览。适值初夏时令，大家泛舟湖上，桨声笑语，使得恬静的西湖一时间变得活潑熱鬧了。我們那条船上，有几个初次参加全国比赛的年轻人，纵情地唱起歌来。年近四十的教练黄亨同志，也随声应和。他笑容可掬，白衬衫的领子略略敞开，袖子卷捋在两只肌肉饱满的胳膊上，显出刚劲强壮的姿态。唱完了歌，大家开始闲谈，黄亨同志不禁深有感触地说：“现在的年轻人，真正生活在天堂里啊！在从前那个世道，穷人出来比赛，苦头吃不了还兜着走呢！”

也许是由于这一感叹，也许是年轻人对黄教练的敬重，大家要求黄教练叙叙他的过去。在年轻人的频频催促下，黄亨同志经过一会思索，便开始叙谈起来。

一九四八年岁末，我在家乡广东台山做散工。一天

傍晚，我在村边树底下照例用几块砖石搭成“炉子”，生火做饭。——因无家，劳动下来没现成饭吃，得自己动手做。这天的晚饭，依然是稀粥和咸菜。正吃的当儿，忽有人来叫我即刻到“余财主”家去一趟。我心里不禁一怔。呀，这个所谓财主就是有钱有势的地主和奸商，又是专横一方的把头。他同我有何相干？他找穷人哪有什么好事？我疑虑重重，寻思着去呢，还是不去。然而来人在等着我，不去不行呀！

我在苍茫暮色中跨进余宅的大门。大腹便便的财主从堂后走出来，肥嘟嘟的脸上亮光光地发笑，八字胡子在两嘴角上展开了翅膀，竖起一只大拇指，劈头就说：“黄亨呀，你的球技呱呱叫，唔，硬是呱呱叫！”顿了一下，装出了关心之至的神情，又滔滔地说：“你有如此出众的球技，应该受到抬举，绝不能被埋没。眼下有个绝好的机会。余氏决心组织一个球队，远征香港，特请你来参加，让你‘英雄有用武之地’。……至于来去一切费用，均由我余某包下，你尽可放心。另外，在港比赛的门票收入，客队也得一半。除去所花费用，余下的悉数归你们队员。”

我躊躇着。余财主旋即又许诺：“你若愿意的话，还可给你在香港安插一个工作。”停停，他趋近我，附耳低语：“听说，你原来那个东家，不肯饶恕你，不久要来收拾你呢！……”

我的心弦一下绷紧了，想起原先那个狼心狗肺的东

家，我觉着像猫抓心窝，搅痛和烦躁不安。

在这里我得先讲讲我的家史，讲讲原先那个东家是哪号子人，讲讲我是怎样打排球的。

爸在我四岁上就永别了我们，他在我记忆里只留下一个模糊的印象，而且渐渐地淡忘了。妈的性子可刚强，总想凭双手挣出个好日子来。一个女人家种地主的几亩薄田，要养活我、我的姊姊、弟弟、爷爷和奶奶。然而残酷无情的现实，使妈的梦想破灭了。肩上越负越多的眼债，简直把妈都压扁了。一年冬天，地主上门逼债，逼得妈走投无路，速急带气，一股气火攻心，就气死了。临死的时候，我们围在妈床前垂倒了头呜咽地哭。妈舍不得自己的儿女，舍不得自己的家，用哭干了泪的眼睛，向我们投了最后的一瞥，又用干瘪的手拉拉我，泣不成声地说：“我的，好孩子呵！……妈管不得，你们了。妈，吃了，一世苦，没苦出头。记着，妈是，怎么……死的……”

当时我才十四岁，这第一颗仇恨的种子便落进了我的心田里；同时，全家生活的重担和眼债也落到我的肩上。我年岁虽小，心上却已感到从祖辈以来的、深重的忧愁和不幸。不过，我抱有还清眼债、兴家立业的幻想，因而继续租下地主的几亩地，独立地开始了耕耘插种的庄稼汉生活。我和只大我一岁的姊姊，拼命干了一年。在最紧忙的夏季，我从地里回来，有几次吃饭中间一瞌睡，碗就掉在地上打碎了；有时从水稻田泥脚泥手爬出来，躺在

树蔭下青草上，像瘫痪了一般，无力回家。我担心成熟的稻子被人偷去，通宵在田边树底下睡觉。无情的蚊子把我的臉、腿和胳膊都叮肿了。但我吃得来苦头，总是一声不吭。我左盼右盼，盼望稻子成熟出場，让年迈的爷爷奶奶臉上也有个笑容。

到了秋收时节，地主派狗腿子来守候着，收一粒拿一粒。白发滿头、瘦骨嶙嶙的奶奶，拄着椴木棍站起来，弯着腰，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放声大哭，絕望地嚷着：“我不要活了，我不要活了！”姊姊和弟弟見奶奶痛哭，跟着大声嚎叫，变成了个泪人。風烛殘年、臥床不起的爷爷，也不能控制自己了，瘋癲了一般抬起半截身子，上气不接下气地喊：“你們，干脆，拿刀把我，这条老命，杀了算哩！”說着就一头栽到枕上，难受得哼哼唧唧。合家老哭小嚎，送殯似地送走了全部谷子。哭声象刀子戳着我的心窝。我捏紧两只拳头撑在腰上，横眉瞪眼，在一边听着看着，气呀，急呀，仿佛照脑門被掄了一棍，半天沒說一句話。

这个比狐狸还狡猾的地主，眼看我种不成地，把田收了回去，借口賬債未清，逼着我到他家去熬小长工。姊姊被迫出嫁，弟弟出外跟修鍋子的拉風箱。

我給地主家泥里水里熬了一年，只得一担谷子送回家供养爷爷奶奶。两位老人就像油干灯草尽一般在饥饑疾病中过世了。我只能向东家借錢来葬送老人。东家要我白干三年活，并且立了一契，目不識丁的我，只听代笔

人念了一遍，痛心地 在契上画了押。从此以后，我整年累月，身无分文；吃的是霉米、咸菜，逢年过节有一点臭咸鱼，就算是东家“款待”的葷腥了。我长年苦熬，骨瘦如柴。水田里可恶的蚂蝗叮烂了我的脚，因无钱治疗，越烂越凶。我用破布包着伤口下地，被浊水泡，被泥块擦，被草根刺，就一剜一剜地痛，我只能慢慢地干活。但刻薄无情的地主竟脸色铁板地对我说：“你这小贼子，像耗子一样吃我的米，契上的墨水未干，你就尽磨洋工，当心我收你的骨头！”我平素不大说话，但赶在这节骨眼上，也就作声了；但只说了一两句，地主就恶狠狠地往我嘴边打了一巴掌，骂道：“小贼子，你敢回嘴，我抽死你！”我只得忍气吞声。后来，幸亏有好心的庄稼人告诉了我一个草药方。我按照旁人的嘱咐，把草剥烂了缚在伤口上，慢慢地把脚伤治好了。

到第三年，有一天我去玩了一会儿排球。地主得知了，殴打我，又咒骂我：“你这小贼子，耗子一样吃我的米，人不象人，也去打球，阎王没给你这份福气！”我心想：“我气死牛地帮你干活，你不给我一点歇歇？”但我还是只能把怨气埋在心窝里。夏天，地主半夜里逼着我披星星戴月亮到田里苦干。我整天不得休息，四肢无力，缺乏睡眠的眼睛蒙着血丝，犁田时跟在牲口背后踉踉跄跄。狗腿子在田边监督我，用鞭子抽我。人不是铁打的，怎能天长日久地过度劳累和遭这毒打！我终于病倒了。地主只给

我一天吃兩頓稀粥，却要作為我新欠的賬債。病愈之後，地主再次逼我立了一張白干兩年活的契約，以抵償臥病期間欠下的這筆新債。我含辛茹苦幫地主白干了整整五年，一無所得，只有一個皮包骨頭的身子。但我年增智長了，開始感到辮子被抓在地主手里，干一輩子也無出頭之日，於是想逃出牢籠。這個念頭在我心里縈繞了幾日，終於對地主講明了。

我說：“你歇了我吧，我干不動了。”

地主瞪眼回答：“不行，你還欠我兩担谷子呢！”

“我干了五年，什麼也沒有，你還要我干？”

“你要歇，就得把債还清。”

我忿忿然尋思着：欠地主這筆糊塗賬，永生永世也還不清；好吧，你不答應，逼着我上梁山。此時不走，更待何時？我當夜便逃出這個魔窟，到他鄉落下腳來。為了躲避地主追究，我居無定址，專做散工度日。我整天苦苦勞作，無家可歸。在號稱“排球之鄉”的台山，庄稼漢農閑時節也愛玩玩排球。我有工夫就和衣衫襤褸的散工們一塊打玩。這是我生活中唯一的娛樂；只有在這個時候，我臉上才出現笑容，暫時舒散一下心頭的怨悶，胸腔里會覺得寬敞一些。提起我們窮庄稼漢打排球，真是可憐哪！讓你們現在看見了，也許會笑破肚皮。什麼球呀？是用紙頭爛布做成的團團。什麼球網呀？是用兒根草繩子編起來的。荒坡草地，就是我們的球場。後來為了提高技術，每

人出几角錢，购置了球和球网。有时候做完工，太阳还有一竿高，我們几个无家可归的穷光棍，便拿着球在草地上玩弄起来。玩着玩着，累得球也傳不动了，才肯歇手。我的球技在同伴中漸漸地显露了头角。这一节，起先我是根本不觉得的，直到邻鎮邻村每每有人叫我去帮助比賽，我这才意識到自己的技术有了一点儿“名堂”。但我被人叫去比賽，几乎沒有一次不被人侮辱。

一次，我代表“三埠队”同“启信队”爭夺冠軍。比賽至第五局，“启信”見形势于己不利，扣球时故意摔倒，趁势用脚在网下对我猛踩，結果我的脚腕被踩伤了。这还算小事。有次我被一个小学叫去参加“三合杯”決賽，对手在比賽之前下了賭注，揚言必胜。結果却被那个小学打败了。我回来时，在半路上被一帮人截住。他們朝我破口大罵，拳头脚尖往我身上打来。我整整痛了半月，推車推不动，耕田也耕不快。隔了一年，毆打我的那一帮人，却要我去帮助比賽，然而暗示：我若不去，莫怪他們手下无情；同时我又得到另一伙人的警告：如果我去帮忙，当心骨头打断！我見情况不妙，偷偷地远避了他們。

至此，我不得不冷靜地想想了——我打球原是为了快乐，現在却为这挨打遭罵，伤透脑筋，何苦呢；我是靠劳力換飯吃的，身体負了伤，不能做活，便得餓肚子；同时我一年比一年大了，也还想成家立业，总不能老是混混糊糊过日子。于是，打定了主意不再参加比賽。……

可是，哪料到余財主又会来找我到香港去打球？哪料到原先那个东家又要来收拾我呢？当时，我在余財主面前竭力保持不动声色，心里可直叫苦：生活呀，生活呀！你为什么总給穷人出难题呢？我想，我在台山已經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再沒有出头之日了。我一个人在这片土地上赶东奔西，从这村到那村，从此乡到彼乡，从当长工到做散工，死干活干，如牛馬一般地吃了多少年的苦楚，受了多少人的欺侮，結果只落下个一无所有，头頂人家天，脚踏人家地，沒家沒眷，稀粥咸菜填塞肚子，勉强图个不死。我滿腹愁緒，严酷的生活逼迫我不得不考虑和抉擇。我心里一横：干脆到外面去闖蕩闖蕩，离开这个仇气地方。我便把胸膛一拍，对余財主說：“我去，跟你們去！”

球队搭輪船到了香港，被安置在“陆海空飯店”。当晚，在港的一位余總經理（余氏族里的头目）請我們吃飯。

余財主把他向大家作了介紹后，他就双手一拱說：

“諸位远道来港，辛苦了，辛苦了！”

各就各位坐定之后，總經理首先起立祝酒：

“諸位，来来来，同下一杯，預祝馬到成功，节节胜利，为余氏光宗耀祖。”

他开始傲然地举目环視，最后定睛看我，目光咄咄逼人，使我感到局促不安。在这群人里，独我一个农民，穿著和举止带有乡村土气。而剛来的这批人，海派洋气，自

然不必說，即便其他隊員，也都是富貴子弟。我夾在裡面，氣氛極不和諧。總經理飛快地向余財主使個眼色，財主微微一笑，向對方附耳低語。總經理稍微頷首，唔唔几声，頓作笑容，揚眉睜眼對我說：“喂，你要好好打，打勝了，有賞有賞！”

次日黃昏時分，我們來到鬧市中心一個露天球場。高高的洋灰看台上，觀眾已經密密層層。入場前，余財主給我們穿了印有“武溪”字樣的運動服，並再三叮囑我：“小伙子，好好干，打贏了球，你的事情包在我身上。”

裁判員的哨子吹響了。對手“港聯隊”發球。我振作精神，兩眼盯着球，準備作幾次漂亮的扣殺。球剛好飛到我頭上，我把它輕輕托給了同伴，同伴又把球傳給我。我疾速跳起，掄臂狠狠一劈，打響了第一炮。我也沒料到，一開頭就會打得那麼好。

我隊勝利在望的時候，對方發了一個又急又猛的球。球觸同伴的手向場外急飛，徑直飛到看台附近。我一陣快步沖去，躍身伸臂，全力一擊，把球救了回來。可是我歪倒在地，左腳膝部負傷了。但我忍痛堅持，直至最後一球勝利定局。

散場的時候，我緩步而行，剛跨進休息室，聽說有人在外面找我，躡身出去一看，是位中年男子。

“你還認得我嗎？”那人熱情地同我握手。

我定睛端詳他，一時竟認不出來。不待我開口，那人

情不自禁地說出了自己的姓名：“黃除漢。”

我終於記起來了。他是我的同鄉，也是同村，而且是隔了几房的堂兄。他已离家多年，現在如此蒼老而消瘦，簡直判若兩人，只是他的鄉音無改，眉眼依旧，才引起了久远的記憶。彼此略叙近况，他又少不得評贊我几句，因時間已晚，便匆匆分手了。

我在休息室坐了片刻，輕撫自己的膝頭，一面思量：總經理、余財主他們會來問候我嗎？可是同伴們陸續离去了，我也只得動身回“陸海空飯店”。

當夜我膝痛失眠，到凌晨五點鐘才朦朧入睡。然而不久便矚然醒來，又覺着膝頭的隱痛了。我想，該去請大夫治治。然而，我身無分文。不是說比賽后有錢分嗎？我急等着這筆錢到手。九點鐘早餐時，一個同伴塞給我一疊鈔票，悄聲地說：“喏，二十塊，分給你的。”我心里涼了一截，聽說总共收入兩万多塊港幣，為何只給我這麼一點，這點錢能管什麼用？要是回家，乘船買半票還不够呢！

“就這一點？”我問那同伴。

“你要多少？”同伴冷冷反問一句，撇开了我。

我权且把錢收下，心想治傷要紧，然后再去找余財主或總經理。我到就近一家私人診所，打了針，貼了傷膏，又拿了些內服藥。二十元花掉了一大半。回到“陸海空飯店”，不見同伴們的踪影。我走进自己房間，把几片藥

吞下肚子，歪臥床上，想閉眼養一會神。忽听輕輕的敲門聲。我側耳細听：莫非是余財主他們來探望我了，給我办私事來了？“我就來！”我應聲叫着，一面走至門邊。可是，開門進來的，既非財主也非經理，而是一位白衣茶房。

“客人，請你走吧，這裡不能住了。”

“為什麼？”我感到莫名其妙。

“余先生結過賬了。”

這使我很失望，氣忿而且擔心。我向茶房說明我眼下無家可歸的情況。

“你要住下去，你得先去賬房那裡交費。”

我請求茶房容我考慮一會。這房間我半天也住不起。離開吧，形單影只，舉目無親。投到哪裡去？

“你究竟怎麼辦？”茶房見我躊躇，又逼問。

“這裡住不起，可又沒處住呀！”

“住大街唄！”

一句話一根針子戳痛了我的心。出來打球，還要我和乞丐一樣住大街，豈有此理！我決定即刻去找余財主面談，但不知他在何處；我想向同伴打聽，他們又一個個消聲匿迹，不知去向了（他們在香港都是有靠山的）；若是乘船回家，一張船票四十餘元，哪裡有錢？我左思右想，騎虎難下，只得離開旅館，暫時投宿到偶然相逢的黃除漢家裏去。

那是個狹窄矮小的窄裁縫鋪子。擺着的若干輛縫紉

机，占去了除灶房以外的整个地盘。黄除汉只不过是伙计，寄居在此的。我把事情的原原本本陈述了一遍，黄除汉叹气说：“阿弟呀，我说句直心话，世上的事情，你还懂得太少。不能太相信有钱人。但事到如今，着急也无用，在这里住几天再说吧。”

店主人也是台山人，同意我住下，夜间打个地铺，一天亮就得卷起来。我决定去找总经理，请他代为安插一个小小的足以糊口的工作。黄除汉和店主人同意我作一番尝试，并且告诉我如何去的路线。我没钱坐车，慢慢地走着去。正午到那里，见是个高楼大厦的百货商店，商品琳琅满目。我向柜台上一位伙计说明了来意。他冰冷地回答：“总经理出去玩了。”第二天我在晓色朦胧中又赶了去，我第一个进门，仍旧问那位伙计，他不加思索地脱口回答：“经理一早去茶楼喝茶啦！”晚上他总该回来睡觉吧，我决定作第三次尝试。不料那伙计一见我，便拉长了脸，说：“怎么搞的？你又来啦！经理不在家，你走开！”他像回复乞丐一般地对付我。我完全明白了，经理肯定就在里面！呸！混账东西！我心里愤愤地真想闯进去，一把抓住这老滑头，打他几个响亮的耳光。

我心里憋着一股窝囊气回到铺子里。黄除汉又对我说了句宽慰的话：“不要急嘛，就吃我们的吧！”

从这天下午起，我在街头百无聊赖地徘徊。虽则冬日，南国的午时的太阳依旧是热烘烘的。嘈杂的人声、车

輛的奔馳聲、汽笛的怒吼聲、惱人的爵士音樂和纏綿悱惻的黃色歌曲，在市區里亂紛紛混成一片。我感到空氣窒人呼吸，心頭納悶和煩躁。這兒是什麼世界？簡直是滿街豺狼。余財主、余經理他們就屬這一類。我在台山還能給人家做苦工，而現在苦工也不由我做，恐怕只有一條路——餓死街頭。一陣腹中飢餓的響聲，使我昏昏悠悠，嘴里酸苦，我頹然坐到路旁石頭上，手托下巴，合眼養神。這時我只有個“吃”的念頭了。但我口袋里和肚子里一樣空，沒有什麼可以換得充飢的食品。雖身處鬧市，我却覺得自己是孤零零的，如同漂流在荒島上，四周荒坡野草，滅絕人烟，不能求人救助。啊！這果真是鬼門關！我一刻也不能逗留在這兒。這時，我恍然明白了：奸商資本家欺侮人剝削人這一點和地主一樣可惡，我這樣的窮漢，關到哪裡也一樣被人欺壓呵！我沉思來，沉思去，不如回台山做散工熬日子好呢。黃除漢他們見我實在可憐，東拼西湊，籌借了船票錢，讓我回了台山。

不多時日，台山在喧天的鑼鼓聲中解放了。解放後的我，徹底地翻了身，而且翻得如此之快，簡直意想不到。黨領導着人民用巨手砸破了鐵籠。但這不是夢，而是活龍活現的現實。自一九五〇年起，從縣里到省里，由省里到大區，由大區到全國，一層層選拔我，一層層栽培我；不足一年，我便成為國家排球隊的一員，而且組織上信任我當了隊長。想想看，這是多麼大的飛快的變化！若說我

在技术上有一点点儿造詣，那么，說句真心話，也只是在这几年练就的；至于以往的技术，回过头来看，簡直不算回事情。

更使我感动的是一九五一年全国比赛后，周总理接見我們。他亲切地握住我的手，語重心长地勉励我。我細細体味，这不多几句话里包含着多大的哲理和多大的期望呀。同年，我又到了柏林，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从世界各个角落来的青年男女，尽管肤色不一样，語言不一样，服装不一样，但他們全都热情地邀我一起跳舞唱歌。那时的我，脚不会跳舞，口不会唱歌，但情不可却，只得跟着乱跳，瞎唱。他們又拥抱我，亲我，在我耳边上咕囔着我不懂的話語。不过，我却能听懂人們口口声声欢呼的一句话：“中国！中国！毛澤东！毛澤东！”在这人世間欢乐的海洋中，我不禁想起过去的凄惶日子来了，我的泪珠揩了又流，流了又揩，不断綫地流着。呀，今天的生活多有意思啊！太阳多紅啊！天多藍啊！人們多可亲啊！我觉得自己真正做了人，而且是值得自豪的毛澤东时代的中国人啊！

多亏党的撫育，我在一九五四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懂得了自己是个什么人。我从前受人欺侮，这不是个人問題，这是階級仇恨、階級剝削和階級压迫。沒有全中国的解放，哪有我黃亨个人的解放！党，教导我們：不能忘記階級斗争，不能忘記階級仇恨。每次出差回家，看到

我的孩子欢蹦欢叫，滿臉幸福的稚气，我就想起我过去牛馬般受苦受难的年月，觉得自己有责任奋发工作。如今的年輕运动員啊，像小老虎一般，有股上天入地的劲头；鍛炼的条件样样齐全，要什么有什么。他們簡直幸福得无忧无虑，可就是不懂得旧社会是怎么回事，不懂得地主、資本家如何殘暴和过去劳苦大众如何受尽苦难，所以还有人有时嫌这个，有时怨那样。我要真心实意地奉劝他們一句：好好接受階級教育吧，提高階級觉悟，不能身在福中不知福。

船儿在不知不觉中靠近了“花港观魚”。黄亨同志不发言了。大家眼睜睜瞧着他，凝神深思。我也这么想：黄亨同志所走过的道路，其实也是許許多多从旧世界熬煎出来的人所走过的类似的道路。今天的青年人呀，年輕的运动員呀，應該知道这条路，从中得到启示。